〔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

大失控与大混乱

（原名：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

潘嘉玢　刘瑞祥　译
朱树飏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著

大失控与大混乱

（原名：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

潘嘉玢　刘瑞祥　译
朱树飏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1994

(京)新登字 030 号

责任编辑：洪泰安
责任校对：湘　京
封面设计：远山林
版式设计：李玲玲

大失控与大混乱
(原名：失去控制：21 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著
潘嘉玢　刘瑞祥 译
朱树飏 校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4415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2 插页　167 千字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04-1546-X/D·137　　定价：13.50 元

内 部 发 行

作者简介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1928 年生于波兰华沙。曾任前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7～1981）、哥伦比亚大学战略学教授兼任该校共产主义事务研究所所长，长期担任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目前还兼任霍普金斯大学美国外交政策教授。他著作颇丰：《苏联政治的意识形态和权力》（1962），《两个时代之间：电子技术时代美国的角色》（1970），《美苏关系》（1973），《权力和原则：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1983），《运筹帷幄：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构想》（1986），《大失败：20 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1989）等 12 本书籍。

献　　给
吉米·卡特

他对人权问题的预言
仍然振聋发聩

中译本出版前言

世界的发展正处于新旧世纪更替的交汇点上。许多国家的决策者、研究者正在回顾、总结20世纪的发展历程和重要的经验教训，思考和研究21世纪来临将出现的新情况、新机遇和新问题，以便制定相应对策，为本国未来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美国早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即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与运筹，并陆续有一批论著发表或提供高层当局参考。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布热津斯基1993年发表的这一领域的一部新著。

《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一书，是布热津斯基继《运筹帷幄：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构想》[①]（1986）和《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②]（1989）之

① 中译本，刘瑞祥、潘嘉玢译：江苏译林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公开发行。

② 中译本，军事科学院外军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内部有组织发行。

后的又一部重要著作。作者自称本书是他长期研究心血之结晶，融哲学、政治和国际事务于一体则是该书的主要特色。（见书尾“志谢”）也可以说，布热津斯基的这三部著作是美国以至西方国家统治阶层代言人系统论述当代世界格局演变过程和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代表作，它们既论述了一系列现时问题，又对未来进行了广泛的预测，具有较强的战略性和政策性。因此，这些著作是我们了解、研究美国以至西方国家现时及未来内外政策和战略方针的值得重视的著作。

尽管作者的观点与《运筹帷幄》和《大失败》一脉相承，但本书在内容上则大不相同，它着重论述的是当前和今后若干年内全球政治形势与世界格局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和美国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作者自称本书是对世界和美国前景的“紧迫的预警”。全书援引的大多是90年代的最新文献资料，讲的是冷战结束后的现实问题和对21世纪初的近期预测。作者对全球问题的焦点，世界新格局的演化，原苏联东欧地区发展的趋势，日、欧的国际地位，中国在世界新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作用和可能采取全球性战略的分析及对美国社会危机的洞察，均独具见解。这些内容对于研究当前和今后若干年内的国际形势发展，乃至于探讨潜在的新的局部战争（包含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战争）的动因，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本书中，布热津斯基认为：

冷战结束　固有矛盾加剧
大国失控　出现全球混乱

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喜忧参半”。在冷战结束后虽然出现了一些可喜的迹象，但是根本的事实仍然是，少数发达国家竭力追求纵欲无度的生活方式，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竭力谋求解决生存条件的根本问题。这些不同趋向加剧了日益深化的全球分裂中所固有的危险。

尽管苏联解体，美国却难于行使有效的世界权威，这是来自文化而非经济原因形成的内在弱点所致。由于大国失控，将出现一种使世界的不稳定性越来越增大的局面。这可以通过苏联解体后欧亚地区性冲突日益加剧来予以说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更令人对这一前景有不祥之感。北南冲突也会随之尖锐化。

苏联的解体出现了一个黑洞，可能是新的政治危险的根源。俄罗斯近期前景不会顺利，结果难以捉摸，也可能使自由市场和民主两败俱伤。俄国应力求跻身于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行列，其最终的危险是一种新法西斯主义遍及前苏联范围，成为破坏力量。

波斯湾、中东虽已成为美国独一无二占有优势的地区，但这是表面的，脆弱的。美国与它的阿拉伯附庸国之间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念或政治、文化与宗教的联系，因此美国

的优势是名副其实地建立在沙滩之上。

对于俄国和美国，地缘政治真空都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漩涡。目前这个漩涡由欧亚大陆的一个椭圆形构成，由亚得里亚海至巴尔干各国，一直到中国的新疆地区边界，由南向北，环绕波斯湾，包括中东部分，南面的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北面的沿俄国—哈萨克边界的全部中亚地区，一直沿俄罗斯—乌克兰的边界，包括30个国家，几十个种族、民族和信仰不同宗教的约4 000万人口。其分裂与对立已达白热化。全世界已获得或不久就可能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家中，有一半的国家位于这一地区内。这一地区内的暴力冲突可能会在多种多样的对立双方之间爆发，而且存在动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可能性。

世界新的地缘政治形势将变得日趋复杂，不是出现新世界秩序，而是出现为维护本身利益的国家结成多极的组群——团伙。它既是政治联盟，又是互相竞争的区域性经济集团。可能出现的多极组群有6个，即：(1) 受美国控制的北美组群；(2) 欧洲组群；(3) 东亚组群（附属区可能是前苏联远东地区、东南亚和澳、新）；(4) 南亚组群；(5) 不规则的穆斯林新月形区域组群；(6) 受俄国控制的欧亚组群。组群之间和组群内部都存在历史和现实的，经济或政治的矛盾与冲突。其中第(5)个组群，包括从西非、北非到西亚、南亚和东南亚广大区域的穆斯林国家，其内部与外部都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的种子。同时，10亿穆斯林不佩服西方，许多穆斯林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令

人讨厌。有些穆斯林国家（如伊朗等）准备随时挫败美国。如果美国处理失当，也会促使其中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家使用这种武器。

因此，世界政治——无论从国际事务方面看，还是从国内的社会情况看，完全可能发生剧变而进一步失去控制，以致引起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和哲学上的混乱。未来的世界秩序仍将是强权政治、民族对抗和种族关系紧张，甚至在某个时候，在世界地缘政治的激荡漩涡中可能会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美国面临众多严重难题
潜存分裂解体战争危险

美国是冷战的胜利者，它的综合国力举世无双，但它的优势既是现实的又是空想的。历史经验证明，缺乏道义影响力，大国就无法长期保持其主导地位。构成世界大国地位的主要因素，一是经济、军事等实力，一是道义的力量。而美国享乐主义的倾向难于与世界大多数人有共同语言。美国在全球的显赫地位反而促使它越来越在全球无能为力。美国自身力量不足以强制推行美国式的“世界新秩序”。

美国现在面临十分严重的20个大难题：(1)债台高筑；(2) 贸易赤字；(3) 低储蓄和投资；(4) 缺乏工业竞争力；(5) 生产率增长速度低；(6) 不合格的医疗保健制度；

(7) 低质量的中等教育；(8) 日益恶化的基础设施和城市衰败现象；(9) 贪婪的富有阶级；(10) 爱打官司走火入魔；(11) 日益加深的种族和贫困问题；(12) 广泛的犯罪和暴力行为；(13) 大规模毒品的流行；(14) 社会上绝望情绪蔓延；(15) 过度的性自由；(16) 视觉媒体大规模传播道德败坏之世风；(17) 公民意识下降；(18) 制造分裂的多元文化抬头；(19) 政治制度出现上下脱节现象；(20) 日益弥漫的精神空虚感。

国内的难题抑制了美国的力量。因此，美国既成不了全球警察，也当不成全球银行家，道德家也做不成。美国的全球力量可能被美国自己的价值观念所破坏。美国需要长时间在哲学上反省，文化上自我批判。美国从一个由白人主宰和塑造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全球人拼凑的社会，这将引起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并可能使社会凝聚力进一步丧失，也可能会引起混乱，甚至有潜在的分裂作用。如果缺少共同语言和共同宪法的基础，美国将有面临解体的危险。如果在解决难题中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在美国内部新拼凑的社会甚至可能引起日益升级的城市游击战。

日本欧洲尚难成为世界大国
西方腐败将丧失其全球作用

如果美国摇摇欲坠——无法行使有效的全球权威——

那么，是否有对手能替代美国？现在，预测日本和欧洲是美国超级大国接班人已成为时髦。

然而，大国的出现是特定的历史机遇，而且需要具有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因素。由于它们各自的情况和前景不同，必须分别予以评估。尽管日本在半个世纪以来穿着“企业服”战胜了穿“卡叽军服”的美国，今后10年内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将与美国并驾齐驱，并且它很想扮演“世界副总统”的角色，但因资源和历史形象等原因仍难如愿以偿。欧洲则拥有比日本大得多的潜力，统一后欧洲的力量将非美、日可比，但其内部矛盾重重，困难年深日久，尽管最终可能，然而不久的将来肯定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由于它群龙无首，缺乏生气，充其量只能是美国的应声虫罢了。

欧洲还面临一个新问题，即欧洲的疆界究竟到哪里为止？目前欧洲基本上分成三大块：“第一欧洲”——统一中的西欧；“第二欧洲”——中欧国家，估计它们在2000年前后将加入共同体；“第三欧洲”——巴尔干各国和前苏联的东欧部分国家，其命运问题将陆续提上日程。

更值得重视的是，西方主要国家之间经济摩擦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以及西方国家将其纵欲无度的生活方式灌输到自由民主的政治内涵中，得不到一点控制，可能使西方政治寓意的全球重要性丧失殆尽。

中国将成全球第四经济大国
堪任世界反不公平领导角色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将是很关键的。就中国自己的前景而言，总的来说征兆是好的。过去15年中国在社会经济方面的进展已经奠定了顺利过渡的基础，中国的过渡未必像苏联接班问题那样有破坏性。如果是这样，中国可能不要太长的时间就会在全球的事务中采取一种较为坚决而自信的姿态。如果保持目前的发展势头，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欧洲、日本的第四个经济大国。

世界各国贫富差别越来越大。60年代富国比穷国富30倍，90年代达到150倍。因此，全球不平等现象势必成为21世纪政治中的重大问题，而中国有资格站出来充当反对不公平的领导角色。

经济蓬勃发展、军事力量强大而又日益成为国际关注目标的中国，在它面前可能摆着三种全球性战略选择：(1)中国即使非常务实，实行可以称为"商业共产主义"的政策，但仍称自己属于共产主义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非常有意识地扮演世界穷国领袖的角色，与以美国、欧洲和日本为首的捍卫现状的联盟相对抗。(2)中国把经济实力变成政治军事力量，执意在亚洲繁荣区扩大影响，向日本的政治权势提出挑战。(3)中国更明确地放弃其残留

的信条，决定成为全球现行社会体制的一部分，假如它被欢迎加入这一俱乐部的话。

对中国战略家来说，对抗美欧日三方联盟的最有效的地缘政治格局可能莫过于形成中国自己的三方联盟，把中国与波斯湾和中东地区的伊朗及前苏联地区的俄罗斯联合起来。这对于不满现状的其他国家具有潜在的吸引力。在某些情况下，伊朗和俄罗斯也可能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而决定加入以中国为首的这样一种三方联盟。它等于中苏集团的死灰复燃，但是意识形态被代之以广义的抵制不公平的全球现状，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以往的主从地位也颠倒过来了。

中国也可有第二种选择，即确定远东主要大国的地位。这将导致与日本的对抗，形成重要的区域争夺，成为区域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同时，不能排除中国对中亚冲突（特别当冲突发生在靠近中国的地区时）和任何大的新的印巴冲突作某种卷入。

回顾作者在《运筹帷幄》一书中，曾以《孙子兵法》的名言，对美苏之间的争夺作过精辟而实际的论断，并为中译本写过前言。如果说该书已被列为冷战时期西方地缘政治学代表作的话，那么本书则可认为是冷战后的地缘政治方面的姊妹篇。正是由于作者在政界和学术的声望和本书的具体内容，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西方舆论的高度重视，美英报刊纷纷发表评论（1993 年 4 月 4 日《纽约时报》、同年 4 月 21 日《华尔街日报》和 7 月 31 日《经济学家》周

刊等，见本书附录）。

必须指出，作者既是美国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又是美国统治阶级的重要代言人，他的政治观点则更多地倾向于当前执政的民主党；其一贯的反共立场，昭然若揭。尤其在本书开头等部分有关共产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首先，作者蓄意将科学的共产主义学说视为“强制性的乌托邦”理论，并据此对该制度及其领袖人物作出荒谬的评断；其次，作者突出20世纪是“大死亡”(Megadeath)的世纪，这不仅抹杀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殖民扩张时期的血腥残酷的历史，而且也掩盖了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实质——在西方绥靖主义纵容下羽毛丰满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怪胎；最后也是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尽管对美国社会本身的弊病作了一定程度的剖析，但并没有触及诸如道德沦丧、文化堕落和物欲横流等现象的根本实质，这类“亚文化”现象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沉疴痼疾，是该制度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事实上，作者也提不出任何“救治良方”。凡此种种，读者在阅读本书中自当作出应有的分析批判。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也可能经历新的动荡不安，但世界历史的进程决不会是“没有明确目的地的越来越快的飞行”过程（作者语），它的前景是光明的。

为了研究西方、尤其是美国具有代表性高层人士对国际重大问题的见解，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本书，“内部发行，供党政军有关

部门和研究机关参考”。

正当本书发排时，作者在美国《外交》杂志1994年3～4月号上发表了他最新的论文：《不成熟的伙伴关系》。它论述的是美国今后对俄罗斯的大战略，是本书内容的延续，同样具有较高的价值，特译出收入附录内，供研究参考。

最后，还需提及，本书的翻译出版因时间匆促，译文中的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正。

编、译者

1994年3月～5月

目　录

序　言

本书不是预言而是紧迫的预警。它论述当今全球政治的形势，谈及21世纪开始时可能发生的情况，还谈到必须防止发生的事情，我对全球变化失去控制的关注，包括对我们时代政治含意和启示的必要的主观解释。因此，本书有些地方是对病情的诊断，有些地方是对后果的预断，有些地方则是作者的倡议。

这部个人的论述有时甚至涉及哲学的领域。而在大规模的政治觉醒的时代，若非不仅考虑到人的能力提高的后果，而且考虑到人的精神之主要内容变化的后果，那就不可能论述现代的全球政治。

承认人类历史发展速度的明显加快及其发展轨道的不确定性乃是我立论的必要出发点。历史并没有完结，而是压缩在一起了。在过去，各个历史时代轮廓相对分明，因此，人们会有一种明确的历史进程感；而今天的历史所呈现的却是相互抵触的间断现象，模糊了我们的透视感，打乱了我们的历史洞察力。

换言之，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它实际上已与

我们业已开始理解的那个世界大不相同；而且当我们的理解跟上新的现实时，世界甚至可能在很多方面比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情况还有更大的不同。间断性是我们当代历史的主要现实，它要求人们对我们时代的含意进行深刻的探讨。

此外，几乎所有的既定价值观念，特别在世界先进地区内大规模地瓦解，妨碍了我们对目前的——且不说未来的——错综复杂的情况的理解力。极权主义的学说已不得人心——这是值得高兴的事。但是，界定道德标准的宗教作用亦已式微，而消费主义的精神特性却改头换面地取代了伦理标准。人类控制本身和环境的能力一直在迅猛发展，而我们对物质的期望发展之快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与此同时，我们的道德鉴别能力和自我控制的社会标准则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伦理上发生了困惑是无从提高历史的理解力的。

本书是以这一中心假设为依据的：说到底，动员人们采取政治行动并从而塑造世界的正是思想。这些思想既可以是简单的，也可以是复杂的；好的或坏的；可以深刻理解的或只能本能地感觉到的。有时候，这些思想会被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表达出来；有时候只不过流传盛行罢了。我们正处在全球政治觉醒的时代，因此，政治思想大概会越来越重要，它要么成为精神凝聚力的源泉，要么就是混乱之源；要么成为达成政治共识的基础，要么就是冲突的祸根。

我更加着重于下列三大问题：

1. 在20世纪，一般的极权主义，特别是作为世界事务中的意识形态力量的共产主义的大失败，其历史意义何在？

2. 在进入21世纪时，世界的理论学说和地缘政治的具体表现可能会怎样？

3. 上述问题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对美国社会本身有什么样的关系和影响？

这些问题确实都是大问题。它们还很复杂、合乎时宜和重要。我不想用大部头的、引经据典的、充满书卷气的巨篇——而是通过个人的直接陈述来阐明这些问题。我要让读者清楚明确地领会我的论点，以便他或她自己来断定我的论点是引人入胜的还是含糊不清的。然而，我应当说清楚，这不是一本讲对策的书，不会列出一系列的快速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我所论及的问题是棘手的、深深地植根于长期历史潮流中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对基本的政治和社会价值观念作深刻的重新评价。

这种评价的论点部分地来自我以前的一些著作。在《两个时代之间》(1970年)一书中，我认为，美国正先于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正是美国的麻烦和希望之所在，而苏联则可能会停滞在其工业化发展的初期阶段。我在本书中追溯了其中的一些论述。在《运筹帷幄》(1986年)一书中，我指出美国可以在冷战中和平地取胜，特别是因为苏联制度有其内部的弱点。在《大失败：20

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1989 年)一书中，正如书名所说，认为共产主义气数已尽，世界在当时正进入历史上共产主义之后的阶段。

我的下列论点按 4 个阶段论述：

1. 20 世纪的政治是以极权主义运动的兴起为主要特色的，它应被说成是有组织的疯狂的政治。这种疯狂性不仅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流血，而且还包含着人类史上最大的野心企图，以便确立对人类本身的内在和外部条件的全面控制。根据破天荒的厚颜无耻的教条式意图，企图建立强制的乌托邦——即地上天堂——遭到了失败，而这种企图正是约 200 年前法国革命在欧洲所引发出来的理性和理想主义冲动的乖张表现。

2. 与极权主义实验失败的同时出现了真正全球规模的人类政治觉醒。这一巧合可能意味着，与当时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有联系的自由民主框架可能适用于世界范围，从而为达成可能的全世界的政治共识奠定基础。然而，在全球范围内起作用的各种分裂的力量可能仍然证明大于种种凝聚的力量。在先进世界地区内日益增长的趋势是，把一种我称之为放任无度的生活方式灌输到自由民主的内涵中去。这种趋势可能会使西方的政治寓意的全球重要性丧失殆尽。只顾达到个人的自我满足，再加上人类通过基因工程和其他科学的自我改变方式——都不受道德制约——重新塑造自己的能力不断增长，这一切往往会提供一种条件，使消费欲望和自身播弄欲望的势头得不到一点自我控制。

相比之下，在较富裕的西方的外面，人们的生活基本上仍在谋求解决生存的根本问题，而非追求铺张浪费。这些不同的趋向有损于和抑制了全球共识的达成，并加剧了日益深化的全球分裂中所固有的危险。

3. 今天，美国是唯一真正的全球大国。但是，只有在传统的国际政治转变成全球政治的背景下它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即政治——在现代通信和日益增强的经济上的相互渗透的影响下——正变成一种消除国内和国际界线的扩展的过程。在这中间，就孕育着产生一个真正的全球社会的可能性。问题是一个不受一系列对全球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念指导的全球大国，究竟能不能长时间地发挥其优势。诚然，美国的力量是真实的；事实上，在可预见的将来，它大概不会受到任何潜在敌人的挑战。无论日本或欧洲——鉴于我在以后篇章中所述理由——实际上不大可能取代美国。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全球地位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但是，由于纵欲无度而产生的种种弱点集中地体现了目前美国文化的可能界定的趋向。除非作出精心的努力来重新确定某些道德标准的中心地位，以便对一味追求个人满足的欲望进行自我控制，否则，美国独占鳌头的时期也不可能持续多久，尽管没有谁能明显地取代美国。

4. 虽然一种单一的和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大的全球政治格局正在呈现，但是，美国却难于在其中行使有效的世界权威——由于来自文化的而非经济的原因所形成的内在弱点，这就可能会出现一种使世界的不稳定性越来越大的局

面。至于地缘政治方面的情况，那大概可以通过欧亚的地区性冲突随着苏联的崩溃而日益加剧来加以说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更令人对这一前景有不祥之感。与此同时，共产主义后世界危机可能加深，破坏了民主对全球的广泛的吸引力，并会促使有千年历史的蛊惑民心的政客集团卷土重来。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冲突也会随之尖锐化。一个反对富国的较贫穷国家的新联盟——或许会以中国为首——也可能随之出现。

这样，在下列诸因素——我们历史进程发展的迅猛，我们塑造世界的能力的增长，我们对物质欲望的快速膨胀，和我们在道德上的含糊不清——相互之间的作用正产生着空前的无法控制的变化的动力。我们大家都在奔向未来，但塑造未来的正是日益加快的变化速度，而不是我们的主观意志。今天的世界更像是一架用自动驾驶仪操纵的飞机，速度连续不断地加快，但没有明确的目的地。

诚然，在冷战结束以后出现了一些可喜的迹象，表明人类现在可以较好地进行更认真的努力把本身组成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尽管如此，根本的事实仍然是，人类为其本身界定一种有意义的存在的能力，正日益受到主观期望和客观社会经济情况之间矛盾的威胁。在这两大趋势间的潜在冲突的内在危险是，世界政治——无论从国际事务方面看，还是从国内的社会情况看——完全可能发生剧变而失去控制，引起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和哲学上的混乱。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有更广泛的、全球性地共同理解政

治存在的目的——即人类相互依赖的条件。迈向这种理解的一个重大步骤就是，致力于界定人的内在和外部强烈渴望的适当限度——最终是道德方面的。这将需要自觉地努力，在社会需求和个人欲望的满足之间，在全球贫困和国家富裕之间，在不负责任地改变自然环境乃至人的本身以及致力于保持自然遗产和真实的人的认同感之间，权衡利弊，找出公平的解决办法。

这是美国目前在乌托邦后时代所面临的严峻的历史性挑战。做出有效回答的出发点是承认，只有通过建立一个受某些共同遵守的自我约束准则所指导的社会，才能有助于塑造出一个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世界。只有具备了这种认识，我们才能确保，在进入21世纪时，我们将成为历史的主人而不是受害者。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于缅因州东北部湾

1992年8月







20 世纪在希望中诞生。它起始于一个相对祥和的氛围之中。一般说来，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享受着较长的和平时期。只爆发了三次重大的国际冲突，打乱了 1815 年维也纳会议确立的体制所维持的基本的和平。1853～1856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使英法与俄国在短时间内相互对抗，但并没有引起重大的地缘政治方面的反响。而 1870～1871 年的普法战争和 1905 年的日俄战争则标志着德国和日本分别以新的潜在的主要角色登上世界舞台。

1900 年的元旦，各大国首都的主导情绪一般说来是充满乐观主义的。全球力量结构看来是稳定的。当时的帝国似乎既是稳固的，又越来越开明。有些国家，像奥匈帝国，甚至本该说成是温和稳健[illegible]的典范。不论是伦敦，还是巴黎、柏林，维也纳或圣彼得堡，这些主要国家都正开始享受着工业革命的成果，同时还蒸蒸日上成为文化中心。艺术、建筑、文学正欣欣向荣，不断改革创新的潮流正产生着充满希望的创造性的精神境界。民主的思想，甚至还有社会民主的思想也开始渗透到当时传统的专制主义的结构之中，但没有起到明显的破坏作用。社会的不平等尽管广泛存在，看来还算正常，但它越来越受到——至少在诸如德国等地方——不断扩大的政府干预的逐步纠正。

最重要的是，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观点，至少在表面上

看，似乎相对地不为感情所动。民族主义正日趋强大，但它尚未占主要地位。统治集团内有着相当大程度的共识，更不用说在其当朝君主之间盛行的联姻了。对科学革命越来越大的信任带来了对人类前途的乐观情绪。有很多评论著作欢呼20世纪的来到是理性时代的真正的开端。

的确，通过科学来表达的理性是有助于把世界变得更美好的。20世纪，在很多与人类生存的实际方面直接攸关的领域里出现了空前的科学上的突破：医药、营养和现代通信。流行病、儿童死亡率和易患各种疾病的灾难大大减少或降低。在世界很多地区，人的预期寿命提高了30%到50%。外科手术和一般医疗方面的创新以及对外层空间的开拓，这些都戏剧性地重新界定了人类生活的边疆。但是，不幸，在道德方面——和标志着20世纪的最大失败的政治方面——没有跟上这种进步。

与其前景看好的情况相反，这个世纪成了人类流血最多和怨恨最深的世纪，成了一个幻觉妄想的政治和骇人听闻的屠杀的世纪。司空见惯的残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杀人是用大规模生产手段有组织地进行的。美好的科学潜力和实际已发生的政治罪恶之间的对照，令人震惊。像这样全球性的无处不存在的屠杀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死了这么多人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出于这般狂妄的非理性的目的，持续不断地集中精力从事肉体消灭，更是旷古未闻。

诚然，在历史上曾有过其他的盛行暴力的时期。在中世纪，世界人口极少，蒙古的铁蹄席卷中欧并入侵中东，按

相对的尺度衡量，它或许造成了更高的死亡率。不过，这类和其他类似的爆发的暴力行动基本上是突发性的——紧张、激烈、嗜血，但很少是持久的。屠杀，特别对非战斗人员的屠杀，是与亲身的搏斗和征服直接关联的；经过系统性的预谋，将屠杀当作长期政策则是罕见的。正是后者集中体现了 20 世纪对政治历史所投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阴影。

第一章

大死亡的世纪

详细地逐一叙述本世纪的大规模屠杀的——其规模之大决非常人所能全面理解和真切感受到的——血腥记录，是没有必要的。但是，简要地用数字统计一下出于政治动机而屠杀的异乎寻常的人数，却是界定本世纪的政治含意和遗产的必要的出发点。(这一死亡人数之巨大应用“大死亡”〔megadeath〕一词来表述，其中“大”字〔mega〕是10的6次方。)

20世纪的空前规模的流血是由界定和主宰该世纪的根本的生存斗争所产生的。这种斗争累积地导致我们时代的两种最大规模的粗暴破坏道德准则的行为——这类暴行把充满希望的世纪变成了有组织的疯狂的世纪。第一种暴行包括持久的和异乎寻常的破坏性战争，不仅造成很高的军队伤亡，而且造成同样多的甚至更多的平民伤亡：两次世界大战和至少30次其他的国际或国内战争(以死亡数不少于数万人来界定)。第二种暴行则包括极权主义的企图，

以便建立所谓的“强制的乌托邦”：在肉体消灭所规定的“社会渣滓”（从理论学说上规定他们为种族或社会净化所不容）的基础上，建立完美的社会。

获得累计死亡的精确数字是不可能的。有些交战的国家——特别是战胜国——对其本身的伤亡情况有相当准确的统计数字；而战败国则往往有档案流失的情况，因此只可能进行估计。计算作为战争副产品所产生的平民死亡人数，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即使在先进国家，诸如德国或日本，对空袭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也只能进行估计。在像苏联或中国这些国家里，计算平民死亡人数的问题特别突出，因为在那里战斗总带来外国占领、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和有组织的政府机构的垮台。

极权主义政权为了实施它们信条上的仇恨的行为所造成的死亡总数，那就更难捉摸了。无论是希特勒、斯大林或是毛都没有公开炫耀他们的集体屠杀的计划。但对犹太人、吉卜赛人或对波兰人的蓄意屠杀是不能算入战争副产品的平民死亡数字之列的。军事征服使屠杀成为可能；而他们则是被蓄意杀害的，并不是军事行动造成的。列宁、斯大林和毛所推行的大规模的内部社会清洗也属于这种情况。

因此，以下的数字都是估计数；但是，重要的是规模而不是确切的数目。就是这种规模（它已达到了空前的、令人无法理解的程度）为本世纪的政治激情和这种激情得以利用的技术手段提供了可怕的标准。（为了把总数弄得齐

全，采用了中间的估计数——因此，以下的总数，如果有用的话，也可能偏低。）

20 世纪的战争中死亡的人数里，大约有 3 300 万人是年轻人，大都在 18 岁到 30 岁之间。他们都是为了民族主义或意识形态，或为两者而捐躯的。两次世界大战算来至少死了 850 万名和 1 900 万名军人，对几个主要的欧洲国家中的天才、能人和基因遗传造成了大规模的生物性的灭绝。本世纪的其他地方的其他战争则造成了另外的大约 600 万名军人的死亡。平民伤亡——真正作为敌对行动的副产品（而不是蓄意的种族灭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共约 1 300 万名妇女、儿童和老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 2 000 万名妇女、儿童和老人。另外，还必须加上爆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中日战争中大约有 1 500 万名中国老百姓的死亡人数。

此外，在其他的战事中可能死了不少于 600 万名平民。其中有 20 世纪初的墨西哥战争；1928～1935 年的巴拉圭—玻利维亚战争；1936 年的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47 年的印巴分治和随后发生的两场战争；1950～1953 年的朝鲜战争；1967 年的尼日利亚内战；1961～1974 年的越南战争以及 1980～1987 年的伊拉克—伊朗战争。这些战争中死亡人数极多。

在战争过程中，杀戮成为毁灭性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因此，平民死亡人数至少和军队的死亡数目一样多。此外，从道德观点来看，更糟的是，所有战斗人员都普遍倾

向于认为敌方的平民是打击的正当目标。尽管最初实施总体战的是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者，但民主国家社会——一旦开了战——同样地屈从于“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这一难于抗拒的原则。在德累斯顿的大轰炸中和原子弹对广岛的毁灭性打击中有数十万无辜的平民被杀，这些都是无声的见证，证实了死亡技术的进步促成道德的败坏。

简言之，本世纪的战争消灭了不少于大约 8 700 万条生命，还要加上无法估计的受伤、截肢或其他病残的人数。

与这些大得惊人的数目相当的，甚至在道德上使之黯然失色的是，一个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总数；它理所当然地给 20 世纪打上了大死亡世纪的烙印：由于信条上的仇恨和激情，蓄意地处死了大量的赤手空拳的个人。有 4 个人——各有一套信条，按其信条，不仅对反对者个人，而且对以种族或阶级所界定的整个一类人进行肉体消灭，而这种做法被认定是对社会有益的——他们主要造成了这种出于政治动机的屠杀。

希特勒为贯彻他的信条蓄意屠杀了 500 万名以上的犹太人（由于通常援引的估计数是 600 万人，我们应当注意到，在劳尔·希尔伯格所写的重要研究著作《欧洲犹太人的毁灭》〔1985〕一书中记载了带考证资料的精确的一览表，就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作了详细的分类，其令人惊骇的总数是不少于 510 万人）；还有约 80 万名吉卜赛人——认出犹太人或吉卜赛人就统统消灭；另外屠杀了 200 万名以上的波兰人，并特别着重灭绝整个波兰的知识阶层；可

能有多达600万名苏联战俘和平民（主要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被蓄意谋杀和饿死（战斗中阵亡或作战后果造成的以及已包括在战争死亡总数中的数百万人均不计在内）；最后，在欧洲的其他地方至少残酷地杀害了200万至300万人，其中单单南斯拉夫就占了受难人数的一半左右。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包括了蓄意杀害的约200万名儿童，这是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发指的杀害婴儿案。简言之，希特勒处死了约1 700万人。

然而，斯大林和毛比他有过之无不及。斯大林从列宁手中继承了一套大规模消灭政治和社会异己分子的行之有效的机制，并进一步加强它。由于列宁——通过内战期间及以后的大规模处决，通过按列宁指示所组建的苏联内务部劳改局中的大规模死亡（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一书中不乏有力的文献资料）和通过冷酷无情所造成的大规模饥荒（列宁对"半野蛮、愚昧和桀傲不驯的俄国村民"的死亡，视若草芥）——可以估计有600万至800万人死亡。

后来，斯大林把这一死亡人数增加了约2倍。按保守的估计，他造成了不少于2 000万人，可能甚至超过2 500万人的死亡。在这一总数中，单就1937～1938年期间，有100万人逐个被枪决，另有200万人死于劳改营。在20年代后期斯大林掌权后的前几年还有100万人被处决。在集体化期间和人为引起的20年代初的大饥荒中，有几百万人死亡。罗伯特·康奎斯特（在他的开创性的和里程碑式的

著作《大恐怖》一书中）估计，总共大约有700万人是斯大林毁灭农民社会中的牺牲品；大约有1 200万人则死在劳改营里。此外，还必须加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被处死的另外的约100万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期间和以后，被无情地大规模驱逐的受害者；以及在1939年至1941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及以后，对被占领的波兰的波兰人和波罗的海地区居民的大规模杀害和流放。

另外，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在它对待战俘方面的记录也是骇人听闻的。根据1992年德国人编纂的资料表明，在二战期间及以后，大约有35.7万名德国战俘死于苏联看押期间。还有几十万名日本、罗马尼亚、匈牙利、芬兰和意大利战俘在苏联的集中营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后，在1939年苏联俘虏的18万名波兰军人中，后来重新露面的仅约4万人。因此，可以臆断，接近100万名战俘死于斯大林的集中营里。

直到今天，在前苏联境内，巨大的秘密坟场星罗棋布，通常位于大城市的郊区——往往在留给人民内务委员部夏季别墅专用的园林内，有些则在已废弃的矿井里——被处决的受害者的尸体成批地（通常在夜间）被埋葬在这些坟场里。就在明斯克（在斯大林时期人口不足100万的城市）附近，80年代后期发现了埋有约20万名处决受害者尸体的坟地。后来，在苏联全境内的每一个大城市附近都发现了类似的坟地。

受害者的大多数人是被随意处决的，几乎被视若草芥。

对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来说，这就是一种阶级清洗的手段，通过“清除”各类敌人整体使社会得到净化。（在苏联垮台以后）从苏联档案中发现的文献表明了苏联领导人对杀人所持的态度，那是病态的丧失人性的态度，更不用说那是根本违反任何文明的司法程序的概念的。杀人简直成了一种官僚主义的职能，无论对于指挥这种行动的领导人，或实施这一行动的执行者说来都是如此。在这方面，纳粹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和共产党对阶级敌人的大规模屠杀有着基本的共同点，因为二者都是彻底丧失人性，对人毫无情感，更不用说同情心了。

叶利钦勇敢地向全世界揭露了有关苏联长期保守秘密的，在1939年纳粹和苏联联合占领波兰以后，苏联于1940年屠杀被俘的波兰军官、官员和知识份子的文件：这些文件提供了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令人心寒的案例。1940年3月5日，人民内务委员部部长贝利亚呈交了一份致“斯大林同志”的备忘录，提供了关在3个集中营的被俘的14 736名波兰军官和苏联各监狱里关押的10 685名波兰政治犯的详细分类情况。所有这些人均被称之为苏联的顽固的敌人，该文件建议应对他们统统处决。同日，政治局开会，这项经签字的1940年3月5日第13号会议记录简单地叙述如下：

1940年3月5日决议——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案件

Ⅰ．转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

1. 战俘营关押的14 700名人员的案卷：前波兰军官、官员、地主、警察、情报官员、宪兵、移居者和罪犯；

2. 以及被捕的和置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里的11 000名人员的案卷：各种反革命、间谍和阴谋组织的成员，前地主，工厂产业主，前波兰军官、官员和难民——通过特别程序予以解决，对他们处以最高刑罚：枪决。

Ⅱ．解决上述案犯无需召唤被捕人员和提出公诉，可按以下程序作出结束调查和判决的决定：

1. 关于根据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战俘局、呈报材料的关押在战俘营里的人员；

2. 关于根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内务委员部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内务委员部呈报材料的被捕人员。

Ⅲ．授权由梅尔库洛夫、卡布洛夫和巴什塔科夫（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第一特别厅厅长）组成的三人小组审理这些案件并下达裁定。

（签字）党中央书记　约·斯大林

全部事情就是如此。用一张纸写上简短的话："对他们处以极刑：枪决"，25 000多条人命（在这一具体案件中他们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精英）就此消灭。这种手段在更大规

模上故伎重演了好几年，用来处决数十万苏联公民，更不用提在苏联内务部劳改局营地里因精疲力竭、饥饿和受虐待而死亡的数百万人。尽管被斯大林处死的确切数字将永久无法获知，但估计在2 000万到2 500万人的范围内，这不会是夸大的。人口普查统计也表明，在斯大林统治期间，另外从生物学角度减少苏联人口的数字甚至更高。无论如何，上述援引的杀害者的估计数应算作是斯大林直接搞的种族灭绝。人口减少——由于出生率降低，因婴儿死亡率高而丧失子嗣和因未来的双亲被囚禁而无法临产等——的确必然超过斯大林个人直接负责的巨大死亡数字。

在1945年后，斯大林的方法被普遍地推广到东欧各国。在每一个卫星国内都建立了集中营——实际上是死亡营，关在里面的新政权的敌人都被折磨死。就这样有数万人死亡。在整个被占领地区内对个人处决的规模甚至无法估计，但肯定有数十万人。在一些积极反对推行共产主义的最坚决的地方——诸如波兰、乌克兰西部、立陶宛和南斯拉夫的部分地区——杀害是大规模进行的，而且随即对涉嫌帮助抵抗运动的当地居民强行大规模驱逐。当苏联军队把德国人赶出波兰以后，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和它的共产党傀儡们对扑灭反纳粹的波兰地下活动特别冷酷无情，因为后者代表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组织得最好的欧洲抵抗运动，故而是共产党统治的最可怕的障碍。

在整个所谓的苏联集团内普遍地谴责了斯大林的罪恶后，竟然没有一个斯大林主义的秘密警察官员、集中营的

主官、行酷刑者或刽子手因犯斯大林主义的罪行而送交审讯，这是粗暴破坏道德准则的行为。直到今天，前纳粹战犯因所犯违反人性的罪行还受到惩罚。共产党垮台后的俄国和东欧报纸连篇累牍地详细地报道了大规模的虐待、秘密处决、审讯时的可怕的酷刑，以及不断发现的秘密埋葬数十万名受害者的集体坟场。随着往事的揭秘，甚至连一些前行刑人的回忆录都已见诸文字。其中一个俄国的实例是，一名前人民内务委员部的行刑人描述他怎样改进在死牢里枪决受害者的技术。他为了不使血溅出来硬把枪管塞进被判罪人的嘴里。还有另一种臭名昭著的情况是，在卡廷和其他地方杀害 15 000 名波兰军官的一些刽子手被查明，至今还在前苏联靠国家养老金活着。但是，令人奇怪地表现出道德上的麻木不仁，时至今日竟没有一个人因犯下这类异常的罪恶而受到审判。

计算中国在共产党实验的最激烈的阶段中死人的数目，那就更难了。与苏联揭露斯大林的罪恶（以及长期拖延和仍不大愿意揭露列宁的罪恶）不同，中国政府坚持认为毛统治时期是相对神圣不可侵犯的，杀人是有道理的，但对杀人的规模则守口如瓶。唯一的例外是，目前中国领导人直接身受其害的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的文化大革命，对这一内部动乱时期的死亡人数，曾出现过一些估计，指出死亡的规模是 100 万至 200 万人。

在早些时期，特别是 50 年代，概略估计有多达数百万人当作“人民的敌人”被处决——主要是地主和富裕的资

产阶级以及前国民党官员和军官。此外，经常被援引的数字是，因强制推行的集体化造成了多达 2 700 万个农民的死亡。考虑到中国人口之众多和现行政府对人命漠不关心，估计共产党时代死了约 2 900 万人很可能偏低，特别是这并没有计及由于这种大规模杀戮对人口影响所造成的中国人口的净减值。

如果不把企图在东欧、北朝鲜、越南、柬埔寨和古巴建立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所付出的生命代价计算在内，那么，上述的死亡分类帐目就不会是完整的。谨慎的估计是，这些地方至少有 300 万名受害者，其中单单在波尔布特统治下的柬埔寨就占了约 1/3。因此，实际总数可能大于这个估计。简言之，20 世纪徒劳费力地建立共产主义，损失了近 6 000万人，使共产主义成为整个历史上生命代价最大的失败。

以上概述记录了 20 世纪大规模道德失误所造成的死亡数目，而这并不包括所有最糟的实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或在印度分治期间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残杀也都是历史上的大污点；由于失控的宗教和种族的激情造成的死亡人数很可能不少于 300 万到 400 万人。

综上所述，在本世纪里被蓄意杀害的令人心寒的总数——不是在实际战斗中阵亡，而是因意识形态或宗教等原因被残酷无情地杀害的——高达 8 000 万人。

因此，在 20 世纪有不少于 1.67 亿人——很可能超过

1.75 亿人——在因政治原因而发生的屠杀中被蓄意地消灭。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法国、意大利和大不列颠的人口总数，或超过目前美国人口总数的 2/3。这个数字超过了人类史上所有以前战争、内部冲突和宗教迫害中的死亡总数。这些骇人听闻的数字尽管枯燥，但也可令人想起，一旦人类天生的进取能力被教条式的自以为是的道德所控制，而且得到破坏力越来越大的技术的加强，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上述对死亡总数的估计无法表达——而其规模之大，人的智力甚至理解不了——在 20 世纪的一对大灾难(即大规模战争和极权主义的革命）中所固有的日积月累的破坏和道德的堕落。西方文明摇篮的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 10 多年的持续不断的破坏和大规模的屠杀。中国和日本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一些世界最大的城市和部分最珍贵的文化艺术品均毁于一旦。人类知识天才的重要部分被勾消。整个社区——特别是欧洲的在艺术上和文化上都具有创造性的犹太人社区——被彻底消灭。

极权主义的打击在降低人的地位方面尤其狠毒。从文化的观点看，无论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不折不扣的野蛮主义的现代变种。在这两种主义的统治下，极权主义的革命对人类文化遗产造成了——而且是蓄意造成的——无可挽回和无法估量的损失。在这方面，纳粹分子在德国和被占领的欧洲的所作所为与俄国或中国的共产党人狂热地横扫先辈们的文化成就的行为，基本上别无二致。在针对

传统价值观的纵欲的返祖现象中，有多少个教室或寺庙被毁，有多少历史遗迹遭破坏，有多少图书馆存书被盗或被焚毁，有多少艺术品被偷窃，和有多少件其他文物被盗或被毁，这是不可能算清楚的，更不用说对人的精神的瓦解了。

但是，这一切与战争和极权主义的种族灭绝所造成的累计死人总数约 1.7 亿人相比，还是相形见绌的。而该估计数字可能只是提供了本世纪人类所经历的政治疯狂的数量规模。

第二章

超凡神话的中心地位

20世纪的悲剧基本上是非始料所及的。在1900年元旦普遍的预测根本没有料到以后会发生意识形态原因的屠杀和政治性的战争。然而，甚至在1900年以前就察觉到可能发生的事情的苗头了。因为已经在19世纪后期，特别在20世纪初，自觉的政治生活，尤其在欧洲，日益开始被宏伟超凡的空想——我称之为*超凡神话*（metamyth）——所吸引和振奋，这类空想能在文化程度日渐提高的人们中取得广泛支持，因而在政治上可动员群众。

这一宏伟超凡的空想可以理解为，是寻求拯救的宗教激情和认为比外来者优越的民族主义的自我认同感，以及降低到平民主义口号水平的乌托邦社会学说的不合乎理性但却颇有吸引力的大杂烩。通过致力于尚待实现的想象中的实际就可摆脱令人不满的现实，超凡神话被用来振奋和诱导群众的情绪——随着识字的普及，增强了超凡神话的政治吸引力，和随着受超凡神话影响的工业技术的发展，使

人类史上空前规模的屠杀有实现可能。

超凡神话作为一个政治因素的出现，必须要在20世纪出现群众性政治觉悟现象的背景下去理解，这现象就是对政治要求有着大规模的敏感性和对政治目标抱有一种激进主义的政治承诺。这种觉悟是较近时期的历史发展。就大部分的历史来说，群众尤其是农民在政治上是消极被动的，基本上不是对政治无动于衷，就是被传统的忠诚所束缚。只有在较少见的情况下——诸如受到异教或操外语的入侵者的挑战，或者极少有的农民不满情绪的自发性爆发——群众才易受激进主义的政治动员的影响。除此之外，在近代以前的占上风的倾向是人民的极大多数对政治无动于衷。

在18世纪末叶，欧洲就开始呈现出群众性政治觉悟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整个19世纪继续扩大，终于在20世纪屡屡发生爆炸性的事件。这一现象的生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3个相互关联的巨大力量：(1) 识字的普及；(2) 工业革命；和 (3) 城市化。这3方面在19世纪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在20世纪更是不断地扩大到各个方面。

在打破政治上的消极被动方面，识字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政治上处于启蒙状态的群众识了字，起初通过小册子就能接受简单的政治观念、口号和概念。在此以前主要是白纸一张的群众心灵突然听到了似乎很中听的概念：目前的不平等不是可以逆来顺受的上帝的行为，而是罪恶昭彰的不公正。个人（典型地指农民）过去只不过是永恒不变的等级制度中的末流鼠辈，而现在是拥有集体人格、权利

和抱负的人民或民族的成员。更重要的是，被剥削的工人不只是前城市农民，而是历史决定的拯救人类的革命阶级的成员。

识字的普及使传播政治思想成为可能。但是，这也意味着政治思想不得不通过意识形态和宣传变成简单的观念。在19世纪，尤其在法国革命期间，还有随后的巴黎公社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印发小册子的作用会变得如此重要，道理就在于此。所有现代的独裁者都依靠简单的口号，这些口号提供了表面上有说服力而根本上是简单化的公式，它们包含着政治上刚刚觉醒的群众的不满和期望。列宁对简单观念尤其是打动人心的口号的重要性特别敏感，利用简单观念和口号的目的在于激起仇恨、不满和被压抑的情绪。依靠和利用政治上的善恶二元论，成为向突然反应热烈的群众解释那本该是复杂的政治现实意义的权宜之计。

值得注意的是，群众政治激进主义起初基本上局限于西欧。碰巧西欧早就是首先普及识字的地区。在19世纪初期，西欧的大部分男人和约1/3的成人女子都已能识字(而美国的情况也一样)。世界的其他地区基本上是文盲遍地。甚至在20世纪初，在欧洲的外围地区（即东欧和南欧）男子识字率只占成人男子总数的大约1/3到1/2，而妇女的识字率则要低得多。世界其他地区的识字者的总数还要低，尽管识字率正迅速上升。

识字作为政治觉醒的关键手段，它本身就是工业革命

的一个副产品；工业革命还通过急剧地打乱社会环境促进这种觉醒。工业化的过程确定了在经济上必须要有最低限度的识字率。无论私人雇主和越来越多的国家本身都承认，为有效地完成工业任务，必须要有一个识字的工人阶级。文盲的工人只能被训练来操作最简单的工作，所以，他们是无生产成效的。机器设备逐步和不断加快的复杂化越来越要求劳动力接受半专业的训练。

工业革命对军队有着同样的影响。在19世纪采用工业革命过程中所生产的武器，这确定了军事人员必须能够准确地履行技术指示，按照字面严格地执行，以及服从往往用书面传达的复杂的命令。起初的最低限度是，军官团必须全部识字；到19世纪初叶，准尉都必须识字；到20世纪初，所有经过训练的士兵都需要至少达到最低程度的识字能力。因此，军队也成了群众性扫盲学校。

工业革命不仅通过识字的普及促进了民众激进主义的崛起；而且民众政治激进主义还受到日益扩大的城市化的推波助澜。例如，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世界城市人口从占总人口数的3%上升到占总人口数的约30%，其中增加的大部分城市人口初期都发生在西欧。这种大规模的转变所带来的唯一结果是，数千万人的生活方式的一场革命，把他们既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彻底废除。突然摆脱传统的乡村生活的农民集中在城市里，就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和桀傲不驯的社会阶级。这个新的城市群体往往在政治上失去方向，因而很容易接受简单的政治号召，他

们渴求——的确，他们需要——对他们所处的令人困惑的和往往是严酷的环境能作出某些令人信服的解释。由于宗教已不再能满足这一要求，于是政治就乘虚而入。

可以这么说，19世纪是民众政治觉醒崛起的第一阶段。起始于西欧然后逐步转向外界，到了20世纪政治觉醒已扩大到东欧和远东的部分地区。（美国是个特殊情况，因为从一开头特别从大规模移民开始起，它就是一个由至少有部分政治觉悟的人民所组成的社会——也就是说，这些人是极不满于他们原先的处境，决心闯到遥远的大陆上过完全不同的生活。）识字的普及、工业化和城市化三者加在一起促成了新的政治觉悟，它所翘首以待的正是要用可信的和政治上起催化作用的内容来充实。

20世纪的超凡神话最终提供了这类最极端的变异内容。但它们本身是通过法国革命对欧洲的冲击，以最大的激情所引发的种种学说和见解混杂的　　而且的确是反常的——产物。那场革命对平民主义的政治激进主义起到了重要的历史性的催化作用。这种激进主义的形成是受到新的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意识，和政治上武断但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以及对“理性的”社会工程的无限范围的非理性的信仰诸方面的影响。民族主义、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汇集在一起——同识字的普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互作用——酿成的混合物，一旦转变，后来就成了20世纪怪异的超凡神话。

诚然，民族主义不单单是法国革命的产物，但法国革

命却是火花，它大规模地点燃了早在18世纪末已隐伏在几个欧洲国家里的民族意识。特别在法国、德国和波兰，在18世纪的后50年内，民族意识的增强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已经十分明显。在法国，作为一种以语言类同性为依据的有机整体的民族观念甚至早就存在，在17世纪这不仅是官方的立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公众所接受。早在1694年，《法国科学院辞典》就对“民族”下定义为，“生活在同一国家、同一地域、受同一种法律管辖、操同一种语言的全体居民”。尽管社会的结构是建立在君主政体至上的传统的等级制的基础之上，法国的政治特点甚至早在法国革命以前就受到具有语言特征的民族自觉性的广泛影响。

在德国，在18世纪的后半期，约翰·哥德弗里德·赫尔德的著作在政治上分裂的德国打动了人心，引起共鸣；他竭力鼓吹德国人——“人民”——的超凡的统一整体性，并声称人只能认为自己是该有机社会的一名自觉的成员。赫尔德说，这个社会被语言的类同性所界定，并具有特定的个性——因此，它的政治形式应最终反映出通过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独一无二的认同感。

在18世纪末的波兰，有一场姗姗来迟的针对这个半封建的选举人王国的贪污成风和无能机构的民族革新运动，这场运动是由塔·柯斯丘什科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在很多方面，他是第一个现代波兰民族伟人的缩影。作为一个曾经抗击过俄罗斯帝国对波兰入侵的年轻职业军官，他被美国对独立的执著追求所倾倒，甚至横渡重洋投身于这一

事业。后来他返回波兰，积极从事于抵制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不遗余力地瓜分波兰的活动。他在抵制的过程中，号召“人民”和“民族”要把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革作为真正的民族抵抗运动的出发点。尽管在战斗中遭到了失败，柯斯丘什科领导的运动仍激发了初期的民族意识，甚至在政治上消极被动的波兰农民中也激起了共鸣。

在法国革命之后的拿破仑冒险的失败以及1815年维也纳会议所强加的基本上是革命前的秩序，这些都不再能够扑灭前25年中的有影响的大事所点燃的火焰。民族意识已席卷整个欧洲，而在19世纪积极地施展深深植根于来自法国革命经验的新的政治词汇和术语之中的民族抱负，蔚然成风。保守的君主们和支持他们的贵族人士——他们都是“国际主义者”，或“超民族主义者”，或更准确地说，在世界观方面是“非民族主义者”——完全低估了不仅是新的城市居民的潜在倾向，而且是农民的内在习性；两者都极易接受利用和挑起语言与种族固有的民族认同感的本能觉醒的政治呼吁。

因此，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像意大利的朱泽培·马志尼或匈牙利的拉约什·科苏特及其他地方的其他人那样的领导人，正是他们精心地为他们自己的人民提出了理论概念和逻辑依据，要个人服从一个更高的新实体——民族，并与之保持完全一致。确立民族国家——正如马志尼所竭力鼓吹的那样，“尽其全力和优势使个人服从于民族国家，甚至完全牺牲个人也在所不惜。”——已成了“青年意大利”

运动的执著的目标。该运动已成为现代意大利民族主义的先驱和导火线。

显而易见，其他地方也有很类似的情况。例如，在匈牙利，赫尔德强调独特的语言是共有政治认同感的关键因素，以及马志尼的民族复兴运动和波兰为独立而斗争的戏剧性事件，这些促成了拉约什·科苏特的“青年匈牙利协会”的创立。它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宪政的匈牙利民族国家，这个实体将避免法国雅各宾党人的过火行为，但不再屈从于外国。它强调乌戈尔语是本身被超然的个性——民族——所界定的一国人民之间的特殊纽带。

当旧的基本上是保守的和前民族主义秩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分崩离析之时，也正是欧洲采取政治行动的时机成熟之际；它确定了当时所谓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方向——民族国家至高无上的观念成为政治组织和群众自我认同的基本要素。后来，这一原则还普遍适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殖民地后时期。

法国革命在给新兴的欧洲民族意识竭力灌输理想主义，突出信仰理性之无限和从世俗偏见出发反对既有的宗教等方面，也起了关键作用。这些因素反过来证明，不仅对界定19世纪群众政治觉醒的内容至关重要，而且对最终在20世纪把这种觉醒引向极权主义的超凡神话的邪路，也有重大关系。

在卢梭的著作中得到了可能最好阐述的理想主义主张建立一个在和谐基础上的，意识到普遍意志的和深知其民

族认同的社会。《人权宣言》不仅是革命性地打破了以特权等级制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的观念，而且它界定了一个主张以公民为核心的新的社会概念。这个社会要“合乎理性地”组织——成为平等的单位（或部门），实行平等的赋税制度，贯彻强调民族价值观念的全国教育制度，以及甚至实施以十进制为基础的新日历所表达的超理性的时间观念。

由于在相当程度上，教会过去一直捍卫着传统的秩序，它的力量必将予以瓦解。随着忠于民族国家的观念上升到最高的道德守则，教会的教义也就被取而代之。此外，笃诚的信念认为“理性”——而非宗教界定的道德——可以指导政治行为，它就形成了一种为理想主义的目标而从事社会工程的倾向。以一种反常的方式，平素适合建立美满社会的浪漫的理想主义竟同教条式的信仰——认为人类有能力来实现这一社会的理性蓝图——结合起来。

起初，在19世纪的前半期，新政治的效应总的说来是相当温和的。贝尼迪托·克罗齐在他的宏篇巨作《19世纪的欧洲历史》一书中，追溯了作为主宰欧洲政治生活的动力的自由主义是如何逐步传播的。被浪漫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左右的自由主义革命的本性是温和的，它既不嗜血也不狂热。1848年的“民族之春”堪称典范。但是，克罗齐也注意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痛苦越来越促成以下的情况：克服社会不公比实现政治自由更是当务之急；民族主义——特别在德国统一之后——正和帝国主义融为一

体；颂扬战争正成为民族主义说教的主调；宣传革命的思想正甚嚣尘上，震耳欲聋。

1871年的巴黎公社——及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是群众政治觉悟容易采取流血形式的信号，城市工业实体的社会紧张状况戏剧性地证明：阶级觉悟的意识日益提高，阶级对抗也日趋紧张。与此同时，法德战争产生了好战的德国民族主义。此外，其他地方的民族主义也对加剧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火上添油。到19世纪末，民族主义、理想主义、理性主义和现世主义沆瀣一气，产生了日益增强的沙文主义、乌托邦主义、教条主义和善恶二元论。后者的各项分别是前者各项逐步变异的结果；而沙文主义、乌托邦主义、教条主义和善恶二元论汇集在一起就集中体现了20世纪的超凡神话的中心内容。

在20世纪的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催化作用堪与法国革命等量齐观。它打碎了自从1815年以来存在的传统秩序，这个秩序至少在表面上成功地压制了和无视于法国革命所释放出的种种势力。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摧毁了保守的价值观念，并使残存的传统权威，主要是当权的君主政体的合法性荡然无存。它把民族主义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同时加剧了已经深化的社会危机。于是，它为设想超凡的乌托邦思想是拯救尘世苦难的种种学说铺平了道路，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起了重大的催化作用，超凡神话号召力的准备工作却早在19世纪的后半期就已进

行了。如前所述，正是在这一时期，民族主义越来越采取沙文主义或帝国主义，或两者兼有的形式；理想主义被神秘化而成了乌托邦的憧憬；对理性的高度信心变成了教条式的非理性，认为人类有能力设计和建立完美无缺的社会；对宗教的攻击也导致将道德准则视为对政治行动的制约而加以摒弃。结果，在19世纪，旨在蛊惑群众的在政治煽动中占上风的道德相对主义，逐步取代了对政治行为负有个人道德责任的贵族式的观念。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主义被改变了方向，并且被重新注入内容，从而具有侵略性和走向暴政。

马克思主义和沙文主义都为新近占主导地位的煽动性的政治风尚提供了内容。但是，当二者竞相左右20世纪的政治时，在法国革命的理想主义激情与对理性的信仰和后来的20世纪极权主义现象之间，充当传送带的正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把革命的概念提高到道义上拯救人类的使命，与此同时，称革命是历史上无法避免的；它提出全面的政治控制乃是创立现世乌托邦的出发点。在19世纪中突出明显的这个重要启迪，随后繁衍成20世纪的几个衍生物：列宁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主义。

卡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的警世预言的开篇——"一个游荡在欧洲的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一个世纪里都适用于全世界。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之后是1905年的圣彼得堡的街垒之战，并为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的动乱准备了条件。但是，不久随着20年代初期作为法

西斯主义倡导人的意大利社会主义鼓动家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崛起，社会主义也被沙文主义玷污了。法西斯主义是把民族主义推向极端颂扬国家的学说，并要实现国家垄断——按照社会主义的一贯说法——行使重要的和直接的经济职能。然而，尽管法西斯主义在两次大战之间间隙期内的欧洲赢得了很多支持者，作为20世纪出现的两个最强有力和最具破坏性的超凡神话，却是希特勒主义和列宁主义，因为二者统治了20世纪的大部分的政治生活，同时造成了在该世纪内所遭受的历史上空前大死亡中的大部分死亡。

阿道夫·希特勒和弗拉基米尔·列宁把上一个世纪里出现的和隐伏在遭第一次世界大战蹂躏的欧洲内的各种政治思想和更多的形形色色的政治情绪，综合汇集成具有凝聚力和吸引力的整体。尽管各自提出的综合思想在着重点上有很大的不同——种族仇恨的学说塑造了希特勒的历史观，而列宁的历史观则是阶级斗争——但说到底，他们两人学说的机制涵义和方法后果却很相似。希特勒和列宁都竭力鼓吹依靠恐怖和在教条上名正言顺的极权主义，并成了这种极权主义的化身。他们各自抱着与上个世纪里意思完全不同的理想要力争创立一个强制性的乌托邦。他们都是宣传和鼓动大师。他们也都善于不把敌人当作个人看待，从而把杀人变成冷酷的大规模生产过程。

阿伦·布洛克在其权威性的著作《希特勒和斯大林》(1991年)一书中，深刻地对比了这两个作为独特的极权主义领导人的病态的大屠夫，但是，应该注意到，在操纵群

众政治方面希特勒和列宁有很多地方很相似——而对斯大林则更多地令人想起希姆莱（希特勒的盖世太保的头子）。前两人主要靠煽动来动员支持者，而后两人则是组织上的凶神恶煞。前者甚至在他们的公开言论中也毫不掩饰其残忍好杀戮，断然热中于公开主张实施恐怖和屠杀，后者则多为秘密行事，甚至偶尔还装出点个人的敏感性；前者具有非凡的魅力，而后者则有官僚主义的政治作风。

希特勒和列宁的号召之所以能一呼百应，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前几十年的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早就使很多人抱有乌托邦的幻想。对希特勒和列宁的初期胜利起极重大作用的，正是他们借以利用和动员群众的这种政治意识的性质内容。考虑到20年代初期的普遍的环境条件，也考虑到在前几十年里其追随者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开始萌发了政治觉醒和确定了初步的政治方向，希特勒和列宁就不难发动狂热的真诚信仰者蜂涌尾随，和挑起群众的本能的仇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追随者的世界观是极容易接受原始的、半理性的但高度激情的感染力：对现实采取逃避主义，解释问题采取简单的善恶二元论，在态度上则是极端的诡辩和伪善。

欧洲人的心理——特别在战败后的德国和在战败与革命后的俄国——是容易接受对有秩序地走向必然的和满足社会需要的胜利的憧憬。德国和俄国的困惑不解和饱经苦难的人民更容易接受善恶二元论来解释眼前的混乱和苦难——犹太人和资本家是罪恶的阴谋家，应该统统消灭。而

一旦政权得到巩固，狂热主义变成种族灭绝只不过是一个时间和条件的问题而已。

第三章

强制性的乌托邦

20 世纪极权主义经验的最终意义超越了由于如此狂热宣传的宏伟的超凡空想所蓄意制造的死亡规模。它包括强迫人类进入真正怪诞的乌托邦的徒劳的企图。尽管这种企图最终失败了，它在政治上集中体现了人类史上最极端的和在哲学上最狂妄的举动，其目的在于控制人类环境的整体，教条式地界定人类的社会组织，甚至限制人的个性。简言之，强制性的乌托邦的缔造者把人类历来托付给上帝的角色分配给他们自己来担当了。

诚然，社会演进的本身包括逐步地雄心勃勃地控制人类自身的命运。这种追求是世世代代稳步地实施的，经历过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方面的宿命论，和自发地自我接受个人逐步遵从日益增强的天人合一的倾向。但是，总的说来，在大部分已知的和全部未知的历史中，人类一直是相对地顺从其周围的世界的，承认本身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生存的严峻要求都被认为是“自然的”而恭顺地承受下来。

社会存在的基本内容——繁殖后代、建立家庭和根据共同的语言及经济利害关系所形成的有限的群居——全都成了固有的和自发的现实的内容。

然而，长时间的积累知识的过程逐步使人类增强了对自然的一定程度的控制——最初是通过有组织的农业——并且逐步形成较为复杂的种种社会组织的形式。人类开始一步一步地懂得了四季的变化、测算星座、以及计算和报告时间的流逝，甚至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认识的提高不仅加强了人类进行有限控制的能力，而且还引起更强烈的渴望，力求了解笼罩和主宰着人类生活的神秘的世界。

于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大宗教——原先是较原始地迷信和通过各种仪式崇拜人类意识到的冥冥中的强有力的自然力（例如，太阳神）——作为认识提高的和较成熟地认可的学说，便应运而生了。这种认识无所不包地解释了人类生存的原因——最初的起因、最终的目的和最后的地位。因此，根据对冥冥世界深不可测的认识为本的大宗教就成了对生命最终之谜的“理性的”和感性的恢宏解释之源。

宗教还用作认可事物的自然序列的学说。根据不同情况，这种认可或可界定为原罪，如宿命地接受前世生活模式，或可认为是逃避现实而内心祈求幸福。总之，宗教的作用是制约人类默认存在的秩序。生命的真正回报，要么来自人体终结之后的来世，要么通过内省而得的精神彻悟。

广义地说，大宗教的兴起是在人类演进上升到一定阶

段上发生的，在那个阶段上，人类有关生命意义的超凡问题与人类更有组织地努力从被动地屈从自然变化中解放自己，两者同时发生。这些努力带来更为复杂的政治制度，和通过农业、灌溉或开矿作出更为协调一致的努力以与自然界抗衡。把生命理解和认可为主要是精神体验的学说，提供了一种新的演绎推理，给越来越不安的人类以历数千年经久不衰的规则和指导的框架。

然而，这个框架在现代历史的过程中逐渐被削弱了。工业革命促使人类向自然界统治生命的挑战能力有了量的飞跃。现世学说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到尘世生存的中心地位，提高人类的凡体俗身而贬低人类的精神领域。最终甚至认为，只要忠实地遵从所揭示的新的真理，人间天堂也是可以达到的目标。

这个趋向随着现代极权主义的超凡神话的出现采取了最极端的方式。希特勒主义和列宁—斯大林主义都篡夺了大宗教的角色。它们是靠摒弃宗教的前提，特别是摒弃其物质从属于精神的前提而僭越其位的。此外，在真正的政治实践中，二者都不折不扣地主张极权主义的独裁者实际上是现世的上帝：永远正确、无所不知、胸怀博爱和被人热爱的、全能的因此是战无不胜的，并因历史的必然性而达到不朽。强制地创立的乌托邦——根据独裁者所散播的学说——是人类力求自我解放，摆脱自然及飘渺的神秘感的最终结局，其先决条件是一种被救赎者的全面成功和对被判罪者的彻底摒弃。

实际上，20世纪的极权主义认为最过头的要求也是可能的：即全人类的知识和全人类的抱负都可以浓缩为一个统一的学说，其依据是一个神明般的领导人的金口玉言。通过强制地创立现世的乌托邦来实现超凡的神话乃是完成历史使命。

回顾过去，20世纪的一大谜确实是，怎么样和为什么有相当大数量的明智和理想主义的人们（不仅在德国或俄国，而是全世界，特别是在所谓的知识分子中间）当真被希特勒和列宁/斯大林各自宣传的乌托邦思想所吸引。这些空想的计划与疯狂几无二样——不论是《我的奋斗》里的种族主义的胡言乱语，还是有关“国家趋于消亡”的谬论——但这些都为数百万追随者视为神赐地接受了。它提出了一个恼人的问题，即在多大程度上人性固有的带破坏性和非理性的一面易于接受蛊惑人心的鼓动。成千万人被杀，因为出于种族或社会的原因，他们被认为是不配生活在世上的乌托邦里的；另外更多的人则被强制生活在这种制度之下，这一切都证明超凡神话所具有的催眠性的吸引力；它设想在全面控制的强制性的乌托邦里可以达到历史的终结和臻于至善至美。

强制性的乌托邦终于成为自愿的要求，从而达到学说熏陶的最后胜利。这种熏陶反过来又因蓄意利用人的弱点而得到加强，特别是利用人有本领把不道德的私利理性化，认为它是必要的，甚至是合理的。保加利亚裔的法国学者什维坦·托多罗夫在他的《极端的面目》(1991年）这部有

关极权主义恐怖对人的个性影响的研究著作中，注意到现代极权主义制度是怎样充分地利用人的基本习性使之遵从。在确立了舆论一律的不可抗拒和个人无能为力的印象之后，纳粹和共产党通过提倡互有戒心和群众告发腐蚀了它们社会的道德风尚。其目的是要把即便是内部的抵抗都变成自我怀疑的根源，并变成一种偏向，最终使孤立的持异议者也不得不悔改。

在目前可获得的所有前共产党国家中一度是秘密的档案里透露，大规模逮捕和处决很多人的基本动力是名副其实的狂热的告发促成的。这类档案不折不扣地包括无数份的邻居告发邻居，甚至亲戚告发亲戚的书面材料。这种做法正是作为意识形态熏陶过程的一部分而处心积虑地加以提倡的。从很多方面看，可对20世纪极权主义作了最重大的道德指控是——与试图制约道德败坏的法治的民主国家不同，也与竭力提高个人道德的宗教不同——纳粹和共产党都蓄意煽动人的道德畸变。

苏联秘密档案的开放——还有某些前东欧共产党国家秘密档案的开放——和公开接触以前一直秘而不宣的社会经济统计数字都表明，共产党极权主义实际上甚至比它的最严厉的批评者所指责的还要有罪和残暴，以及对社会具有更大的破坏性。这不仅是一种大规模谋杀制度——其规模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是蓄意腐蚀社会道德风尚和恣意毁坏实际环境的制度。简言之，社会的灵魂和肉体都成了这种制度的牺牲品。

大规模地和强制地征募告密者促成了道德的沦丧。广泛的社会各界人士逐步地被征集、被诱骗或被强迫去采取一种道德上具有破坏性和人际关系上令人生畏的行为方式。甚至最亲密的友好关系——的确，甚至夫妻的爱情——都免不了有致命的恐惧，害怕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思想可能会被揭发。结果是社会基本上成了这个制度的帮凶——正如共产主义垮台后，共产党后的东欧和俄罗斯所发现的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情况。

社会的伦理道德的沦丧——通过削弱社会的凝聚力可能会在一段时间里使这个制度在政治上变得更加强大。这也可能是一心要保持权力的共产党统治者的无所顾忌的计谋。然而，很难找出哪怕是一点点的理性解释来说明，整个以前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为什么会不顾后果地破坏自然环境。共产党政策的生态后果对社会有如此大的破坏性，对人的生活条件有如此大的危险性——成万人因各种疾病和生育缺陷而畸形，以及整个地区被污染得面目全非——以至于人们几乎不得不怀疑，共产党的精英们不自觉地把自己看成在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因而对后代人的命运漠不关心。

涉及这种大规模犯罪行为的一个矛盾现象是：要想做到全面控制的努力实际上却生产了一台自我毁灭的机器，它以一定的方式和在一定的程度上破坏了社会价值观念和实际环境，以至于在某一点上这个制度必然会垮台。说到底，这个自杀性的动力的根本原因是，认为为了乌托邦的

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这种道德上应受严责的观念——结果，甚至连共产党统治者都不再有任何能界定政治统治的准则和限度的自我的道德指导方针。因此，他们对全面控制的追求产生了特别有利于他们自己长存不衰的盲目的权力。

这种权力的范围是无所不包的。共产党和纳粹的信条都断言它们具有普遍意义——尽管它们有很多重大的不同之处。纳粹的蓝图是要使德国居于一个新的全球等级制的顶峰，这个等级制的结构的基础是认定和排出优秀种族和等而下之的顺序的所谓科学基因法则。共产党的蓝图则认为，实现共产党先锋队的世界革命乃是人类历史性拯救的最终行为，以便把人类推进到社会主义，然后再进入共产主义。

诚然，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历史的结局会在世界范围内要么实现纳粹的“新秩序”，要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不论哪种情况，为精选的人们（无论在德国或在俄国）所强制建立的乌托邦只是第一阶段，是超凡地转变全人类生活方式的出发点。因此，纳粹的乌托邦具有国内和国际的性质。显然是西欧人中最有教养的德国人被告知，他们注定要领导先在欧洲后在全世界的种族纯化运动，而真正德国人的理想的“雅利安种”的特点则充斥在全国各地的招贴告示牌上。尽管没有几个德国人——包括元首本人在内——能够当上这种楷模，但这点看来无足轻重。

德国社会本身的基础有两个中心组成部分：集体的

"人民"和这类"人民"意志的体现——"元首"。希特勒一再强调他本人和德国"人民"之间的共生共存的关系："我完全属于德国人民，我为德国人民奋斗。"纳粹的理论家利用德国的浪漫主义传统强调说，把德国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而遭到的集体蹂躏中解救出来，和摆脱掉资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的腐败，靠的不是这样的国家，而是因血统和精神而团结一致的、受个人化身领导的神秘和种族纯化的"人民"。

纳粹主义在其早期的国内阶段与共产党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的谴责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1920年的创建纲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二十五点"纲领——强调反对资本主义和排斥犹太主义，但是，这个运动特别强调使战败的德国重新在世界中获得适当地位的紧迫的任务目标。此外，希特勒明确地摒斥平等的观念，认为这种主张是犹太教—基督教阴谋。他说："人类平等的信念是，正在征服世界的犹太教在基督教的帮助下施展的一种催眠的咒语。"种族等级制要取代平等，"雅利安种族"应有权利充当领导。因此，德国要成为统一的但按等级制组成的欧洲的领导人，并以德国"人民"——德国非犹太族的白种人——对所有外国和腐败分子进行种族净化。特别强调两个目标：德国要通过领土扩张获取"生存空间"和彻底消灭犹太人。

在领土上扩张的德国要得到欧洲西北部的顺从的卫星国和东欧的被奴役的殖民地的支持。还考虑到要在特别适

当的地方——如克里米亚——建立远方的堡垒式的德国居留地（仿照罗马军团的模式）并用专门的“高速公路”与德国连接起来，总的来说，世界权力的结构要建立在帝国原则的基础之上，而以种族要素——特别仇视犹太人和蔑视斯拉夫人——来界定等级制。

作为象征世界首都的柏林要大规模重建，以突出芸芸众生屈从于极权主义领导人的压倒一切的权力。按照希特勒的意旨所提出的计划，包括为元首建造一个新的总理官署来取代30年代后期纳粹所建的那个宏伟建筑物，前者将比后者大70倍，并含有一套给希特勒的住房，它是俾斯麦住房的150倍。使旧国会大厦相形见绌的建筑物的圆屋顶高达350米，并有供忠实信徒们坐的10万张座位。国会大厅则可容纳6万人；体育场可容纳50万名观众；检阅场地可容纳100万人；而市中心的迎宾大街则比巴黎的爱丽舍大街要宽3倍。正如希特勒在1939年所说，“在今天的技术可能性允许的范围内，我们必须建造尽量大的建筑物；我们必须为永世长存而建筑。”

对未来的这种憧憬，被元首本人在其最终是非理性的《我的奋斗》中和被罗森贝格的伪科学沉思录《种族和种族历史》（或《20世纪的神话》）中，给予了历史性的合法地位。这两部著作理所当然地会使人提出各自的作者是否精神正常的严肃的问题。由于每一个欧洲最有教养的人还被迫以滑稽的方式——挺直右臂高喊“嗨，希特勒!”——来相互致意，人们几乎会认为一部讽刺作品已成为现实生活

了。在20世纪后期，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30年代和40年代的人几乎不可能想象出，一个现代和文明的社会竟会忍受纳粹的荒谬绝伦之举。

与希特勒主义不同，共产主义的确为其乌托邦规划了一个表面上是理性的蓝图，此外，它源于显然是理想主义的冲动。但是，它在实施过程中被推到非理性的程度，从而产生的后果在造成大规模死亡方面甚至更具有破坏性，在道德后果方面也至少是同样令人反感的。实际上，共产主义可以被看成是现世傲慢自大的出现的最高阶段。它不仅断言掌握了全面"科学地"透视整个人类经验的内在运行机制（"一门历史科学"）的钥匙，而且还预见到全人类（当然，剥削阶级除外）进入极乐天堂的情景。

共产主义在其制度形式上把最高政治领导人捧到了活着的上帝的地位，这一点很像纳粹主义。这种崇拜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齐奥塞斯库和其他人的很多实例中达到了荒谬的无以复加的程度，使"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实践者竟然对保存的和公开展示的原创始人的遗体顶礼膜拜。按照这种方式，群众的虔诚狂热要被诱导和纳入信奉得体的现世形式。

共产党的乌托邦是通过强制和再教育并举来实现的。尽管看来比纳粹的那付滑稽相要有理性，共产党的看法在很多方面包含着对人的个性的更大的误解和重新塑造个性的野心勃勃的目标。归根结蒂，纳粹诉诸人们的确已存在的某些卑劣本能，并最充分地加以利用。共产党则诉诸理

想化的本能，并无所顾忌地加以极度的歪曲。

共产党的乌托邦除了很笼统地谈到无阶级和无利润的社会外，无论马克思或恩格斯都没有以任何详细蓝图的方式来加以阐述。实际上创立这个乌托邦并使之概念化的工作是由列宁和斯大林去做的。于1923年突然早逝的列宁的贡献是，集中精力缔造真正信仰者的政党；它充当了无产阶级的化身，特别是因为据说无产阶级缺少充分的阶级意识。建立新制度和设法界定其社会内涵则是斯大林的历史命运。

斯大林是通过实践和理论来确定他的乌托邦的概念的。广义地说，首先是实践。五年计划，特别是集体化和工业化（后者促成了真正的公社城市的迅速增长）实际上成为，建立一个完全无阶级的因而是“极乐的”社会过程中的发展阶段。为了达到这个乌托邦的目标，苏联的社会遭到了比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所经受的苦难程度还要深的蹂躏和破坏(有数百万人被害)，然后按照斯大林的基本的信条戒律重新建设。由上而来的这场革命中出现的制度乃是进行全面控制的制度：规定个人接受对其生活的政治控制；使社会在政治上从属于受控制的社会工程；甚至要使历史的规律听命于党的控制。

在发展过程中，对领导人的迷信逐步取代了列宁主义的对党的迷信，从而增加了斯大林主义和希特勒主义之间在制度上的类同性，并加速建立真正极权主义制度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有着神权帝王般的自信。

斯大林被认为对任何事物都能夸夸其谈，不论是艺术还是科学；而他的宠儿们甚至都自命不凡地向诗人和音乐家们振振有辞地侈谈什么是正确的艺术。希特勒在致力于建立德国的强权时则根据种族纯化的理由，毫不犹豫地使德国丧失了某些杰出的人才（例如，驱逐艾伯特·爱因斯坦)。

在去世前不久和为了维护其"所有科学家的科学家"的至尊地位，斯大林企图阐明一项可能被认为是未来蓝图的计划。1952年，斯大林在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长篇巨作中，对那些认为社会主义是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反映的机械决定论者和那些否认有"历史的客观规律"的唯意志论者进行了抨击。实际上，斯大林断言，通过运用辩证法，他自己可以对历史转变过程中的主客观力量之间的正确对比，提出独特的永无失误的真知灼见，然后进一步拟定他自己的关于通向共产主义的"国家经济均衡发展规律"的概念。

斯大林的计划虽然基本上是概念性的内容，看来却预示着50年代后期的又一个可能与30年代的苦难时期相似的严重的社会动荡阶段。然而，斯大林突然去世，因而过了10年才有一个新的蓝图揭晓。那是在1961年所通过的苏共纲领，它明确指出苏联在与美国的竞争中正取得日益临近的胜利。乌托邦的定义特别着重于要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斯大林的继承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则对预期中的历史性胜利得意洋洋。

声称"共产主义是全人类最光明的前途"的1970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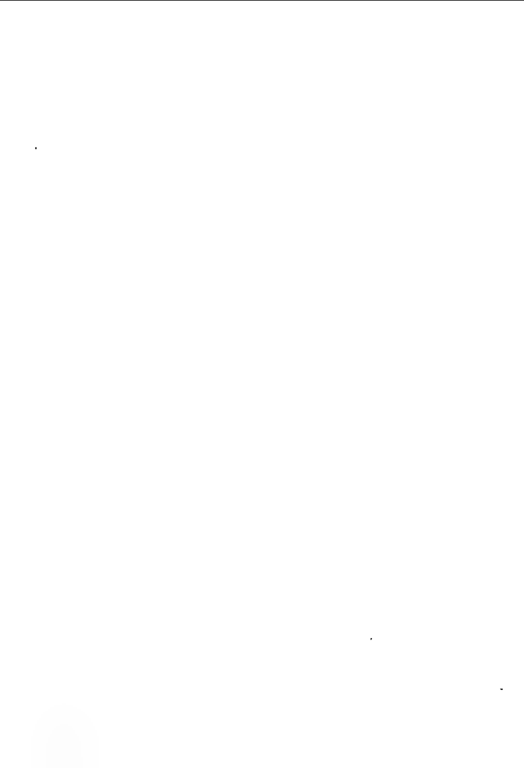
纲领指出，即便假设美国保持其增长速度，苏联的工业生产量按“最保守的估计”也会超过美国工业产量的5%，而到1980年它将上升到美国产量的170%。这个纲领进而大胆地断言，到1980年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产量将占全球产量的60%，而“帝国主义阵营”只占全球产量的不到30%。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即便在生活标准方面，苏联也将超过美国；“随之而来的是，全体工作人员都将享有最短的工作日，丰富的物质和文化财富以及较高的生活水准”。用新党纲的理论解释者、科学院院士斯·斯特鲁米林的话来说，“帝国主义已明显地进入衰亡时期”。这些论断都是作为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提出的，它们所作的历史预测从来是不犯错误的。

实际上，在20世纪结束前，共产主义的胜利就该已经来临了。随着世界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人类最终就能对人的志向、社会能力、自然环境和宇宙奥秘之间的以前一直是令人不安和认识上难以捉摸的关系，进行全面的控制。通过在起初是强制性，但最终是自愿的乌托邦的背景下所提供的教条式的解决办法，人类生活的最后的难题就可迎刃而解。

因此，20世纪极权主义的挑战就是乌托邦的狂妄自信达到历史上空前的无以复加程度的挑战。20世纪是空前地致力于建立全面的社会控制的第一个世纪：形成使历史会停顿下来的乌托邦；在这种乌托邦里，教条式的真理在一套严格的等级制下将成为制度化；被解救的人都知道未来

的世世代代也要生活在同一的社会框架之内。20世纪是这样一个世纪：人类——受到非理性的超凡神话的推动——在这个世纪里力图僭越神明，并被投入一场人类自己制造的大灾变之中。





人类是不是汲取了历史的教训？在21世纪的前夕，对20世纪政治疯狂的反应，人类的政治观点会不会变得更加成熟？目前会不会在全球范围内达到对自由民主的共识？还有，最后而又重要的一点，自由民主的概念是不是对社会生存中出现的新的困境作出了有意义的回答？

人们肯定会说，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失败为全世界欣然接受200多年前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所激发出来的政治观点，创造了条件。它们关于人性和社会政治组织的满怀希望的主张，并没有因为20世纪极权主义必然的倒行逆施而成为泡影。民主的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实际经验的例子是不言而喻的。这不仅可加深应从极权主义挑战的失败中所汲取的教训，而且还会增强自由民主概念本身的吸引力。

然而，受历史局限的汲取教训的过程，特别从全球角度认真研究的话，实际上是一种幻想，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有充分理由认为，20世纪是欧洲的最后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世界事务基本上取决于欧洲的利害关系和被源出于欧洲的事件所左右。根据这一看法，即便是最严重的极权主义的罪恶也都可以视为特殊的欧洲历史的附带结果——欧洲的历史特别倾向于沙文主义、信奉上的狂热、热中于乌托邦的和善恶二元论的政治解决办法。因此，这些日积月累的倾向的消失不应被认为是自动地确认了替代它

的自由民主观点普遍有效。

法国的历史学家让-玛丽·多米娜克曾正确地指出，西方人士在为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欢呼时，他们没有全面领会这一事实：他们可能正为向欧洲最后的使历史理性化和世界化的企图而挥手告别。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不难想象，共产主义的消失可能会在北非、南美或拉丁美洲这些地区里产生完全不同的后果。同时，随着西方普济主义的结束，还会有进一步的风险：西方的政治自由主义加上日益增强的社会享乐主义很可能在其他地方引起十足的妒忌而不是肯定的民主承诺。

至于极权主义时代的思想遗产是什么的问题，对于全球政治制度的未来的稳定性来说，它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今天，这个制度在历史上首次包括真正在政治上觉醒的广大人口。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的新的现实。它促成了对政治觉醒基本上限于欧洲——不久前是全球权力的政治中心——和遥远的北美的时代的历史性的基本终了。

如前所述，人类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政治觉醒乃是基本上体现了欧洲经验延续过程的结果。像在欧洲一样，识字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和人口的日益城市化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新的全球通信手段的因素更加强了这些影响，它通过一种新的接近感，尤其是熟知现存的不平等现象而增强了政治意识。

就是在新近的150年前，通信手段仍处于工业化以前的状况，时间和距离均阻碍了广泛的民族意识和共同的政

治使命的传播。在这方面，甚至西欧还都处在与农业的亚洲相同的时代。在1840年，仅仅英国才拥有一个联结其大城市（但既不通向威尔士也不通向苏格兰）的铁路系统。在欧洲大陆本身，只有几个国家的首都（巴黎、布鲁塞尔、柏林、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才有延伸到今天视为郊区的短程铁路线。但是，变化来得很快。1850年，英国的铁路延伸到苏格兰，同时在欧洲大陆上也出现了联结巴黎、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柏林、华沙、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的铁路网。1880年，西欧已被直通圣彼得堡的像蜘蛛网般的铁路线所覆盖。于是，政治观点和国家的军队都可以迅速地传播和调动。

20世纪后期能与之媲美的是，过去20年里突然出现的全球电话通信网和全球性电视网的问世，以及采用革命性变化的传真手段。其结果是消除了视听通信方面的障碍。全世界拥有的无线电和电视机的数量飞速增长。1965年，英国广播公司估计全世界拥有便携式无线电约5.3亿台；而到1990年，它的数量已上升到21亿台。在同一时期，电视机的总数则从1.8亿台增加到10亿台以上。而更具有政治意义的情况是，在1965年上述数量的80%左右都在北美和欧洲，而到了1990年它们所占的比重已下降到只是这个多的总数的55%左右了。目前，思想观点可以一下子传遍全球，并家喻户晓和产生直接的影响。

由于作为群众激进主义必要的先决条件的识字继续不断地和加速地普及，这些思想观点的政治控制作用成倍地

增强。在20世纪的开头的几十年里，西欧和北美以外地区的识字率仍是比较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其他的研究报告表明，欧洲的南部和东部地区的识字率只占30%的幅度；埃及和印度的识字率不足10%，拉丁美洲的识字率占50%左右。到本世纪中期，欧洲东南部地区的识字率猛增至70%以上；埃及和印度的识字率翻了一番，拉美的识字率达到约70%。本世纪后半期识字的普及更为迅速，使人类的大部分人易于接触和接受政治宣传小册子的影响。

显而易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范围内帝国的分崩离析，但是，如果没有识字普及的政治上激动人心的影响作用，这种崩溃也可能不会来得这么快。由于能阅读书面材料，密谋的和后来是煽动性的反殖民主义政治行动就可能获得更多的支持。识字的普及，为宣扬和诱导觉醒群众政治激情而具有魅力的平民主义领导人的出现，提供了讲台。它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促成了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例如，在中国——在此之前那里的政治行动一直主要是学生示威——到1925年中国国民党已成功地召募到约60万名政治激进分子，而在1929年到1930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在5个省里拥有在它直接政治指导下的约3 000万人民。印度国大党以同样的方式鼓动了在此之前的政治上被动的群众。

全球性的识字普及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的加快同时发生。尽管发展中国家在1950年居住在城市中心的人数只占其人口的17%左右，但到了1990年城市人口翻了一番

达到占总人口的34%，而预测材料表明，到2025年这个数字将达到60%左右。因此，世界上大部分贫穷的人将集中到城市的贫民区，彻底脱离他们的传统的农村环境；他们都将识字，从而将很容易接受政治动员。

使这种压力加重的是，这类群众的数目还将是非常之多。所涉及的实际人数——鉴于第三世界大部分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高 —大得骇人。例如，1950年不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约为2. 85亿，而到1990年人口数字爆炸性地达到总数为13. 85亿。在今后不到20年内，即到了2010年，总数预期翻一番达到约27亿！（相比之下，世界发达地区的城市人口预计从1990年的8. 76亿至2010年只增长到约10亿。）

于是，一个以政治觉悟水平不断提高为特征的、拥挤而亲密的全球政治性社会正在出现，但是，它是在持续的和某些方面甚至在日益加大的社会经济差异的背景下出现的。因此，这些为数众多的新近在政治上被鼓动起来的群众，在政治观点和社会状况之间的微妙关系方面，自身正处于一个紧迫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在早期的农业社会中，家长制和世袭的统治以及传统共同界定了愚昧和消极的群众的生活，而大宗教所显示的真理则对每一个有思想的人有时会思索的最终问题，作出了答复。在日益扩大的城市一工业社会中，较多的识字的群众渴望着对他们的处境找出政治解释和作出政治矫正，从而引发出信仰上的激情和对现世乌托邦的寻觅探求。在新兴的后工业的电子通讯技

术的社会中，着重强调的是务实主义、信息、民主和哲学上的怀疑论，后者根据相对的社会福利在政治上习以为常，并在心理上对世界相对贫困地区漠不关心。

21 世纪前夕的危险，不仅是这几方面的政治觉醒的发展状况在全球范围内并存和相互冲突；而且更重要的是，富裕的基本上是西方民主国家以外的在政治上被激发起来的群众，主要处于政治觉醒的最初阶段。一般地说，这种最初阶段的特征是，在很大程度上根据种族排他性而狭义地界定的政治上的自我认同。因此，公众情绪仍然动辄通过容易接受善恶二元论口号——宗教的和政治的二元论——的原始观念来表达，同时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还往往倾向于采取逃避现实和自以为是的态度。对社会状况复杂性的认识与这种思想模式是不相容的，政治上寻求妥协的做法也与这种思想模式格格不入。老的列宁主义的口号：“不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就是反对我们的人”，在这里可以适当地重新界定其含意是，“不是我们的人就是反对我们的人”。

这种政治觉醒的原始的最初阶段的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解放中的整个第三世界里表现得非常明显。像苏加诺、恩克鲁玛、蒙博托或者甚至像毛泽东（尽管他有学说上的自负）这样的领导人，在一种对名人卑躬屈膝的崇拜的背景下（其庸俗和令人屈辱的程度不亚于对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迷信），都纷纷成了受个人情绪支配和大权在握的政治的化身。在他们的领导下，政治进程中贪污成风和充满着暴力，经济政策越来越变得缺少理性，同时，整

个政治气氛则被不宽容和信条的或种族的偏见所毒化。

然而，这种本能的排外情绪并不只是第三世界的现象。在发达世界里的经济上比较脆弱的阶级同样会有这种情绪。由于移民的压力造成大量东欧人和北非人涌进西欧竞相寻找工作，并且看来威胁到城市的较贫困的西欧人的既定生活方式，种族排外情绪传遍了法国、德国、比利时和其他富裕的和民主的西欧国家。1992年初，法国民族阵线在有关移民问题的一些民意测验中获得了多达38%的法国国民的支持。同样，德国光头党由于对外国人采取暴力行动也反映了“不是我们的人就是反对我们的人”这一哲理。

当代全球政治觉醒的一个突出方面是，这种觉醒是在一种基本上不承担任何较深刻承诺的哲学背景下形成的。除了原教旨主义政治倾向十分明显的伊斯兰世界外，在全球政治舞台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以竭力追求消费和强调个人自我满足为政治行动的首要目的的言论和价值观念。像全球电视展示的那样，先进的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在这方面特别具有决定的意义，它促使全世界范围里的人都热中于追求物质享受和及时满足道德上不受抑止的个人欲望。

在政治历史的初期阶段，群众政治觉醒的开头阶段总是最初受宗教后来受意识形态的很大影响。一方面，这给予政治上猛醒的人们以强有力的道德制约，以便确定是非曲直和界定非纯物质方面的重点次序。但是，在另一方面，

这些真正的（但也是简单化的）信仰者倾向于通过暴力的不宽容、迫害和甚至于种族灭绝来表达他们的急切的承诺。在这方面，宗教狂热的冷却和新近的意识形态乌托邦主义的失败都体现了一种成熟的过程，可能使全球政治觉醒的现象带有更加温和的色彩。

然而，与此同时，目前着力追求处于道德混乱中的物质享受目标会带来风险，即这种追求容易导致无理性的和逃避现实思想的新浪潮，而这股浪潮是由贫困与先进的西方国家的宽绰富裕的生活方式之间的——也是先进国家本国内部的——贫富悬殊所造成的。后者的世风日下意味着所给予贫困的和新近在政治上觉醒的全球群众的主要寓意是，刺激了他们在物质上攀比的欲望——然而，这种要求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即便有最合理的社会经济政策——对于世界上大部分贫困的人来说，也简直是难以实现的。因此，物质上攀比的寓意就会无意地点燃沮丧的但不是有组织的妒忌之火，而这种妒忌反过来很容易被蛊惑人心的极端分子所利用。

结果是出现了全球范围内的精神危机。持久的信仰原则被时髦的口号所取代，而无所不包的信条则让位给空洞的渴求。于是，随着共产主义的衰落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它的失败是不是等于民主以广泛的、系统的和普遍的方式取得了胜利？

的确，人们能有多大把握来肯定这些“适当的”教训，真正是从这个行将结束的世纪的政治经验中汲取的？新的

政治参与者是不是汲取了在极权主义和民主观念之间的整个世纪的冲突中基本上是欧美胜利者所汲取的相同的教训?这多半要靠非参与者是如何评估这场冲突的——但是，这也要看胜利者在多大程度上能成功地展示他们自己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的全球政治观点。

上述问题说明的关系重大之处是，极权主义挑战的失败，并不会带来在除旧更新地综合法国和美国革命过程中.，最充分表现的民主理想基础上的新的普遍的共识。相反，它可能产生起源于不同的文化和经济背景，并因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显得突出的新的和十分危险的观点上的对立。所有这一切加大了观点看法和志向抱负之间的差距。

第一章

微小信念的胜利

在思考未来时，人们将可能有争议的论点——即强制的乌托邦并非被另外某个宏伟一致的理想所击败——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那是恰当的。的确，强制的乌托邦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它本身的基本的错误观点。那些被迫置身其中和那些害怕它扩大的人，都共同有着某种基本的但主要是初步的人的本能，这些本能与强制性乌托邦的乌托邦假设及其超凡的狂妄是格格不入的。

如前所述，共产党的乌托邦比之于纳粹在思想上体现了更为巨大的挑战。尽管二者都产生了同样的政治后果，但纳粹的乌托邦是建立在非理性、激情和种族仇恨的基础之上的。它的“雅里安”种的号召力本来就有极大的自我局限性。它的成功不得不依靠军事力量——因此，在战争中失败就自动地意味着这种现象本身的终结。

共产党的号召力则是更为复杂和更能吸引人。它主要是继承了在法国（政治）革命和工业（经济）革命双重影响下

焕发的 19 世纪初叶乌托邦思想的智慧遗产。它向那些被工业化初期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颠沛流离和贫富不均吓怕了的人伸出援助之手。它使以前在 16 世纪的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书中认为私有财产和货币的中心作用是与公正和社会福利水火不容的),表达得淋漓尽致的旧基督教反对私有财产的偏见,死灰复燃。

共产主义终于失败了，因为它实际上没有在物质方面实现，而它的政治实践则损害了——其实是败坏了——它在道德上的主张。它无法提出一种切实可行的社会经济的替代办法，来取代自由市场制度，因为后者与此同时已针对和适应某些社会主义关切的问题作为它本身的社会政策(如果不是经济政策的话)。事实上，作为一个实际问题，资本主义击败共产主义可以说靠的是，前者在物质水准上比后者略胜一筹从而否定了后者在道德上的唯我独尊。这就驳斥了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最高阶段的大言不惭的断言。

共产主义——孕育于道德上的肆无忌惮——由于否认持久的精神上的价值观念和把道德准则降为政治手段，而使其本身的成功完全取决于物质上的作为。它之所以无法实现是因为它对人的创造力的本性，特别是人的本性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它无法驾驭人的潜能，因为它摧垮了人的精神。创造力和获取财富之间的休戚与共的关系完全被曲解了。它切断了创造力和自我利益之间密切结合的渠道。对私有财产的压制使经济不振和最终的制度上的运作不灵。

此外，以苏联的名义所建立的极权主义制度不仅扼杀

了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不能汲取后工业社会对分散的大众传播、自由沟通信息的自发性的相互作用和决策的多中心诸方面固有的需求。与此同时，对人生精神领域的侵犯使人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到该制度的物质发展方面——而这恰恰是该制度运作弱点之所在。于是，开初把一些人吸引到共产主义方面来的道德上的热情最终消失了，而且没有得到任何补偿性的物质上的满足。

因此，共产主义的教条式的自以为是把理想主义变为野蛮的残酷无情的行为和司空见惯的伪善。它把它宣称的理性推到了无理性的教条式的程度，甚至在大量的相反的证据面前还声称乌托邦确已实现。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扭曲了的理想主义和以理性作伪装的教条主义——促成了具有破坏性的逃避现实。无力应付现代技术时代现实的后果是，最终敲响了共产主义的历史性丧钟。

就这样，在法国革命的四大要素——理性、理想主义、民族主义和现世主义——中，纳粹采纳了民族主义和现世主义，并加以篡改和最终扭曲成极端民族主义，而共产主义——看来除民族主义外都囊括无遗——实际上成了大约200年前所焕发的进步思想的对立面。它未能创造"新人"和塑造新人的社会福利的乌托邦。相反，它在一场失败的社会福利的实验中囚禁了"旧人"。

因此，20世纪的超凡神话在号召方面是气势磅礴的，但在实践中却是软弱无力的。相比之下，人的持久的本能，对某种精神上自我表达的渴望，基本的实实在在的日常生

活和信息革命的实际需要，所有这些凑在一起就促成了那些被迫置身于乌托邦的人要另作抉择的内在觉悟。诚然，这种觉悟甚至会对极权主义制度以外的实际生活状况产生高度理想化的认识。

最终，实际上对破坏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生命力至关重要的，正是这些日积月累的和往往是细小的日常生活里的挫折。例如，经常接触到的是蛮横的政府工作人员，没完没了地排长队买劣质而又稀少的消费品，官方口号和官方伪善面目之间的越来越令人气恼的自相矛盾，在官僚化等级制统治整个社会中所固有的对人的任意屈辱和非人待遇，以及平民百姓连最基本用品（比如手纸）都有令人啼笑皆非的短缺和极权主义领导人的极少掩饰的大模大样的生活气派之间的强烈对比，所有这些都逐步使信念、屈从、冷漠和恐惧转变成否定、反感和动荡不安的激进主义。

同样地，（哎呀！）也可以推论：如果强制的乌托邦能够满足人类的最起码的物质要求，那几乎肯定它会存在更长时间，可能到下个世纪的中后期。人的本性就是那样，在极权主义政权统治下的很多人甘心在默默地屈从中生活。诚然，这个制度的失误和毛病可能会继续引起人们的反对——由英勇的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持不同政见者领导——但是，这种反抗即便有日益增长的道德上不满情绪的背景，也不大可能推翻强制的极权主义的机器，如果后者因取得相对的物质上的成功而得到加强的话。尽管听起来有点尖刻，小巴林顿·穆尔于198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中的论

点可能是正确的：

> 一般说来，人们并不因他们自己的原因或出于对政治理想的承诺而要民主。对于积极寻求民主——从平民百姓当家作主的严格意义上讲——的大部分人来说，他们要民主是把它作为增加他们在政治统治中的份量和削弱那些实际统治者的权力的一种手段。自从在古代雅典出现民主以来，民主从来就是穷人和多数人反对极少数人和富人的武器。民主的开明因素是——在它存在的地方——企图为反专横的行动获得保护，这些行动由穷人和多数人或起主要作用的几个人发动的。（着重号是原有的）

因此，损坏、削弱以至最终使共产主义丧失其活力的原因，并不是民主的某种宏伟的和完整的理想，而是被压抑的宗教的强烈愿望，人的基本的自由本能，某些自由主义的观点，以及在很多日常的和实际交往中，接触到的是既不讲理又不顾简单常识的官方的现实状况诸因素合在一起，年久日深地逐步落到这种境遇：促使既作为一种制度，又作为一种学说的共产主义，发生突如其来的和令人惊异的和平方式的向心聚爆。

所以，共产主义的失败在局部意义——而且是非常之局部的意义——上说，是民主观念、自由市场制度、宗教

和民族主义的胜利。每一个因素都有其作用——的确起重要的作用——但是，其中任何一个单独的因素都起不了决定性的、统一的和动员群众的作用，而是本能的反应、共同的但在私下交谈的知心话、融为自我意识的宗教感情、被冒犯的民族情绪诸因素合在一起，对强制的乌托邦一股脑地加以摒斥。

上述论断并不是贬低某些个人的英雄角色，也不是否认其他的和更加雄心勃勃的宗教或政治哲学的历史性作用。两者对变革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论那是瓦文萨和哈韦尔，还是天主教教会，或民主的概念。上述论断也不是忽略美国在慑止苏联军事扩张和提高人权水准方面所起的重大的——的确特别重要的——作用。但是，一旦共产主义的扩张被遏制住，基本的斗争是在日常生活方面展开的，共产主义与某些基本人权的本能的个人觉醒，并与要求过"正常的"、较不强制的和物质上较为满足的生活的普通欲望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大。而到头来即便最糟的意识形态和最糟的技术沆瀣一气，肆虐一时——20世纪极权主义的公式——也无法战胜这些尚未具体化的但却是强有力的个人信念。

然而，在现阶段应当引以为戒的是：缺少一体化的组织，微小的信念很容易变成个人的猥琐贪鄙。因为个人的民主本能与民主的政治文化并不是一回事。它也可能成为喜欢争吵的政治的出发点。对压制特别是对小官僚主义的本能的道德上的摈斥，并不等于采纳以互让妥协作为基本

的政治原则，也不等于接受复杂的宪法安排，特别是尊重主权国家的司法制度。时至今日，不幸的是，人们极少认识到——并重视——在大多数前共产主义国家里民主进程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特别是在前苏联境内实际上则根本从未存在过这种情形。

关于自由市场也有类似的情况。就个人方面来说，厌弃中央集权制主要反映出对带来贫穷的过分官僚化的制度的失望和不满。共产主义的社会福利，诸如廉价的住房或其他的社会性补助都不是稀奇的事了，因为它们在艰难困苦的现实生活中已经黯然失色。但是，这并不能说，在前共产党国家（尽管它们口头上采用自由市场的言辞）里的公众参与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文化。"市场"一词〔和人们在前苏联经常不断地听到"rynok"（俄文"市场"）的用语〕的号召力并不能替代自身采取企业家的行为，和理解了银行制度的金融复杂性，以及认识到个人主动性和个人贪欲之间的极其微妙的差别。

在这方面，人们还可进一步谈到宗教。无信仰自由引起了广泛的愤慨。但是，个人的愤慨与社会认为宗教是决定个人行为的具有约束力的道德规范制度，两者不能等量齐观。任何一个前共产主义国家将会变成可能称之为真正的宗教社会，那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在那些教会曾起过重大的作用来动员对共产党压迫的有效反抗的前共产主义国家里，一旦从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既定宗教的吸引力随即大大地下降。在有些地方，过去是自由思想的庇护所的教会似

乎也力图掌握侵犯良知和表达自由的权力。

因此，共产主义的强制性乌托邦的失败乃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喜的是促成它被否定和失败的激情中所固有的承诺。如果这种承诺精神得以充分发扬，那就可能为全球范围内综合地实现具有约 200 年前在美国和法国那股巨大吸引力所迸发出来的民主观念铺平道路。但是，在前共产党国家里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观点尚不成熟，特别是在诸如宗教、民族主义和现世唯物主义的可能相互矛盾的情绪之间无法协同一致，那就会出现一种情况：曾经如此有效地反对过共产主义超凡神话的微小的个人信念，可能首先蜕化为不现实地追求唯物质的个人满足，然后转化——由于彻底受挫和愤怒——为新的仇恨的信条。

第一章

丰饶中的纵欲无度

现在，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先进的西方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挑战的消失是怎样作出反应的。多元化和自由市场社会的价值观念，能不能在物质上的自我追求的个人欲望和需要对人灌输这些价值观念的超凡内容使之觉悟，这两者之间作出有力的均衡？对于这个难题，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切·米沃什[①]陈述很清楚，他在1991年中期这样写道：

> 我总以为，马克思主义是欧洲大陆上人类的宗教想象力严重丧失的后果。陀思妥也夫斯基是了解这一点的。他在《群魔》作品中以预言的简洁笔法刻划了一

① Czeslaw Milosz（1911～　），波兰诗人、作家。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出身于立陶宛。1934年大学毕业。二战期间从事抵抗运动。战后任波兰驻美、法的文化参赞。1951年旅居巴黎，后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波兰文学。著有《三个冬天》、《生路》等诗集和长篇作品《权利的攫取》《伊斯塞谷》等。　译注

群革命者在没有上帝的世界的所作所为，企图给历史以意义。在该意义上说，极权主义运动是具有打上负号的形而上学背景的，因此，它可以算作“欧洲虚无主义”的表现。我认为，宗教想象力的丧失乃是20世纪思想的内核，而我们时代之所以有其大灾变的特点，原因就在于此。但是，极权主义运动的烟消云散决不是说在这方面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西方国家里的那部分享有繁荣和丰衣足食的人都深信：宗教上井然有序的宇宙概念在科学和技术的冲击下也正在消失；如果人们，特别是年轻的后代人还有对信仰的强烈需要，那是一种未必会转向基督教的没有归宿的寻寻觅觅中的信仰。看到这一点也就足以说明上述论点了。

切·米沃什的警世之言说明了历史性的危险：强制性乌托邦的超凡神话名声扫地之后，追求在丰饶中的纵欲无度的精神空虚可能随之而来。“丰饶”(cornucopia)这个词起源于哺育宙斯神的神话的山羊角。它具有神奇的能力使它的物主想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丰盛的东西。因此，“丰饶中的纵欲无度”可以用来指一个什么事情都允许发生，什么东西都可以拥有的社会。

在先进的、富裕的和政治上民主的社会里，物质享受上的纵欲无度越来越主宰和界定着个人生存的内容和目标，对这个问题表示认真的和正当的关注是不无道理的。“丰饶中的纵欲无度”的概念基本上指的是，一个道德准则的中心

地位日益下降而相应地追求物欲上自我满足之风益趋炽烈的社会。与强制的乌托邦不同，丰饶中的纵欲无度并不设想对被解救者创设一种永恒的社会天堂的境界，而是在个人和集体的享乐主义成为行事的主要动机的背景下，主要着重于立即满足个人的私欲。界定个人行为的道德准则的下降和对物质商品的强调，两者相互结合就产生了行为方面的自由放纵和动机方面的物质贪婪。"贪婪就是好"——80年代后期美国雅皮士的口号——对于丰饶中的纵欲无度来说是恰如其份的座右铭。

丰饶中的纵欲无度本身所固有的腐败不仅是现有物质丰富的后果。在那些为数越来越多的(通过电视或居住邻近)得知世上有丰富的物质而个人深感无权享有的人们看来，腐败还可能是缺少或得不到物质丰富的结果。西方的经济困难以及失业者和长期遭到排斥者(如美国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的黑人)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些为强烈地要求享有丰饶的果实和普遍地反对对任何——甚至是暴力手段的——"迅速致富"计划作道德制约，创造了条件。

今天先进的西方是共产主义失败之后的和第三世界贫困群众的全社会梦寐以求的楷模。诚然，西方的哲学和文化内容是变动不定的，因此，把它认为是丰饶中的纵欲无度，可能是过于苛刻严厉的判断。可以提出很多例外的情况。我们容后再更具体地讨论美国社会的状况，特别是因为它影响到美国发挥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全球作用的能力。现在，可以这么说，如果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和西方的占优势

的哲学观点实际上确实反映了物质丰富之称号当之无愧的价值观念，或反映了得不到丰富物质的情感而产生的价值观念，那么，对所谓的西方文明的长期的生命力，和特别是对它向乌托邦后时期的政治上觉醒的世界提供有意义的启示的能力，表示关切，那是合情合理的。

按最初的含义，乌托邦——托马斯·莫尔的想象之岛——乃是反映了据说是人性固有的善良和利他主义的、生活在一种政治和社会臻于完美的境界中的人的自愿组合。完美之岛的观念意味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生存状况，不受人的整个生活环境的不纯之物的污染。现代极权主义者在两个重要方面扭曲了这个观念：乌托邦可强迫建立，和强制性乌托邦可成为全球剧变的核心因素。

丰饶中的纵欲无度几乎与此截然相反。设想中的社会能够近乎神奇地满足个人的渴望，那无需强制。它可以放任无度——的确，它必然会是放任无度的——因为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可以满足一切要求，而且是在高度个人化的基础上满足一切要求。既然可以满足所有的欲望，因此，所有一切的欲望也就都是同样地好的。由此可见，没有必要实施强制，也没有必要进行自我克制。但是，一个以自我满足为行事准则的社会也会成为一个不再有任何道德判断标准的社会。人人都认为有权得到他所要的东西，不论他应不应得到。这样一来，道德判断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了。因为没有必要来区分什么是“正确”和什么是“错误”。相反，出于维持社会秩序的实用主义的原因，要在什么是“合法”和什么是“非

法”之间作出明显的区别。因此，法律程序，特别是法院制度替代了道德和作为该道德的主要制定者的教会。成为对个人行事的内在指导的宗教就这样被法律制度取代了，而后者所界定的是不许可的而不是违反道德的外在限度。

人们可以将以上的称之为“程序性道德”，它以指导行为和社会相互影响的外在规则为依据。它与内在化的、个人的和要区别“正确”与“错误”的道德有着根本的不同。此外，程序性道德——如果它能独自存在的话——总会创造一种条件使众多的人情不自禁地要实际试一试所允许的限度有多大——“以便设法做错了事而不受罚”——因为没有任何绝对的内在道德制约在起作用。程序性制约制度和随后遵照该制度的行为都基本上成了判断怎么是有效或无效的问题了。当代美国的某些趋势看来是朝着该方向走的。一些引人注目的有关华尔街金融丑闻，或出现有组织的贩毒吸毒的亚文化，或广泛的街头罪行的报道充分地说明了这一倾向的社会后果。自我约束让位给暴力，而自我控制则被腐败所取代。

在理想的环境下，在尊重法律的民主国家里，程序性道德和内在道德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之间微妙的均衡将取决于社会认可司法程序至高无上，并取决于国家承认致力于加强内在个人道德的社会制度值得保存。在过去，后者的角色基本上是由有组织的宗教充当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政治和经济凑在一起就创造了一种文化，损害了保持一个留给宗教界的重要社会领域。越来越自由放纵的文化利用

政教分离的原则，把宗教的因素挤了出去，但没有任何现世的“断然措施”替代它，因此，使内在的道德规范形成真空。

这种道德真空状态界定了精神空虚概念的基本含义——一种看来越来越扩散到所谓西方文明的大部分领域的空虚之感。主张“上帝已死”的最伟大的胜利，不是在政治上宣传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者统治的国家里取得的，而是发生在文化上薰陶道德淡漠的西方自由民主社会，这是令人震惊的反常现象。在后者，实际情况是宗教已不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但是，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官方宣传的无神论战胜了宗教，而是因为除了满足眼前的和物质的生活欲望外，对一切都漠然置之的文化的腐蚀性后果。

这里还有其他两个事关重大的问题：自由的定义和幸福生活的定义。前者与公民身份的含义有关，后者则涉及人的本质。在一个文化上强调最大限度地获得个人满足和最小限度地实施道德制约的社会里，公民自由常常被提高到一种可以自我确认的绝对的程度。换言之，公民自由是与公民责任的观念分开了。从传统上讲，自从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以来，自由的概念是在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内界定的，即在一种社会政治背景下对个人权利下定义，它也包含着对该背景应负的某些责任。然而，要自愿承担这些责任，就需要出于真诚的动机。有这种动机则需要具备甘心自愿服务、牺牲和进行自我约束的内在精神。爱国的公民应具有的品行乃是民主社会中对公民自由下定义的框架。

今天，这一定义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自由越来越被

界定为集权利和应享有权利之大成，以及准许任何形式的自我表述和满足。对社会作出自愿承担的或社会期望的服务的思想已经不吃香了。因此，实际上，个人自由成了毫无约束，只有在法律上界定为威胁到某个其他人的实际的或物质的安全的情况时除外。

对自由逐步重新下的定义，一方面背离了负有责任的公民自由的观念，另一方面则采纳了放荡不羁的个人自由的观念，既促成大众媒介不断传播的趋势，并得到这种趋势的加强。总的来看，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价值观念一再表明，它完全有理由可被称之为道德败坏和文化堕落。在这方面，电视尤其是罪魁祸首。今天，对于世界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来说，电视是接触社会和接受教育的最重要的工具。在这方面，它正迅速地替代历来由家庭、教会和学校所起的作用。

电视使年轻的观众对外部世界投以最初的一瞥。它最初界定了——而且靠图音并茂的影响——引人入胜地界定了幸福生活的含义。它确定了所认为的成就、克尽职守、趣味高尚和行为正当的标准。它激发了人们的欲望，界定了人们的抱负和期望，并划清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行为之间的界线。随着全世界的观众越来越多地盯着电视机的屏幕，不论是在强迫的宗教的正统观念的时代，甚至在极权主义灌输教育的最高潮，都无法与电视对观众所施加的文化和哲学上的影响相提并论。

令人吃惊的事实是，根据尼尔森传播媒介业机构的数

据资料；一个美国主妇每周花 28 小时又 13 分钟——即大约占她醒着时间的 1/4 —— 观看电视；美国青少年每周则花约 20 小时看电视。更令人吃惊的是，教育试验处所累积的资料数据表明，每天看 5 小时或 5 小时以上电视——即每周超过 35 小时！——的 13 岁儿童占全美国 13 岁儿童总数的 20%以上，在其他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占其同龄儿童总数的 10%以上。即便是较低的百分数也突出了电视对认识和价值观念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

至于美国和西欧电视的内容，评说众多。不是所有的内容都不合宜，有的内容偶尔甚至还是好的。但是，格雷欣法则[①]不仅要适用于优质和劣质货币，而且还适用于一味依赖广告和对观众的吸引力的节目安排。可悲的事实是，推销淫秽文化的电视制作商实际上对那些不这么干的电视制作者占有竞争优势。结果是西方的电视逐步地越来越成为感官的、性的和轰动性的。即便查看一下一天内的占日间节目主要地位的"情景喜剧"的内容，和夜间娱乐节目的主要内容，且不说广告本身了，也就可以看出西方电视以咄咄逼人之势传播着上述声色之娱。

此外，在一定程度上也不难从电视节目中推断出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它们显然颂扬自我满足；视强暴和野蛮行为为正常现象；通过实例及对同龄人激起仿效的压力（向美

---

① Gresham's Law 指创建伦敦皇家证券交易所(1568 年)的英国金融家格雷欣(1519? ～1579)提出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因为在金属货币流通中，实际价值较高的良币必被实际价值较低的劣币排挤掉。——译注

国青少年和儿童播放的阴茎套广告，渲染了他们是“性主动”的潜在的顾客——显而易见的负面推论是，不这么干的人是“性冷淡”）鼓励性乱行为；以及迎合最低级的尽人皆知的本能。结果是对社会行为失去了控制。

这一指责特别适用于美国电视和美国电影业的拥有广大观众的全球出口产品。“达拉斯”公司和“王朝”公司的产品已在 100 多个国家里放映，而它们所展示的美国价值观念的形象不大可能在加强美国的全球声望。相反，尽管被歪曲的美国财富的画面会引起人们的妒忌，但这类美国的形象所显示的极端庸俗和精神空虚，却加强了人们对以为美国还会向当代世界提供更深刻启示的怀疑。近年来，美国电影也已经被野蛮的暴行以及肉体的和性粗野行为占据了主要情节，而每一部越是充斥着令人厌恶的内容的影片其票房价值的收入越是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好莱坞影片和电视制作厂家已成了文化的颠覆者，正是它们——毫无顾忌地利用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所提供的保护——一直不断地传播自我毁灭的社会伦理。

以上所说与幸福生活的本质的定义是直接有关的。电视——大众文化的主要提供者——越来越把幸福生活的定义说成是更普遍地获得商品和立即得到自我满足。乌托邦的狂热就这样被欲壑难填的消费挥霍所取代。在大规模的人间不平等和贫困所促成的觉醒时代，计算一下西方的消费有多大是不必要的，那是一个在政治上和道德上令人困恼的问题。西方不必要的消费是指出于人为刺激的欲望购

买最新的时髦货、时装、小玩意儿和玩具等。此外，出于人为诱发的欲望而不是出于需要的消费越来越成为中产阶级的现象，这种消费已不只限于很富的人家了。但是，很富有者——通常是暴发户——首开风气，他们的庸俗和显眼的消费造成了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下，物质消费——不是出于需要，而是出于自我满足——的高水平就确定无疑地等于幸福生活。

道德上败坏的幸福生活的定义不仅得到电视的传播。这一定义标准的确定，也是因为公众总是把富裕的公司经理、投资经纪人、房地产投机商和大众媒介巨头占主体的纽约市和洛杉矶的光彩夺目的特殊社会阶层当作“高等社会”。他们的奢侈生活尽管遭到某些社会批评家（例如，汤姆·沃尔夫）的讥讽，在杂志和报纸的社会版上还是作为令人向往之事大加宣传，而他们的贪婪成性则往往被吹捧为是他们的一种职业才干。那种在已故罗伯特·马克斯韦尔[1]莅临纽约市社交场合时所给予的盛大欢迎和赞美之辞，只不过是这种价值观念在滥用财富方面的充分反映罢了。

确实，西方的消费型式确认了19世纪的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塞所提出的经济法则，即供给创造了对它的需求。而需求可能失控，特别在受到文化背景的连续不断的和故意的刺激下，情况更是如此。诚然，需求也刺激

[1] Robert Maxwell，英国出版业大王，因巨额亏空，于1991年11月15日在西班牙大加那利岛附近落水身亡，时年68岁。——译注

经济增长，而富足生活的普及——不仅在西方范围内，而且最终还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则取决于经济生产率持续的提高。因此，问题并不在于需求本身，甚至也不在于这种需求是否值得——指需求的内容和方向。如何抉择——及有关的难题——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有关社会问题的《纪念新通谕百周年》[①]（《教皇百年圣谕》，1991 年）中讲得干脆利落，他说："生活要过得好些并没有错；错的是有一种生活样式，它设想过得好就要想方设法'占有'而不是改善'生存'；它要更多地占有，不是为了更富足，而是为了以享受为目的在享受中消磨生命。"（着重号是我加的）。

如果没有来源于自我意识准则的某些判断标准，出现的政治危险是，正当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仍为生存的需要苦苦挣扎时，西方却过着以追求自我满足为目的的生活。同时，当这两个世界不再被时间和距离隔开之际，指出有多少的西方消费品实际上是人类的较贫困的大多数人所得不到的，那是件令人困惑的事。假如出现某些奇迹使这批大多数的人能拥有汽车、冰箱、空调、微波炉和标志着富有国家人民的福利的大量其他的小玩意儿，那么，全世界的经济及其生态环境都无法承受。很可能的前景是引起人们更强烈的妒忌，而不是促使人们进行成功的模仿。

---

① 1891 年，天主教教皇利奥十三世颁发《通谕》，就社会公义问题特别是工业革命所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阐明天主教会的立场，强调教会有权对有关道德原则的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该《通谕》称之为《新通谕》（Rerum Novarum）。——译注

从西方对新近解放的共产主义受害国家所提的经济建议中，还带来一个有关的危险。随着共产党的乌托邦主义信誉扫地，西方的某些人一直在主张采用他们自己的新乌托邦主义，即支持采取一种完全不顾道德后果的特殊经济方法的程序性的乌托邦主义。它以其极端的方式通过无条件地主张自由市场机制而表露无遗；它认为这种机制几乎是从共产主义留下的破烂摊子中拯救人们的自动的力量之源。这种主张不顾一些前共产党国家里没有任何社会安全网的事实，因此就带有适者生存的达尔文思想的意味。结果是在某些地方要建立自由市场的企图，正采取种种与社会公正针锋相对的、令人想起 19 世纪所用的方式。要证明共产主义后国家——鉴于它们的可怕的经济处境——能作出自由市场制度在西方已成功地推行的那种社会福利调整，那可能是困难的事。这一点正在日益削弱西方式民主本身的吸引力。

综上所述，强制的乌托邦是一种进行全面控制的企图。它所依据的错误观点认为，政治制度能界定全部生活，完全限制个人和由那些——通过他们的信条——对生活的意义具有神秘的洞察力的人进行永久统治的制度合法化。丰饶中的纵欲无度则通过自欺欺人地认为自我满足就是进行控制的假设，虚构了个人的生命置于控制之下的幻想。实际上，它创造了一种条件，使追求声色物欲不断升级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现实。带有道德涵义的选择已无足轻重。在全世界政治觉醒和与此同时并存的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差别

的现实面前，根据以上所述，很难预期会出现一个全球共有和统一的政治伦理。

第三章

哲学上的两极分化

行将成为西方文化主流的这种追求物质享受的趋势带来了一个在政治上要认真考虑的问题：西方还有没有一个理想、一套价值观念和一种生活方式可以对政治上觉醒的人类的未来作出重要的指导？

民主可能是西方的重大贡献，但是，民主是一个需要注入内容的容器。民主的政治程序、宪法制度、法律的至高无上都是维护和加强个人权利和人的个性的无与伦比的保证。但是，民主本身并没有为解决社会生存的难题，特别是对幸福生活的定义提供答案。这方面的任务要由文化和哲学来承担——它们合在一起产生激起和构成社会行为的价值观念。

前文已经表述的担心——即，从物质上的纵欲无度中产生不了对政治上觉醒的世界具有意义的社会模式——由于现代科学对全世界的人的情况产生形形色色的影响，而令人更加忧心忡忡了。在世界上技术和经济先进的地区内，

科学和技术上戏剧性地提高人的不仅在自我满足方面，而且在自我变革方面的能力。在世界的较贫穷的地区里，现代通信工具使他们对广大群众为生存而疲于奔命的全球不公正情况了解得更加清楚。在全球性相互熟悉的背景下，生存攸关方面的危险性差距正在扩大。

发展中的或较贫困的世界主要集中在南半球，并包括居住在中国、南亚、非洲和拉美地区的数目庞大的人类的大部分人。它面临着持续性的人口爆炸，迅速而混乱的城市化，婴儿的高死亡率和较短的寿命，更不用说周期性的传染病、饥荒和普遍的贫困。现代科学被用来解决其中的一些困难，并于本世纪里在对付传染病和提高农业产量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目前还形成了一种国际机制并具备了技术能力，可以由各种救济机构对最悲惨的危机地区作出迅速援助和采取全力以赴的对策。

技术革新的最重要的政治影响是，在全球范围内促使人们相互间的了解——克服了时间和距离的阻隔。但是，这种新的相互熟悉既能促进联合，也会造成对立。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里，赤贫的群众目前正为生存活命而日夜奔波，在这种情况发生的同时，他们深深地了解到，不仅追求物质享受的西方人（穷国的上层分子自认为与他们一样，并竭力模仿他们）而且本国的上层分子正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样式。因此，对于人类来说，提高了的期望值和实际能力之间的差距再没有像目前这么大了。

此外，在世界的先进地区里，科学越来越有力地创造了

进行人的自我工程的动力，其势之猛不久会像自我满足的动力那样达到无法控制的程度。实际上，自我变革是自我满足的一部分。在缺少任何慎重界定的选择标准的情况下，自我变革的危害之大可能不亚于已发生的技术和科学对自然环境袭击的规模。为了对付这种袭击，维护生态的运动一直在设法界定某些自我制约的标准，以便保持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有机平衡。它这样做是企图控制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该过程中，人对自然的支配带来了前者控制后者的幻想，而在现实中却恣意地破坏了两者之间的有机联系。维护生态的运动就其根本的含意来说，更多的是哲学而不是政治的成分，道理就在于此。

目前，在有关人的自我变革方面，正出现一个类似的难题。依靠科学提高人的自我控制能力的幻想必然导致紧迫地提出具有最终重大意义的问题：人究竟是什么？人的真正的不可削弱和必不可缺的品质是什么？

在今后的几十年里，这些问题可能成为先进国家内的主要问题。工业革命曾在本世纪里引导人们接受诱惑和抱有幻想，以为根据教条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工程可以在傲慢的强制性乌托邦内产生集体福利。新近的科学革命使人类具备了毁灭整个社会的能力。目前，科学方面的一场革命将创造出这样的前景：人类通过生物技术和遗传工程将能改变自己的品种。这将在伦理上和哲学上对全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

例如，人的器官移植手术病例不断增多。今天，外科医

生已经能够用人造品替代四肢、耳朵、关节，甚至心脏，再过10年将能用人工肾脏和胰腺进行同样的替换。有些人猜测，甚至可能把一个人的脑子移植到另一个人身上，这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已。这类做法将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问题：一个人的本体究竟在哪里？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罗伯特·诺齐克在他所著的《哲学解释》一书中，在着重研究把记忆和性格从一个人身上移到另一个人身上的影响之后，对个人的本体的含义长时间困惑不解。实际上，以前归哲学的学术部门研究的问题可能不久将交给整个社会讨论。

与此同时，科学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正取得长足进展。今天的计算机基本上限于作困难和复杂的计算运作，但明天的计算机就可能具有堪与人脑媲美的能力。从事开发人工智能的科学工作者基本上用机器总结概括了几千年来创造人类智慧的进化过程。在未来，计算机不单是完成任务，还将要思考各种问题；不单是分析数据，还将要进行推理提出答案；不单是处理，还将是创造。科学工作者还正着手研制不断吸取经验的机器人。在不远的将来，可以说，计算机实际上可能具有意识性——即认知目标和周围世界以及它们在其中所处的位置。

所有这一切必然把追求物质享受的文化所不屑一顾的关键问题推向引人注目的地位：人的真正的独特性的领域是什么？精神和物质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怎么样在一个人身上达成和统一这两者的相互关系？界定一个好社会，可能起先是国家范围的而最终是全球范围的好社会的标准

是什么？

以上既是哲学的同时又是政治的问题。在最先进的西方社会里已经出现的日益引起最大激情的问题是，19世纪的系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成份越来越少，而哲学—科学的本质越来越多。生命起始于何时？如何对“生命”下定义？谁有权利和“知识”能在这些方面作出决定——神职人员、哲学家还是科学家？谁又有权利来决定是否要中止这样的“生命”？是母亲？医生？国家？还是教会？于是，有关在政治上有分歧意见的堕胎之类的问题把宗教、哲学、科学和政治都搅在一起了。所有这些方面也都适用于安乐死，这个问题大概会成为下一个重大的社会难题。

特别是遗传工程已开始使人们步入窘境，这种窘境不久将使20世纪的意识形态之争显得在智慧上是原始的，并可能分裂人类，其矛盾的尖锐程度甚至超过以前将人分为特权者和贫困者。科学工作者对包含从胎儿到人死期间人的有机生存蓝图的十万个基因的解密工作，已取得进展。有的人预测，在今后大约15年内，名为“人的基因组计划”的全球性工作将会取得成功。因此，遗传预测成为可能，而且遗传 工程已经展开。在畜牧业方面已经作出了重要的开端，做到了提高瘦肉质量和保护出生的牲畜免患癌症之类的疾病。防止疾病的工作还必然要用到人类本身，其方法是先做基因甄别，然后扩大到采用遗传工程。结果对人的生命来说可能是具有革命性的。其影响程度之大在人类史上将是空前的。

在没有任何道德制约准则的情况下，就有听任遗传工程之动力自行形成势头的危险。于是，外在的自我满足就可得到自我工程的配合。在一个基本上不受道德和哲学准则指导的社会里，这种过程可能会被私欲所左右和被那些有办法利用它的人所利用。尽管科学界的有些人致力于确定自我控制标准，但日益提高的重新塑造人的生命的能力，可能会在没有任何明确的指导方针下加以发挥。

从遗传上改进智能和体能属性将主要用于——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世界上的有特权的人，那是大有可能的。实际上，在人的状况方面将出现新的和戏剧性的差距。的确，人们可以合理地猜测，能提高人的智能和体质的遗传工程到一定阶段，完全可能首先只由最先进国家的最强有力和富裕的上层人士所采用（贫穷国家里的少数的类似的上层分子也可能采用）。从而在遗传上改进的人和其他人之间就可能出现新的和真正造成不和的分裂（在某些方面会令人心有余悸地想起希特勒的种族纯化的冥想）。

上述情况的内在的可能性是，不仅在全球性社会关心和能力方面，而且还在基本的政治概念方面戏剧性地一分为二。它们预示着这样的危险——特别对世界上新近在政治上觉醒的人来说，甚至对富裕社会来说——那就是，自由民主的政治哲学可能不再是对付最引人注目的人的问题的重要而具有指导意义的框架了。这可能导致哲学混乱和政治冲突的加剧，使人类的文化状态形成两极分化。以贫困与满足的对立为轴心。在历史的领域里，乌托邦狂热的挑战就

让位给欲壑难填的消费者和饥肠辘辘的旁观者之间的冲突。

无论如何,在先进的世界里,科学的疆界大概会被推向极端,从而对于某些人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生命的外部和内部的范畴,几乎等于人的生存性质的根本转变。人们势必希望,在较遥远的未来,为解决现代的物质极度丰富带来的精神空虚和科学的新挑战,现代社会可能开始重新重视生活的哲学的和甚至精神方面的意义。出于这种担心,最终可能花较大精力来界定具有社会约束力的道德准则,以便控制人类日益掌握的和误以为能左右一切的令人生畏的力量。尽管回到制度化的和正式的宗教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占的传统的中心地位,几乎已不可能。但是,重新尊重人们精神安康则可能成为对历史变革采取以道德为主的控制的主张,提供了出发点。

这将与哈韦尔有力的对现代性——即法国革命起始的推崇"理性"的时代——在哲学上重新下定义的呼吁完全一致。他在 1992 年初这样说:

> 人类对世界的态度必须彻底改变。我们必须摈弃这类狂妄自大的信念,以为:世界只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谜;一台带有等待发现使用指南的机器;一批馈进计算机并希望不久就能从中输出普遍适用的答案的信息。
>
> 我深信,我们必须从个人随心所欲的天地里释放出各种有影响的精神因素,诸如自然的、独特的和不可

重复的处世阅历，基本的正义感，像别人一样地看待事物的能力，超凡的责任感，典范的智慧，良好的趣味，勇气，同情心和相信那些并不诩为拯救人类的万能钥匙的具体措施有着重大意义。这些精神因素都必须使之重新发挥作用。

或许这种后现代的新定义终将实现，尽管任何重新下定义所将带来的实际的政治后果尚难预测。但是，在哲学界和科学界的讨论中，已感觉到人们正开始进行重新思考。一些研究学术的思想家倾向于否定在现代时期突出科学的确定性和一致性，而强调偶然性和多样性。例如，让—弗朗索瓦·卢瓦塔德在他所著《后现代状况——有关知识的报告》一书中，强调在科学探索中具有灾难性和反常性的重大作用，对认为知识趋于确定性和一致性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与此同时，在显露出来的政治态度方面，全世界政治观点的改变大概会走向各个不同的方向。在共产主义后世界里，转向资本主义历程中的苦难很可能有损于民主伦理的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可能会纷纷地向更加朴实和更具有严密的约束力的信念（诸如突出种族地位、排外主义和宗教）中寻找寄托，而且由于对“腐败和自私的西方”的失望和蔑视，热中于这些信念的情绪更为炽烈。

在南亚、非洲和其他地方的四分五裂的而又备受挫折的前第三世界里，对居住在北半球的全球精英们——以及在第三世界里土生土长的，竭力模仿西方因而是离经叛道

的上层分子——的妒忌和愤怒会激起激烈的政治情绪，这种情绪很容易被任何一个准备承担全球拯救任务的组织严密的国家所利用，并借此进行鼓动。然而，鼓吹寻求“平等”和“正义”，通过全球性的传媒，与先进社会中新的和更加复杂的难题相互冲撞，结果这类鼓吹很可能缺少较单纯时代的意识形态的信念上的凝聚力，从而会表现出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上的拙劣的模仿。

归根结蒂，在世界的先进地区里，个人问题越来越左右着政治和享乐主义的孜孜以求塑造着社会生活，同时，科学为个人的自我改良开辟了崭新的前景；在世界的较贫穷地区里，谋求生存的基本担心和受挫折的沮丧情绪充斥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之中，同时现代通信使群众更加认清了现存的全球不平等状况。因此，乌托邦主义的失败也罢，全球政治觉醒也罢，都还没有标志着全球政治共识的来临。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里，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是反常的。一方面，美国雄踞于世界之颠。它的全球的综合力量无敌于天下，这一力量包含4个方面：1. 全球军事势力范围；2. 全球经济影响力；3. 全球文化—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由上述诸因素积累而产生的，4. 全球的政治实力。而另一方面，美国社会变革的动力和美国对全世界启示的价值观念的内容行将损害美国作为全球带头人的特殊作用。

目前，没有任何其他的国家在全球威望和力量方面堪与美国匹敌。俄国仍然拥有一个超级大国的核武库，但无能力在世界范围内投送其兵力，因为它的庞大的常规军队士气低落和正处于瓦解之中。在其他方面，俄国的力量也是十分不足的。德国和日本具有经济实力，但它们之中哪一个会很快把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军事力量尚不明朗。而统一的欧洲只有在欧洲统一化过程中取得重大跃进从而促成单一的政治—军事实体时，才能这样做。

相比之下，美国不仅拥有势不可挡的战略力量——始终不断地得到技术创新的加强——而且具有将其常规部队投送到遥远地区的无可匹敌的能力。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军事表现给人最深刻印象之一是，美国能够以特有的方式把一支数十万人的部队部署到遥远的阿拉伯半岛，并提供后勤保障。这种独一无二的军事能力是得到至今仍是世界最大经济实力的支持的。在本世

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经济实力约占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25～30%（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短暂和独特的10年里所占高得多的比例除外）。这种军事和经济的结合，转过来使美国拥有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全球政治影响力。

不足为怪的是，有线新闻电视网/安格斯·里德小组的民意测验——1992年中期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进行测验——表明，美国不仅被认为是目前世界的首要国家，而且世界的大多数人都希望美国保持这一地位直到可预见的将来。这不仅是一个实际力量的问题。在历史的现阶段里，美国对个人权利的强调也是决定美国的独特声望的一大要素。早些时候，法国革命——如前所述——对法国的欧洲邻邦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它引发出主宰了19和20世纪政治的乌托邦思想。今天，是美国——连同它的政治自由和它的大众文化——影响着这个通过现代化通信而变得十分亲近的世界。

然而，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里，人们势必还要问：美国能不能长久地保持它的特别的地位？是不是已显露出有对手确实可能取代美国？（例如，参与上述民意测验的大约20%的人答称，到本世纪末，日本可能作为美国的接替者取而代之。）还有，广而言之，当代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现实在多大程度上能适应正经历大规模的政治觉醒的千差万别的世界？而美国给世界其他地区的启示的文化内容又是什么？

历史的教导是：一个超级大国无法长期地保持它的主导地位，除非它能　　充满着相当大的自认为正确的信心

——提供对全世界具有重要意义的启示。这是罗马帝国、法兰西和大不列颠的经验教训。但是，如果这种启示不是来源于它自己的内在的道德规范（同时作为其他人的榜样来界定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那么，民族的自信心就会变成没有广泛吸引力的民族虚荣心。它终将为他人所摈弃——很像苏联帝国的衰亡那样。当代美国的内部动力——不仅是经济力量而且特别是文化力量——之所以与美国对全球变动的冲击施加有益影响的能力直接攸关，道理就在于此。

国际政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越来越把国际和国内政治之间的传统区别搞得模糊不清，从而进一步突出了美国国内状况对美国的全球声望至关重要的意义。为了对美国作为目前全球的首要国家的自己的持久力和未来可能与美国的突出地位一争高低的对手的实际前景作出评估，认清上述变化的性质和影响乃是必要的出发点。

第一章

全球大国的反常性

本世纪受到为争夺全球优势的三大斗争的决定性的影响。它们是：德国和法英协约国之间的斗争；德日和美苏之间的斗争；美苏之间的斗争。在这方面，20世纪在国际上比19世纪更加动荡不安——拿破仑失败以后的19世纪是相对稳定的，那时候英帝国充当了在比较保守的世界制度下的决定性的权力主宰。

然而，在结束第三次的大的美苏之间斗争的同时，也出现了国际政治性质的根本转变。在现代经济和通信的影响下，这一转变逐步加快。它削弱了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和促成了国内和全球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十分紧密的联系。世界事务越来越取决于国内的趋势，后者超越了疆界并需要由越来越无法以"主权至上"的方式行事的各国政府作出集体对策。

这一过程不会落入教条式地把世界分成"善"与"恶"两种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模式——像20世纪的大部时期那

样的情况。实际上，它标志着走向意识形态单一化的越来越强的趋势，使政府部门控制下的和超国家的资本主义成为普遍的社会制度。在这个世界里，超越疆界的政府部门和金融界的联系，得到了日益受跨国的大众媒体影响的政治趋势的加强。这种联系逐步使排他性的国家“主权”论的传统观念变得无足轻重了。

作为这些新的经济和社会现实的后果，一个全球的政治进程正在出现。它正改变着又取代着传统的国际政治。而在这一进程中，美国不仅是主要角色，而且是一个其内部结构和动态使之有机地与该正出现的进程协调一致的角色。美国敞开大门让外界参与它本身的事务——通过外国人主持的院外团，外国人对其财产的所有权越来越大，甚至于某些外国人参与确定其国内日程——使美国既成为漏洞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定义的典范，又成为该定义的先驱。与此同时，这种现实还使美国乐于把世界视为一个共同的政治进程，而美国有权参与别国的国内事务，有时对它们的发展经济的优先顺序或人权状况还会提出令人不愉快的评断。

这个尚未成形的全球政治进程应当显露出形成一种最初的全世界的共识，它可能成为普遍的道德标准的开端。其实质已由拉尔夫·布尔特詹斯教授作了恰当的概括（见《伦理和国际事务》杂志，1992 年第 6 卷）：

与人权有关和无关的关心，那是另一回事——政治道德的全球化……。其结果是建立一个国际伦理的

机构，它的假定存在的守护者是一个名叫世界大家庭的松散的但却是真实的实体。目前，这个实体的特点和性质是模糊不清的，但是，毫无疑问，它拥有日益扩大的集体制裁的权力。有悖于刚形成的道德的政治行为所惹起的异议有时十分尖刻辛辣——对南非、伊拉克和海地政府，人们尤其有此感觉。因此，基于日益扩大的共同理解所形成的概念的抽象化有时能起到促使实施的有力的作用。随着世界大家庭的独有的特性被刻划得格外分明，有一种尚待断定的事态发展是，它的干预能力可能会提高——预示着在未来有更多的干预以便设法改变一些国家的行为方式。

全世界群众的政治觉醒与目前亚洲、拉美和前苏联集团地区内国内政治的民主化同时发生，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这一转变。按定义说，民主政治是公开的。由于超越国界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各个国家的民主进程会越来越容易接受外国来源的观念、甚至独有特性的影响。几乎所有的民主政党还都是各种"国际性"联盟的成员，从而进行相互得益的交流和进一步混淆了传统的国际分界线。

然而，尽管越来越有共同性的全球政治进程的现实正在出现。但世界仍然分成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政治变革的速度和方式是被可能叫做起催化作用的国家所确定的。它们把自己的影响扩散到近邻，也促使较遥远的国家进行模仿，只有少数孤立的地区不受新政治时尚和观点的影响。现

代世界的实际上和心理上的相互靠近，既加快了又加强了这类起催化作用的国家的影响力。

在现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国担当了这种起催化作用的国家的角色。法国革命首先提出了民族国家的概念，并示范性地将该概念贯彻于以后的两个世纪之中。甚至使法国国内的革命阶段就此结束的拿破仑也在全欧洲散布新的政治观点，从而根据客观环境，以不同方式将理想主义、民族主义和现世主义的内容混为一体。

法国就这样成了第一个起催化作用的民族国家，它充当了历史的催化剂，凭借它所提出的思想观念的力量来改变别的国家。甚至比较遥远的欧洲边缘地区也接受了它所传播的影响，起而模仿和采用法国的政治语言和制度。国家的新的组织制度——以"公民"为基本单位和划分成大小差不多一样的"县"(或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法国人喜爱逻辑性和对称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正式操同一种民族语言的国家本身便成了民族的化身。

在人类政治历史的这一阶段中，国家便成为世界事务的主要的"具有主权的"单位。世界事务转过来被主要是地处欧洲的帝国的最强有力的单位所左右。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不列颠是最重要的角色。它起到了一种均衡的作用以免出现一个单独的能支配全球的国家，而它本身则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中独占鳌头。例如，在1880年，欧洲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61%以上，而大不列颠一国就占了总产量的23%(美国占了不到15%)。英国的经济金融实力和对海

洋的控制使伦敦能对当时的强权政治行使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全球的权势等级是清楚明确的，但是，在国家间制度基本上是保守的背景下，大不列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只是保持必要的均衡而已。

20世纪期间美国在世界上崛起和显赫之时，正是根据主权国家等级制的较保守的世界秩序面临危机随即崩溃之际。的确，到这个世纪的末期，曾经令人忆起当年雄风的排他性的国家主权论已让位给非常流行的相容性的国际间相互依存的观点。这一侧重点的转变说明了新的全球政治进程的开始，使真正的外国观点和纯粹国内观点两者之间的区别变得混淆不清。

在这个全球的进程中，美国在今天成了真正的起催化作用的国家——人们赞扬、愤恨、模仿的目标，同时它——甚至更戏剧性地——对其他国家的社会道德观念产生直接的和深刻的影响。美国左右着全球的谈论、全球的认识和全球的教育上的相互影响。在任何时候总有50多万名外国学生(其中近20万人来自亚洲)在美国学习(这个总数是任何其他东道主国家招收国外学生数目的几倍)。据估计，全球传输和数据处理量的80%以均起源于美国，全世界电影发映量的50%以上都是美国生产的影片(播放电视“情景喜剧”的数量甚至还要多)。美国在国外播放电视节目之多，任何其他国家都是望尘莫及的。(近几年来，英法已占第二位，但是，尽管英法历来各自有其世界文化的抱负，两国分别的销售额均不及美国总出口时数的15%)。从而每一个洲都

受到美国电视所播放的形象和价值观念的影响(有人说是传染)。这一情况引起了国外的频频的指控,认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已构成对本国文化多样性的威胁。

此外,美国本身实际上是全球社会的缩影。它的公开的多元文化——纽约是半欧洲的大都会,迈阿密则是一个半拉美的城市,而洛杉矶正成为东方的延伸地——加强了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有机联系。甚至美国的城乡骚乱也活生生地反映了全世界总的更为动荡不安的社会和心理状态,而美国国内的趋向不仅是外国向往着迷的目标,而且还被认为是预示着——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它们自己的未来。

目前,外国模仿美国已成为全世界的现象。这不仅是一个文化时尚、社会风气或消费方式的问题。它本身还说明是一个政治问题,无论从认真严肃的角度看和从细微末节方面看都是如此。全世界对人权问题的日益敏感,固然部分原因是全球政治觉醒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但它之所以尖锐化却是由于美国突出了这个问题。美国大众媒体与政府对立的关系,特别是专门从事调查的政治性的新闻业使外国纷纷地认真仿效。个人竞选最高行政职位的做法也越来越多地以美国总统选举为榜样。最为重要的是,人们日益普遍地认识到,稳定和受尊重的宪法已成为国家政治的合法框架的中心地位,这也是来自美国宪法所发挥的特别持久作用的影响,尽管美国社会在其他方面是变化迅速的。

所有这一切的基础是,从开始起美国就与个人自由观

念有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使美国不仅成为一个起催化作用的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政体，在整个美国历史上吸引了无数的人——至今仍然如此。此外，这一吸引力激起其他地方的日益加大的压力，以便采纳权利法案和其他的个人自由地在政治上自我表现的保证。

模仿之风还扩大到政治生活的正式的和细微末节的方面——但是，这也提供了目前美国发挥起催化作用的实例。例如，越来越多的国家——从共产主义后的俄国到远东——都在它们的政府编制内设立一个名叫“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机构——显然仿效美国，甚至连名称也与美国的称谓一样，这是因为新闻界对美国总统的这一具体机构蒙上了神秘的色彩。同样，越来越多的国家模仿美国的军队制服，以为从这种制服中可以看到——像早些时候模仿法英军服那样——它们自己军队未来的模型。连保护美国总统的特工的仪态和外表都在国外被刻意地照搬照抄了！

这些公认为浅显的例子也足以反映了一个更深层的事实：国际政治的背景和格调，是由那些在不同历史阶段里，从其行为、组织和精神素质中反映出方兴未艾的前途的国家所确定的。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和对人类的极为有限的一部分人来说，以及在极大程度上通过强制的实施——苏联也是被视为属于这类国家的。无论在实质性问题上或在表面的事物上，整个共产主义世界都以苏联为榜样，亦步亦趋。不论是政治局作为首要决策部门的作用问题也好，还是苏式军服也好，更不用说文化中的社会主义的现实

主义了，有志于扮演世界级起催化作用国家的角色的正是苏联，但它的好景不长，最终成了泡影。

今天，美国几乎在无可争辩的程度上扮演了这一角色。正如昔日的法国唤起民族国家成为世界事务的主要单位，也像英帝国在一个很保守的时代里雄踞全球的国家等级制之颠那样，今天美国正以它自己的存在，推动着一个更加包罗万象的和有机地相互依存的全球的政治进程。美国是在这一背景下起推动作用的，即世界政治越来越反映到它自己的国内政治之中，和它的国内政治令人联想起全球政治的缩影。

这一情况的后果是产生了一种反常现象。一方面，今天美国是拥有全球超级大国的四大特点的唯一的国家；而与此同时，美国正塑造一个开创性的全球政治的新模式，其固有的特点是，不仅逐步淡化民族国家的主权完整性，而且还削弱一个超级国家行使全球决定性权力的能力。

实际上，美国的全球显赫地位反而促使甚至创造了使美国越来越在全球无能为力的条件。令人吃惊的事实是，美国在世界中的权力类似美国总统在处理美国各种国内的，特别是种族/城市问题时的权力。很多人期望总统能果断行事，但实际上他的权力备受限制，不仅是宪法上的限制，而且还受到他所面临的各种极其错综复杂的问题的限制，特别是受到使要求越来越高的选民们欢欣鼓舞的民主化的限制。他们的应得权利成了他们的合法权利，而后一权利的日益扩大必然成为行使权力的障碍。

类似的情况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全球的政治问题既属于社会经济方面，同时又属于环境方面，甚至属于哲学方面。因此，它们越来越难于得到明确界定的答案，甚至更难于采用来自一个单一政治中心的军事力量来解决问题。穷国要求获得更大的平等地位，至少获得这种机会，这些正成为它们应得的权利。国际机构——甚至连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不用说联合国的专门职能机构了——都越来越摆脱有决定意义的美国影响，而它们本身都已成了过分自信的决策者。

近年来的两个实例足以说明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是新的全球政治进程出现时本身所固有的。在里约热内卢环保会议上（1992 年 6 月举行），美国未能组成一个富国联盟以便支持它自己的较保守的立场，因此，美国陷于被排除在有关生态问题至关重要的新的全球共识之外的境地。美国的力量已不足以支撑美国的立场了。

另一个实例是有关美国在 1991 年海湾战争中的领导地位。美国的军事表现是蔚为壮观的。但是，为了发起战争，美国不得不向联盟寻求财政和政治支援，而这个联盟的成员国并不都同意美国有关萨达姆·侯赛因肆无忌惮地违反道德的看法，从而限制了这场战争的军事范围和政治目的。（这一限制条件甚至使一个重要的日本的国际问题学者——1991 年 5 月 9 日《日本文摘论坛》援引了他的话——说，“美国不具备成为世界警察的综合能力。美国应当谦虚地承认这一点。”）结果，美国的军事胜利没有成为一次决定

性的政治胜利，而只是部分的成功和继续不断与没完没了的纠缠不清。在伊拉克的结局和早些时候在巴拿马的军事行动的结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后者，美国的力量在当地不受制约，也不依靠国际支援。

因此，在逐步形成的全球政治进程的背景下，美国优势的含意就有所不同了，其实际后果也不如认为美国是新的世界秩序内唯一超级大国所想象的那么大。然而，这个世界"秩序"尚未出现，尽管存在着权力的全球等级制，尽管美国居于该等级制之首，以及尽管美国今天是主要的起催化作用的国家。相反，即将到来的是，跨越国家疆界的全球有组织的程序，这一程序将产生不易具有明确定义的和清晰的权力安排的全球政治。

它是一个曾一度包含着全球大合作的大好希望的进程——而目前行将变得拥塞停滞、混乱不堪，甚至暴力四起。由于世界不喜欢这样的无政府状态——因为大多数国家认识到它的潜在的破坏性——以及由于曾风行一时的"革命"的吸引力因共产主义的垮台而信誉扫地，这个世界更倾向于不能给予任何一个国家凌驾天下的合法性，即便它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的优势既是现实又是空想。一切问题——尤其在国际安全领域中——最终的解决都得取决于美国的对策。然而，这种对策本来就受到两重的制约，其情况正如在美国国内政治中所一目了然的那样，即它既受制于政治上觉醒的全球社会所面临的大范围的交错复杂的困

境，又受制于美国的全球权力并不等于美国有全球权威的事实。

真正的权威拥有超过权力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花较少的精力就可以行使权威——因为服从总是自动的。但是，服从权威靠的是，承认它反过来在共同价值观念基础上的合法性。混乱的全球政治进程比以往保守的国际制度更加需要统一的价值观念，如果是全球合作而不是冲突要成为这一进程的主要现实的话。

因此，美国的价值观念对于最终可能叫做新的世界秩序的重大关系就成了主要的问题。毫无疑问，美国向全世界传播着强烈吸引人的和具有感染力的自由的启示。然而，这启示基本上是程序性的，它强调的是确保人权和选择自由的宪法程序。而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启示的社会和文化内涵——它所传播的道德观念和生活作风。除非这些上面起到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否则就会发生危险：美国的全球力量——如果缺少必要的合法性和从而无力确保积极的控制——可能会被美国自己的价值观念的全球影响所破坏。

第二章

不协调的启示

在以往的岁月里，被汪洋大海所阻隔的美国似乎很遥远，美国的自由启示却十分鲜明地界定了全球对这个国家的认识。当世界开始变得越来越小而同时又受到极权主义挑战的威胁时，对世界的大多数人来说，捍卫自由是美国的特点。随着极权主义的挑战被成功地阻遏，和随着世界目前缩小到可以立刻相见、直接交往和日益亲近的程度，对于全世界的其他人来说，美国生活的现实和美国社会的实际价值观念越来越成为美国的特点了。如果用特写镜头对美国社会作写实的而不是理想化方式的描述，那它就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好恶参半和甚至吹毛求疵的反应。

因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特别是美国的权威必然更多地取决于美国国内在以下问题上的实际进展情况：美国经济是如何对付外国对手的有竞争力的挑战的？美国在实践中和价值观念上是如何界定幸福生活的内涵的？以及美国是如何——在上述基础上——对政治上觉醒的乌托邦后

世界的具体困境作出反应的？美国的反应要么会加深在惯常叫做第三世界的与前苏联集团的新近奋起的群众的渴望和冷战后胜利者的追求物质享受的文化之间的思想对立，要么会沟通思想上的分歧。

当代美国——在世界的其他地区以空前程度的严格审视下——目前正面临着一系列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挑战。对前一种挑战的对策很可能在确定美国与其经济对手国家，尤其与欧洲和日本的关系方面，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而对后一种挑战的对策，在形成美国行使真正的全球权威的更大能力方面——即，将它的力量转化为拥有道德合法性的领导——就更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了。

如果对美国的缺点或国内的挑战提出任何的核对清单，它难免有个人武断和选择的倾向性。不过，下面的清单可能包括目前困扰着美国的主要问题或难题。这个清单的前一半大致可以被认为是涉及可能叫做"硬"问题——更易于靠具体行动或政府政策来矫正——而后半部分则需要有态度上的转变方能取得改进（显然两部分的问题之间有相互重叠之处）。前一半还对经济作用产生更直接的影响，而后一半则更普遍地影响着和反映了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尽管对经济也有间接的影响。

下面清单列举的各项问题不是按重要性的顺序排列的，但它试图尽可能地按先后顺序处理各个项目。实际上，这 20 个需要除弊兴利的基本难题，构成了美国振兴和有效地重新肯定美国行使持久的全球领导能力的议事日程：

1. **债务**——它已造成超过4万亿美元的累积国债；它使1992年的预算赤字达到4 000亿美元左右；它使美国的未来背上了越来越沉重的——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负担。

2. **贸易赤字**——它迫使美国进行借贷，尽管美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它威胁着某些生产和就业的关键部门，从而造成失业。

3. **低储蓄和投资**——它部分地由于一种有利于特殊利益的个人和鼓励消费而非投资的税收制度所促成，结果是储蓄和投资率都比美国的主要经济对手的储蓄和投资率低得多，从而它使美国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相对下降。

4. **缺乏工业竞争力**——尽管甚至在困苦中的汽车工业已有某些回升的迹象，但工业上竞争乏力的现象因缺少长期的国家目标规划（与欧洲和日本形成对照）而变得更加严重了，更不用提举债经营中全部买下上市产品的破坏作用了。

5. **生产率增长速度低**——它尽管仍保持较高的美国水准，但一直比美国主要对手的增长速度上升得慢；它还进一步受到较严重的劳工骚动和罢工以及日益下降的职业道德的不利影响。

6. **不合格的医疗保健制度**——尽管实际上为美国的医疗保健花费了庞大的资金，但仍有数千万美国人没有得到必要的医疗保障；它使美国的预期寿命率大大低于主要欧

洲国家和日本，并使其婴儿死亡率高于它们。

7. **低质量的中等教育**——中等教育经费开支尽管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较大的百分比，但美国青年比大多数欧洲和日本的青少年要无知得多，因此，大约有 2 300 万美国成年人实际上是文盲。

8. **日益恶化的社会基础设施和普遍的城市衰败现象**——指的是存在着只有在最穷的第三世界国家才有的那种城市贫民窟的大部分的美国大城市。不用说需要大修的包括桥梁在内的公路系统、实际上没有快速铁路运输系统，以及污水排放、堤坝和现代社会基础设施的其他方面都不合格。

9. **贪婪的富有阶级**——它往往反对真正的累进税收（即便最富有的 1/5 的人在 1991 年占总收入的 46.5%；而最穷的 1/5 的人只占总收入的 3.8%）；更令人震惊的某些情况是，它素来善于进行大规模的非法活动以中饱私囊（例如，1991 年的畅销书《贼窝》所作的生动描写）；它包括多如牛毛的股份公司的总经理，这些公司坚持要给他们酬报——往往处心积虑地以经股东会审核为幌子——其数额之大竟达到西欧或日本的数倍。

10. **爱打官司到了走火人魔的程度**——这也是举世无双的（全世界的 1/3 以上的律师都在美国开业）；用于反侵权行为制度的费用开销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3%左右（即是美国的主要对手的 3 倍），并对工商企业家起了无可估量的抑制作用。

11. **日益加深的种族和贫困问题**——真够丢脸的，总共有 32.7%的美国黑人(据 1992 年人口普查局报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 3 个黑人中就有 1 个！——而且还有 11.3%的美国白人处于同样的困境，合在一起共有3 570万个美国人生活在与“举世无双的全球大国”不相称的处境中。

12. **广泛的犯罪和暴力行为**——部分地是上述情况造成的结果(全部在监犯人总数的 50%左右是占全国人口 12%的黑人)，而由于特别容易搞到杀人武器，使个人手中的枪支——甚至实际上是罪犯手中的枪支——比世界上大多数军队的枪支还要多，罪行和暴行就更加泛滥。还由于宣扬暴力的电视和电影文化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都使美国的杀人率高居世界所有文明国家的榜首。

13. **大规模毒品文化的流行**——在贫困的种族贫民窟占有主导地位，部分原因是作为一种心理逃避的方式，部分原因是作为迅速致富的旁门左道，从毒品中赢利所得估计每年超过 1 000 亿美元。而在这类贫民窟以外，特别在大的城市中心，毒品文化也在蔓延。

14. **社会上绝望情绪的内部滋生**——这不仅成为目前贫穷者和无家可归者，特别是很多城市的年轻黑人的通常情绪，而且还包括已经是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依靠社会福利救济而“上了瘾”的数百万人也抱同感。

15. **过度的性自由**——这正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活作风，通过日益流行的所谓单亲家庭威胁着家庭的中心地位，

转过来极大地涣散了社会凝聚力的主要纽带,更不用说性放纵的悲剧性副产品之一的艾滋病了。

16. **通过视觉媒体大规模地传播道德败坏的世风**——作为吸引观众的手段,以娱乐为幌子热中于事实上的宣扬性和暴力;而实际上是传播官感上的自我满足。

17. **公民意识下降**——它不再要求公民为民族国家作任何形式的服务或牺牲。

18. **潜在的制造分裂的多元文化主义抬头**——它一方面集中体现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认识,承认美国社会的多样式的现实;但另一方面,通过蓄意贬低共同语言、共同的历史传统和政治价值观念的民族统一和社会平等的作用,它可能使多民族的美国巴尔干化。

19. **政治制度出现拥塞现象**——它会使选民们感到他们的政府是高高在上的、不负责任的和腐败的,而特殊利益的集团或个人则享有特权,以及政治精英享有不公平的机会可以无限期地在官位上自我长存。

20. **日益弥漫的精神空虚感**——很多人渴望获得某种超凡的信念而又发觉现有宗教形式过于仪式化,与解决他们的难题无关,从而深感精神空虚,结果,教会面对宣扬自由放纵的价值观念的文化冲击,也束手无策,无力博取人们的拥戴。

显而易见,以上清单可以再加长,或缩短,或修改——取决于有关解释者观察的角度。不过,可以这么说,以上概述是概括了当代美国的主要的基本难题或缺点。与此同时,

必须毫不迟疑地补充说明，上述各点既不是全面界定也不是全面描述当代美国，充其量它是一幅漫画，尽管漫画是要画龙点睛地勾勒真相。因此，它刻意地着力于论述急需矫正的诸因素，如果美国要保持它在全球的主要作用和具有全球吸引力的话。

这个清单本身包含着三个大的和相互重合的范畴：经济的范畴，社会的范畴和甚至于哲学上的范畴。第一类是直接关乎美国和它的经济对手竞争的能力；第二类涉及美国社会内的生活质量的状况；第三类则是有关逐步界定美国特色的美国价值观念、志向和信念。

说到底，不大可能得到决定性矫正的是第二、三类中的问题。尽管第一类所暗示的主要经济议事日程看来势不可挡，但它实际上是美国历来有能力处理的项目。它包含着种种困难的、复杂的和根深蒂固的问题——但仍然是美国能够认清和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具体的，总的说来是纯客观的，因此，解决它们就可能改善美国对付它的经济对手的地位。这一点美国社会可能理解，因而问题也可能得到矫正。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采取对策，甚至正开始取得某些进展。

相比之下，对一般的社会问题和甚至更加笼统的文化问题，是不容易采取迅速的对策的。一个原因是，这类问题的定义很难捉摸。因此，应采取何种对策就很难达成所需要的社会共识。另一个原因是，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有效的矫正需要采取坚决的政治行动，而在复杂的和相互连锁的美国

宪法体制下，这就格外困难了。此外，社会的和特别是文化的难题最终还是属于哲学性质的问题——而在多数情况下，通过政府政策对这些问题作出反应甚至是不适当的。

这样，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至少会针对第一类的各种问题采取部分有效的对策。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不仅美国普遍地认识到日本和欧洲的经济挑战，而且公众也多少下定决心要作出反应。政治领导人是如此，企业界人士也一样。即便不大可能形成高度协调一致和大规模的全国行动，在很多战线上美国的行动仍可能得到加强。

借贷是避免困难的社会经济僵局之上策的想法——在80年代盛行一时——业已信誉扫地。赤字——无论是预算还是贸易赤字——都被认为是对国家长期的经济健康发展的挑战。同样，人们越来越认清，必须采取某些深思熟虑的主动性以便提高美国工业技术的竞争力——即便这样做并不完全等于采取一项包罗万象的"工业政策"。竞争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已指出了作为最终对策出发点的美国继续领先和日益落后的领域。

还应当注意到，这些研究报告确认情况并非纯属消极。尽管美国工业在工程和生产以及电子部件的广阔领域中力量薄弱或相对地缺乏竞争力，但是，美国在诸如生物技术、发动机和推进器、信息技术的广阔领域中依然遥遥领先。美国的汽车工业正开始重新取得竞争优势，目前有些美国造的型号不仅在质量上堪与日本产品媲美，而且确实在生产中成本效益更好。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近年来，新的美

国公司本身证明比同类的日本公司更有创新精神和发展得更快——从而唤起美国经济的持续不断的能力，进行创造性的技术创新和成功的工业竞争。

关于提高美国工人技术的必要性，两党也正在达成共识。尽管提出的计划可能互有差异——有的人主张对公司主办的训练实施见习生计划和税收鼓励，而有的人则主张联邦出钱的训练计划和为赢利目的的“业主”学校——无论如何，这个问题显然不再被置之不理了。此外，尽管在过去的 20 年里美国劳工生产率的全面提高落后于美国的主要对手，在 80 年代美国制造业（它仍然代表着国际贸易的最重要部分）的生产率的增长比德国和日本要快。

除此而外，竞争政策委员会（根据 1988 年的综合贸易和竞争法建立）向总统和国会提出的第一个年度报告力主，采取多项旨在形成国家竞争战略的举措。付诸行动的建议着眼于节约和投资，但也主张对诸如教育、训练和医疗保健费用的社会薄弱环节采取具体的补救举措。诚然，不是所有的建议都可能实施，但是，这些建议确实反映了公众越来越意识到迫切需要采取有目的的行动。

最后，还要注意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美国经济衰落的情况是被不可靠的数据资料歪曲了。很多“证明”美国在国家富裕程度或一般福利方面的主要指数已落后于其对手的计算是极不稳定的，这要看采用什么标准而定。例如，如果利用市场汇率来计算，美国就不再是人均最富的国家，而落到日本（尽管日本公民个人的生活质量有明显的局限性）和

几个欧洲国家之后。然而，如果采用购买力平价理论汇率计算，那么，美国仍然位居第一，把日本远远抛在美国后面，正像采用前述衡量标准时美国落在日本之后一样。

美国究竟在新技术、工厂和设备的实际投资方面落后于日本和德国多大程度，这也要看在比较计算中所采用的汇率而定。还有，大多数的对比都忽略了这一事实，即日本的工业建筑总是比美国的昂贵得多，它直接降低了日本用于技术革新投资的实际百分率。简言之，不仅美国复苏的潜在能力往往被低估了，而且在与蒸蒸日上的日本和西欧对比下，美国在技术上和工业上日益衰落的情况也常常被夸大了。

不幸的是，对美国继续保持全球的卓越地位来说，更多的不祥之兆是，美国现状的社会和哲学方面的影响。这些方面对确定美国可能成为全球角色来说，与经济因素同样重要。它们影响着世界其他地区对美国的看法，从而不是加强就是削弱美国作为全球变革的触媒剂所能发挥的作用。

在这方面，美国诸多的棘手难办的社会问题和越来越主宰美国文化和精神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对立，呈现出最大的危险。前者是几十年来采取差别对待、冷漠无情和近来的家长式治理的年久日深的后果，结果是出现了大片贫困、落后和被社会摈弃者的聚居区，它们与美国生活的其他方面的联系，被偏见和只求延长生命不顾生活意义的家长式治理的无形之墙所隔绝。这一状况因美国宪法制度的拥塞停滞而变得年深日久、积重难返，它抑制了采取协调的行动

——可能甚至通过某种强迫训练和就业的方式——来解救千百万人，他们是面临着危险：被永久排除在分享美国是充满机会的神圣（但可惜也越来越仪式化）观点之外。

必须正视的现实是，如果美国社会的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没有大的变化，在这方面就不可能有大的改进。随着宗教和爱国主义不再时兴，“霍雷肖·阿尔杰”哲学①就成了主要的伦理标准。它的潜台词是蔑视失败的人，并深信贫穷多少是自己造成的。顽强存在的种族主义——至今未从美国社会中根除掉——助长了普遍存在的对贫穷者视若无睹的道德上的沾沾自满的情绪。此外，目前突出强调——特别是大众文化主要媒体的大肆渲染——对物质财富的崇拜，提倡消费和鼓吹自我放纵就是幸福生活，从而掩盖了主要的社会难题，并抑制了作出某种终将采取真正有效的补救行动的反应。

电视对美国价值观念的形成所起的特别消极的作用，已如前述。在缔造全国文化及其基本信念中已占主导地位的正是这个媒体。像詹姆斯·特威切尔在他的讽刺作品《狂欢作乐的文化——美国风格的沦丧》中所说，美国电视已成为“一种媒介，其内容有深远影响而又庸俗不堪，以至几乎一味地从现代文化中搬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使之成为行为的准则。”结果是出现了一种被牟取暴利者所驱动的大众

① Horatio Alger——霍雷肖·阿尔杰（1832.1～1899.7），美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其作品的基调是：凭着诚实、不屈不挠的乐观精神和艰苦奋斗，发财致富。——译注

文化，他们正是利用了大众对庸俗、色情以至野蛮行为的渴求心理。伤风败俗和享乐主义在文化中占了这么大的优势，就必然对社会价值观念起涣散的作用，并损伤和破坏曾经被人们笃信的信念。

电视在破坏代代继承的传统和价值观念方面起了特别大的作用。电视的娱乐节目——甚至新闻节目——都拼命渲染现实使之产生脱离道德支柱的有新奇感的刺激，同时把物质的或性欲的自我满足描绘成正当的，甚至是值得赞扬的行为。看到提供给年轻观众看的最通俗的节目——和观看最多的"访谈"节目——个劲儿地宣扬堕落颓废和放荡淫逸，同时为摈弃传统的权威而高声喝彩，真是令人震惊。下面的这番话，有人可能认定是一个原教旨主义鼓吹者讲的，而实际上是赫然登在《经济学家》周刊(1992 年 3 月 28 日)的调查报告上。该刊说，青少年看得最多的美国电视节目，通常把他们的双亲都描绘成，"沉缅于饮酒、吸可卡因或新时代牌的迷幻剂的情绪起落无常的、离了婚的白领罪犯"。这样就难于提高双亲将价值观念传授给子女的能力。

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的核心家庭的明显衰落加剧了当代美国的文化—哲学的隐忧。这一衰落是大众媒介所反映和传播的变革中的社会价值观念的直接结果。家庭意味着结构、责任和克制。好的家庭生活的必要条件是与无节制的享乐主义格格不入的，因为它们有义务要作出牺牲，做到忠贞不渝和相互信任。相反，削弱了家庭的纽带会使个人更沉溺于新奇时尚，因而还会使内在信仰越来越动摇不定，不用

多久，这种信仰就转变为谋私利的自我主义的论据。所有这一切都有损于持久原则的形成，更不用说某些社会共同遵守的自我克制的准则的制定了。

美国显然需要花一段时间，在哲学上进行反省和文化上作自我批判。在这一时期内必须认真地认识到：以相对主义的享乐至上作为生活的基本指南是构不成任何坚实的社会支柱的；一个社会没有共同遵守的绝对确定的原则，相反却助长个人的自我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然而，任何恢复和重振美国的企图都将不得不在比过去复杂得多的背景下实施。因为美国的种族和文化组成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到 2010 年，每 5 个美国人中大概有 1 个人是西班牙血统，1 个人是非洲或亚洲血统，3 个人是欧洲血统。而到 2050 年，每 5 个美国人中，西班牙、非洲或亚洲和欧洲血统的人则分别占 2 人、1 人和 2 人。换句话说，欧洲人的比重从 60% 下降到 40%。这时的美国将与不久前的基本上是欧洲血统的美国迥然不同，它更可能反映出业已使世界分裂的文化和哲学的分歧。

美国从一个由白人盎格鲁 -撒克逊新教徒文化主宰——和塑造——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全球人种拼凑成的社会，将引起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并可能使社会凝聚力进一步有所丧失。尽管这一变化可能会产生新的创造力和动力——以及它带来的知识和人员方面的好处都是无可否认的——它也可能会引起混乱，甚至有潜在的分裂作用，特别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共同语言和谆谆教诲中的共同政治哲

学的统一作用都被蓄意地破坏的话。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宪法承诺奠定了全国文化共识赖以存在的基础,而没有这些共同性,文化的多样性就可能维持不了社会的承受能力。这样,美国的社会就有面临解体的危险。

有这种担心的人很容易被人称为种族主义者,但轻易指责人的做法是回避——甚至加剧——行将出现的问题。在有种种差别的美国内部,重新建立全球文化和种族拼凑的社会,实际上将使解决美国所面临的社会和文化难题变得更加困难。对于这种极大的可能性,人们不能简单地置之不理。的确,如果没有在真心实意地处理这些难题的过程中取得重大进展,那么,在美国内部的新的拼凑的社会甚至可能引起日益升级的城市游击战。这么说并不等于否认无论如何几乎不可避免的美国种族组成的变化。但是,这么讲的意思是,必要的文化振兴很可能即将来临,如果民族团结的必不可少的语言和哲学渊源要认真地加以保留的话。

因此,美国的内部社会和文化难题所构成的对美国全球卓越地位的危险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一个基本上由缺少深刻的人的价值观念的追求物质享受思想所支配的社会形象,总会削弱美国社会模式的全球吸引力,特别是作为自由象征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这一形象总会在全世界多数贫困的广大群众中引起过于夸大的物质期望,这类期望无法得到满足是可以理解的,但期望落空就必然会加剧他们对全球不平等的愤慨之情。

第三章

无法辨认的对手

如果美国摇摇欲坠——无法施行有效的全球权威——有没有对手能够来替代(或取代)美国？哪个现存国家有潜力——尤其具有政治上的雄心壮志——能在全球力量的四个关键方面与美国试比高低？哪个国家能提供一种令人向往的启示，并以坚强的全国的自信心作为后盾来实现该启示？

没有本能的、固有的民族抱负(它甚至无需作强有力的表述)，任何民族都无法立足于伟大国家之列。只有那些国家，具有以某种不确定的方式促成在文化上自发地爆发出不断探索和取胜的富于自信、敢于竞争和充满活力的欲望，才能自行转变成一个明显地高出别国一头的实体。这一欲望反映了共同致力于民族富强伟大的荣耀和命运的无数人全心全意献身精神所表达的神秘的使命感。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成功地使个人主动性与集体福利融为一体的特别的欲望曾把罗马城转变成一个欧洲和

地中海的帝国，把英吉利岛转变成一个海上的全球帝国，并把莫斯科公国转变成一个大陆帝国。西班牙、法国和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基本上也是这样。这不是哪一个人想要这么做的，而是无数个人自发地共同抱定的历史志向和齐心协力地使之实现。

但是，单靠意志——个人的和集体的——不足以成事。大国的出现也是特定的历史机会与固有的实际能力相结合的结果。这一时机——或历史趋势——必须与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起催化作用的国家的兴旺发达相适合，这个国家对整个世界至关重要——不论是通过传播文化的使命，或学说上的启示，或令人向往的社会楷模——而其他国家则甘愿接受该国的影响。最后而又重要的一点是，该国一定要有必要的实力、经济和军事的力量。

在可预见的将来，上述条件是否分别适用于和适合于日本和欧洲的大概情况？在这一历史阶段，只有该二者——特别因为它们的经济实力——赫然耸现为最可能的美国衣钵的继承者。因此，预测该二者是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接班人已成为时髦。由于它们各自的情况和前景不同，必须分别予以评估。

在日本，民族意志起了特别的作用。近半个世纪前，在1945年的暮春，日本确实在燃烧。它要作为亚洲的杰出国家——"大东亚共荣圈"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分享世界权力的勃勃野心正化为灰烬。50年的苦心经营，以日本对俄国的宏伟胜利起到同时对中国和美国的大规模战争止，都

付之东流——遭到了屈辱的和彻底的失败。如果日本有过深刻反省、痛苦绝望和下决心相应地收敛其民族野心的时候，那就在此刻了。

1945 年 4 月 11 日，东京大学的一位教授接受了一位友人的来访。来客是"大东亚省"的一名年纪轻的官员。两人就日本战败和战后前景问题作了长时间的私下交谈。这位官员是个有头脑的经济学家，喜好做长期计划。两人的结论是，仗确定打败了，但并不意味着其他一切都失败了。按照来访者的说法，日本应当从其悲惨的经历中汲取一个主要的教训，即"自然资源天生贫乏的日本必须以发展精确工程为中心来创造它的未来。"这位教授在他的日记里，以极大的热情援引了来访者所描述的一个历史性隐喻，以阐明他的主要的寓意：

> 一个穷武士想买一套漂亮的盔甲，但没有钱。他就节省每天的食量，慢慢地他攒够了钱买了一套好的盔甲。战争爆发了，他勇敢地挺身而出参加战斗，但因为经过多年的半饥半饱，他的身体已经虚弱不堪，承受不了盔甲的重量，不久他就被敌人杀死了。
>
> 日本的情况正是如此。他认为，战败的日本决不会被允许进行重新武装，但这可能是件安知非福的好事。日本不具备跻身头等国家的素质，但它可以成为二等国家中的佼佼者。
>
> 我完全同意他所说的一切。如果完全禁止日本进

行重新武装，我的确十分高兴。穿军服的军队不是唯一的军队。具有科学技术和战斗精神的穿着企业制服的人将是我们的地下军。这场日美战争可以认为是，卡叽军服将输给企业制服。今天，我异常兴高彩烈，因为我找到了知音。

这一整段话刊登在大来佐武郎所著的自传《日本的峥嵘岁月：我一生的回顾》的书中，作者是日本著名的经济计划家，在70年代后期一度担任过外相，他以个人的特长推动日本积极地卷入国际事务。大来在他的书中接着谈到，他和一些同人如何决心弃绝绝望情绪，立刻动手干起来——尽管有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为日本战后的恢复和其新的国际角色制定计划。日本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使该角色充满着强烈的竞争热忱，并把上述援引过的嘱咐铭记心间："穿军服的军队不是唯一的军队。具有科学技术和战斗精神的穿着企业制服的人将是我们的地下军。"

这是追溯到1945年时的情景。半个世纪以后，很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国正处于"卡叽军服输给"日本人穿的"企业制服"的境地。无可否认，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促成日本的恢复靠的是，以上引证的发人猛省和具有历史重要性的那段话中所表达的专一精神。日本人的独特的民族认同感、日本民族社会的凝聚力、日本社会唤起共同目的、意识的特殊能力和坚韧不拔地追求较长期的战略目标，这一切积累起来再次把日本推向世界经济大国的前哨行列。

在以后的几年里，这个国家的实力将继续增长。即便日本经济增长的势头减慢，在后 20 年期间，日本至少将巩固它已经取得的世界第二号国民经济大国的显著地位，和可能接近于世界的最大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源头——美国，或者甚至于——这还要取决于后者的作为——超过美国。支持这一预断的数据资料非常充分以致对这个问题连一点争论都没有。诚然，唯一难于确定之处是，日本的经济增长会在多大程度上损害关键的美国工业部门，以及作为全球经济的科技带头人的美国会在多大程度上被超过。鉴于美国的长期持续不断的赤字和在美日贸易中大量的贸易顺差，与这种不确定有关的乃是美国财政易被日本的经济杠杆作用所利用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的种种担心使美国出现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预卜凶吉的小小的行业，其范围之广，从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将被日本取而代之的推测到有关美日之间再次爆发军事冲突的畅销小说。至少，预料日本将很快成为具有综合实力的全球大国，这一点已深深植根于美国人的——还有欧洲人的——关于未来世界的想法之中。

无疑，还可以援引很多材料来支持这种观点。预测日本必然上升到占全球的主导地位的大量文字资料——基本上属于危言耸听——可以信手拈来。之所以如此，一般是由于日本社会的特别素质和动力，以及日本经济增长的有关的势头。总的说来，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据说，社会价值观念使日本对美国具有特别的竞争优势，尤其因为日本

人的社会优先顺序是：首先献身给他的公司，其次国家，再则家庭，最后才考虑个人。相比之下，美国的社会价值观念恰恰相反。日本人的献身顺序有助于创立一个自发地参与完成一项共同目标——即具有使国家富强的意志——的社会，而这个社会是能被认真展望和规划长远未来的精英们明智地加以引导的。

日本之所以复苏和上升到全球金融—经济的卓越地位，无疑是得益于这些特别的特点，使这个国家——10 年接着 10 年地——为自己制定特别的目标，集中全国的资源从事持久的研究和发展工作，然后再利用它的相对优势。此外，防御负担较小和社会节俭成风都使日本保持了一个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的较高的国内储蓄率。近些年来，日本的国内储蓄率一直比美国的国内储蓄率高出 1 倍以上。储蓄、计划和投资——在这些方面美国一直是特别松垮的——做得好，正是日本取得经济成就的并非秘密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美国过分夸大其辞地指责日本对美国出口的歧视的原因。（有些计算指出，即便日本满足美国的每一项有关贸易准入的要求，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也才能减少仅 20%左右。）

尽管任何具体数字都不尽精确——况且还有比较购买力平价的复杂性——但是，日本在其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少得多的情况下仍能从事接近于美国水平的工业研究和开发，这一点是很清楚的。1991 年，日本人甚至占据了美国专利奖的主导地位，4 家日本公司名列前茅，1 家美国公司仅

居第5位。同年，日本经济企划厅所作的一份调查材料的结论是，尽管美国公司仍在43个领域中控制着关键技术，而日本公司并非落后很远，它们在33个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如果日本的经济继续按每年约高于美国经济一倍的速度增长，如果日元与美元的比值接近于100比1（这两个“如果”诚然是假设的大前提，但并非完全是不现实的假设），在10年左右的期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可以开始和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并驾齐驱，这一点是可能的。

经济上取得卓越的成就（由于“科技和战斗精神”的结合）很可能对日本的民族骄傲情绪火上添油，并可能使日本扩张其政治野心。显然，日本的民族主义已经抬头。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再次成为文学作品和大众媒介的深得人心的主题。甚至颇具国际主义者风度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曾骄傲地谈到日本的种族的单一性（以其所谓随之带来的高度智慧与美国的种族多样化对比而言），并颂扬“大和”民族传统的美德，断言这种传统具有普遍的优越性。狂热地鼓吹日本民族富强的代言人——从直言不讳的政治家石原信太郎到国际主义的企业领导人森田明夫——都谈到日本的特别作用，越来越公开表示对美国的蔑视，这种狂热可能预示着日本以其经济实力作为发射平台谋求登上全球政治领导者的地位。

与美国的摩擦可能更加速日本的这一欲望。两国社会总是通过曲挠镜和畸变的镜头相互观察对方。很多日本人越来越认为美国人生活在一个日益衰落的国家里。他们对

真正的或想象中的美国的缺点幸灾乐祸；他们轻信——通常是美国人自己写的——每一本或每一篇描述美国正在历史的下水道中下滑的书籍或文章。与此同时，美国人一味把日本的形象说成是一个完全被自私的经济动机所驱动的社会，它不公平地利用美国的军事保护向美国倾销其工业技术产品，从而使美国人失业。

美国公众转过来对日本企业和贸易界的做法进行了攻击，尽管往往承认它的优点，但已进一步加剧了日本人的反美愤慨情绪；疑心美国人念念不忘日本的经济威胁暗含着种族的动机，而更加助长了反美情绪。这就会对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注入一种偏激情绪的诱因，它可以被诱导到政治的和沙文主义的方向，正如有些日本政客已迫不急待地想那样做。

由于美国的政策，尤其在美日安全关系方面的政策的漫不经心的原因，这批日本政客的任务可能会变得容易些。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鼓励日本在军事安全方面承担更主动的国际角色和在军备方面增加开支的一贯政策，对于地区稳定和美国国家利益是成问题的。诚然，根据狭隘的地缘政治理由，迫使日本在军事上采取较高姿态表面上看来似乎合情合理，因为——从传统的国际准则看——一个人口约1.2亿、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的国家，在强大的邻国面前几乎没有防御能力，而是完全依赖一个从前是敌人、现在又是经济对手的遥远盟国的军事保护，这事确实有点古怪。

因此，日本的地区军事能力有所增加看来是有道理的和可取的。它将减少美国的负担和使日本更加自给自足和更加自力更生。此外，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里，维护安全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日本避免参加国际维持和平活动可以被认为是过失行为。无论如何，这一直是美国的论点，并且持续地对东京施加压力，鼓励日本承担更多的国际安全责任。美国的军事计划人员也一直在敦促日本人为了远东的安全扩大日本负责的海上和空中防区。

然而，人们不得不要弄明白，美国鼓励甚至迫使日本投入到真正的更加主动的军事角色中去，从历史的角度看，究竟是不是明智之举。美国所作的外来敦促助长了逐步消除日本对获取世界大国的传统装饰的顾虑。这种顾虑——尽管并没有抹煞日本民族谋求世界大国地位的野心（日本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但依然野心勃勃）——对促使日本参与全球事务时朝着更温和的"非军事"方向，是大有裨益的。

如果美国的政策目光短浅到要维护和大力促进日本的传统的帝国的强烈愿望重新抬头，那真是历史的大讽刺。到头来，这可能会使日本自己的武器工业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并使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安全利益的联系逐步中断。值得注意的是，当美国公开对日本施加压力要它更加主动地参与1991年的海湾战争活动时，这竟引起一位有名望的日本实业家提出（见1991年5月20日《读卖新闻》）美国军队应当离开日本，并提出日美安全条约应予修改；他还建议"日本

还应和汉城及北京合作以便建立一个独立于超级大国之外的亚洲安全体系。”

因此，考虑下列问题是合乎时宜的：如果日本使自己局限于保持为主要是一个经济超级大国，那么，野心勃勃的日本能不能有效地对美国的具有综合实力的全球卓越地位提出挑战？日本本身能不能成为一个具有综合实力的全球超级大国，特别如果得到美国的鼓励去寻求超级大国地位的更多的传统政治和军事的属性的话？

不因现存贸易摩擦所引起的恼怒而感情用事（且不说缺乏理性的反日情绪），人们得出一个不偏不倚的论断是，对上述问题的肯定结论是值得怀疑的。首先，日本的全球经济领导地位并不是预先注定的，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具有竞争力的对策（如上所述，这种对策已在形成）。况且，日本对外贸和原料的依赖，以及它的人口老龄化大大地限制了对任何关于日本的经济增长指数预测。人口动态对日本的长远前景构成了特别严重的威胁。据估计，到2010年，日本人口比美国人口有高得多的百分比的人将为相对无生产能力的65岁或65岁以上的人——从而戏剧性地减低日本人可能会有的储蓄和投资比率。

其次，日本经济发展的优先顺序正逐步开始发生变化。1992年中期，经济企划厅所通过的新的五年计划敦促日本力图成为一个维护全球环境的领导国家，并通过增加国内消费而不是着力于对外出口的生产来提高它本国的生活水准。很可能到头来，这种全面的发展顺序的变化将开始不仅

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产生影响，而且改变日本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内容。

再次，经济力量本身不会转变成政治力量。一个对全世界不能提供社会或哲学的远景的，而且还特别容易受任何国际冲突乃至局部混乱影响的经济超级大国，情况更是如此。日本人在对外援助方面的经验体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任何日本人潜在的想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抱负都存在着固有的局限性。今天，日本是世界上提供海外发展援助的最慷慨的捐助者，其捐助额远远超过美国。但是，并没有因为日本的慷慨解囊而给它带来多少政治声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接收援助的国家认为，这种援助是作为日本剥削它们的自然资源和进入它们的市场的回报，而获得某种形式的税款或贴补。日本所得到的政治好处充其量只是缓和一下反日的敌对情绪罢了，而对视日本为自私国家的普遍认识则起不了重大的改观的作用。

这种对日本干了好事还不领情的主要原因，是日本虽能影响世界但对世界缺少吸引力的结果。作为一个社会，它既不能向世界提供一种引人入胜的社会模式，又不能带来举足轻重的启迪。它的文化的单一性使日本——与美国大不相同——不适宜参与日益公开和具有有机连系的全球政治进程。美国是世界的缩影；而日本岛国则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这使美国的领导地位似乎更加自然，因而更加容易被接受。相反，任何企图硬要使日本占全球领导地位，都会使人情不自禁地感到陌生疏远和产生天生的反感。

再则，日本的局促而拥挤的城市创立不了一种令人竞相模仿和享有的生活方式的形象。它的语言——既难懂而其他人又摩不说——更加强了排他性和遥远之感。它的政治——把美国民主移植和适应于日本的文化——已经腐败和使人讳莫如深，而传统的效忠精神和个人的政治活动范围的影响之重大至少不亚于正式的宪法体制的作用。正如一个日本政治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国家有第一流的经济，第二流的生活标准和第三流的政治制度"——加在一起就不大可能促使把全球经济大国和甚至是初期的军事大国转变成强大的全球权威国家。

最后而又重要的一点是，日本经济实力之所以能够强大，靠的是相对稳定和安全的全球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稳定和安全取决于另一个国家的决策——和亲善，日本必须尊重它，否则就有遭到灾难的风险，随着日本财富的增长，它对这种全球稳定性的依赖将越发加大。例如，目前的迹象表明，亚洲原油的生产和出口将无法赶上日本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在这个10年内，日本对来自波斯湾——基本上是被美国控制的一个地区——进口的依赖将极大地增加，日本对稳定和正常的国际条件的不牢靠的依赖性同样也将极大地增加。

日本目前的政界和实业界上层人士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很清醒的历史头脑，他们都知道，日本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发展巨大的军事能力来摆脱对外的依赖性。总的来说，日本人已审慎地抵制了美国要日本加强军事作用的不对头的鼓

励。但是，即便顶不住而退让，日本不得不在其巨大的国民生产总值和特别是它的技术技能基础上，实施其军事能力的政治上的重大扩展，而这样做也未必使日本增强了它的全球政治影响力。的确，对于日本来说其后果甚至是很消极的。

这里还有一个有力的理由。与欧洲不同，那里的德国的重新武装是覆盖在北约组织之内的（德国陆军甚至没有自己的总参谋部），并且还被欧洲的经济和日益增强的政治一体化所抵销，一个军事上强大的日本则在亚洲将是独一无二的。这必然引起历史的宿怨旧恨。它可能使日归本的对外投资处于危险境地并损害日本的贸易。它可能促使形成反日联盟，并几乎确定无疑地引起朝鲜和中国　　最终甚至于美国——的强烈的敌对情绪，尽管美国曾出过力打消日本最初对重新武装的顾虑。

一个军事上强大的日本将很快成为一个孤立无援的日本。实质上，这就不可能使日本的力量转变成日本的领导地位。而美国的军事力量　　的确，甚至连海外的军事存在——曾一度被欧洲人、韩国人还有日本人自己所热烈盼望。但是，很难想象，在亚洲或其他地区有哪一个国家会欢迎单独的日本军事力量的崛起。严酷的现实是，日本通过军事化只可能成为一个有破坏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超级大国。

日本凭借武力而孤立地雄踞世界上，转过来也会使它本身容易遭到对其内在经济力量的损害，因为它的经济力量是来源于并取决于持续不断和日益增长的国际合作。实

际上,追求真正的广泛的军事力量(不只是略为增强日本的已引人注目但仍属必要的防御部队)无异于破坏这一潜在的全球政治大国的广泛的经济基础。即便在经济领域中,这也将是一项自杀的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密切注视着日本日益强大的敏锐的中国观察家们认为,美日关系的最终破裂是不会发生的。对于中国的政策计划人员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而他们的评估理应受到重视。尽管中国的战略分析人员盼望日、美和欧共体之间的摩擦加大,但他们的结论(根据北京国际战略研究学会 1991 年 3 月第 1 期的报道)是,"美国和日本将不会相互成为敌人",因为日益增长的美日相互依赖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增长对日本的力量起着内在的制约作用。

现实主义的日本领导人承认这些制约因素。他们越来越多地要求日本更加意识到有义务实施宏观经济政策,这类政策将缓和日本的结构性的消费不足,并从而减少一些目前的帐户盈余。他们还要求日本自行规定充当一个新颖的和真正有建设性的全球角色,尤其在发展领域。他们承认日本的命运与一个生气勃勃的——而不是衰弱的和愤愤不平的——美国休戚相关。因此,他们以一种较低调的方式来界定日本的目标,强调日本作为一个新的"非军事"国家的作用,与美国的关系密不可分,并实际上一心想扮演全球"副总统"的角色(一位日本领导人这么说的)。他们认为,靠拢美国,甚至可能采取与美国有某种含糊不清的全球伙伴

关系——而不是对美国的领导地位直接挑战——乃是对日本的蒸蒸日上的世界地位之最佳保证。

无疑，这种伙伴关系将面临持续不断的内部的阻力，但是，它很可能仍将会持续不断地形成。美日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的现实，正开始为两国的政治精英在思想上普遍承认和两国的经济精英在实践中普遍重视。的确，日本最终参加北美国自由贸易区比发生美日迎头冲撞更有可能。最后，横跨太平洋的美日合作共同体（我曾在别处称之为"Amerippon"[①]）甚至可能会出现。在这个过程中固的默认表明，日本悍然向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挑战很可能使日本的幻想破灭，而不是促成日本来取代美国。

欧洲的情况又怎样呢？作为另一个世界领导地位的争夺者的欧洲来说，它的长处弥补了日本的短处。因此，它可能更适于利用它的经济潜力来提供令全球向往的社会启示和寻求全球性的军事力量。它拥有文化和语言的能力可使它本身在越来越有机的全球政治进程中，成为举足轻重的又起催化作用的参与者。它在国家的基础上已拥有可观的军事力量。此外，建立共同的军事组织对欧洲来说，也不会造成像日本试图大力扩展军事力量所必然带来的不利的政治和经济的后果。

再则，欧洲像日本一样，拥有在经济—金融力量方面敢

---

① 作者杜撰的组合词"America—Nippon（美国和日本）的缩合形式。——译注

与美国匹敌和超过美国的潜在能力，实际上欧洲的世界贸易额已经达到了这点。像日本人一样，欧洲的储蓄率也比美国高得多。无疑，欧洲的技术也是具有竞争力的。上文提到的日本人的调查材料认为，欧洲公司在评估的 110 项关键性技术中有 34 项占领先地位。然而，欧洲不像日本那样地依靠外部世界——欧洲拥有较大一片的领土，能进行更多的内部贸易交往，和能较安全地利用自然资源。最后，像日本的情况一样，欧洲共同经历了一段使它本身以充满使命感为特色的历史，因此，它具有力图富强伟大的意志。

欧洲渴望向世界传达的信息——当然，取决于欧洲的进一步发展和统一——可能是推行去掉最差部分的美国生活方式的最佳方面。欧洲西北地区的生活标准至少不亚于美国，并且没有受到城市衰败的困扰。就连它的人种和种族矛盾也没有美国面临的困境的范围那么大。在欧洲的这部分地区实际上不存在城市贫民窟。例如，仅 5%的德国儿童生活在贫困中，而在美国则有 22%以上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

此外，西欧在制订妥善的社会政策方面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这项政策既不窒息有创造性的私人企业，又确保个人享有超过最低限度需要的相对稳固的生活标准。至少，在德国、斯堪的纳维亚、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法国，它们的医疗保健、产妇津贴、社会养老金、照常领取工资的假期、失业补助——此外，还有有效的初等和中等教育制度——都超过了美国的模式。最后而又重要的一点是，犯罪的程度和

毒品流行的规模都较低和较小。

以上情况为论证欧洲在可预见的将来可能成为全球社会的起催化作用的"国家"奠定了基础。的确，它的丰富的哲学和艺术传统可能有助于向美国大众文化——对该文化，欧洲青年很容易接受——注入较多的知识内容，从而多少冲淡了美国大众文化的粗野庸俗性。还有，对于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来说，欧洲学术中心——尤其是英法——仍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即便目前美国的研究生院被认为是全球杰出的学院。

欧洲的文化多样性又是一笔财富。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曾经受过法语、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或德语的影响，并且至今仍沿用这些语言。欧洲一旦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采用三语言制，它将会向美国在目前全球性谈论中所占的主导地位进行挑战，而且无疑它不会有日本在积极参与全球政治或学识对话时所面临的困难。

尽管宗教对欧洲文化的控制已大大减弱，而且目前欧洲基本上是——甚至比美国更加是——一个世俗社会，但共同的基督教传统的影响仍然存在。它给欧洲提供了一个共同的道德制度的基础，并同时给欧洲文化注入一种普遍的哲学意义。天主教会教皇的所在地加强了这种条件，建立了与在拉美、非洲和亚洲的数亿基督教徒的特殊关系。与日本不同，欧洲从来是彻头彻尾的普救论而不是排他主义的发祥地。

欧洲的民族还素来有着渊源极深的宏图大志。从历史

上看，它表现为先是探险家后是帝国缔造者的大力地向外扩张；而更可悲地表现在最终导致欧洲在20世纪的政治自杀的欧洲人的阋墙之争中。在近期历史上，这种宏图大志则具有分别由法国和德国雄心勃勃地表现出的欧洲特点。戴高乐可能是力图发扬民族伟大传统的最有力的雄辩家，他执着地认为，在这个历史世纪中，只有通过共同的欧洲事业和建立延伸至乌拉尔的共同的欧洲家园——即便仍由法国领导——才能达到真正的伟大目标。

欧洲统一的主要势头来源于植根在这一共同抱负中普遍存在的奋发情绪。人们觉悟到，一个统一的欧洲不仅可免受相互间具有破坏性的民族冲突的干扰，而且它还可以自动地成为一个卓越的世界级的超级大国。对于很多德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特别是政治上层人士——来说，这一前景仍具有来源于深刻地内在化的民族抱负的强有力的吸引力。昔日辉煌的历史和甚至尚未实现的民族志向的历史都是一个重要的动力的源泉，以便建立一个单一的和最终成为强有力的欧洲。

政治上统一的欧洲必须具有军事实力。尽管美国反对在北约组织之外成立欧洲的军事部队，但是，欧洲的政治统一几乎不可避免地迫使欧洲对其武装部队实现某种一体化。法德联合军团很可能作为核心，而法英核部队则已经给予欧洲以可观的核威慑力量。1992年达成的协议，计划和大量削减美、俄核武器投送系统和核弹头，并要在下一个10年中加以实现，这将进一步加强欧洲军事力量的相对的

战略意义。

与日本的情况不同，潜在的事态发展既不会使欧洲陷于政治孤立的险境，也不会产生负面的经济后果。恰恰相反，很多人认为，欧洲的统一和欧洲形成共同的防御力量乃是防止传统的欧洲战事死灰复燃的最好保证。在这一较广阔的欧洲大陆的背景下，德国的力量将被提升至崇高地位，从而最终避免本世纪内德国崛起为欧洲唯一最强大的民族国家时所带给欧洲力量均势的那样的挑战。因此，一个军事上自立的欧洲将被认为是加强全球的稳定性，而不是对全球稳定性的威胁。

最后，欧洲显然有能力与美国的经济力量相匹敌，甚至超过它。由于有较大数量的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由于内部市场大于美国的内部市场和全球贸易额也大于美国的全球贸易额，以及欧洲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已经超过美国，因此，一个统一的欧洲必然非美国，也非日本能与之伯仲。它还将是一个咄咄逼人的竞争者。欧洲对日本经济挑战的反应——尽管不像美国人在政治上那样的吵吵嚷嚷——已表明欧洲不仅下定决心进行竞争，而且要对歧视性的做法采取强硬手段。不论是成为"堡垒式的欧洲"——限制全球自由贸易——还是更可能地成为比较公开和有高度竞争性的单一市场，欧洲的经济潜力可以作为扩展军事力量、施加文化影响和发挥全球政治作用的基础。

这一潜力已经使欧洲对欧美关系的看法发生了某些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由两本先后相隔 15 年出版的

欧洲畅销书的内容所披露的。第一本书由让—雅克·塞尔旺－舒雷贝撰写，原书名是《美国的挑战》(1975)。它谈到一个由美国支配的世界，欧洲充其量处于配角地位，无法与拥有全球市场的美国公司的日益扩大的控制进行竞争，或与之抗衡。新近出版的第二本书的作者是雅克·阿塔利，书名是《地平线》(1991)。它发出了迥然不同的信息：对美国的所谓衰落，额手称贺；同时预言一个超过美、日并作为全球神经中枢和触媒剂的欧洲行将问世。

这个新近的同样是极端的预断有多少正确性？欧洲实际上又有多少可能性将以美国衣钵的成功继承者的面貌出现呢？前面不厌其烦地论述的整个情况都取决于或落脚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和非常重要的——但很难确定的——假设之上：即欧洲将超越经济统一走向政治统一，并在这一过程中取得重大的军事实力。因此，迄今所提出的论点的基本看法是，欧洲拥有比日本大得多的潜力而崛起成为美国的对手——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欧洲确实能做到这一点。

实际上，欧洲在不久的将来不大可能达成真正的政治统一，并从而具有明确的军事特征。尽管统一的过程不会完全停顿下来——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更不会倒退逆转——但最可能的趋势是，持续的而又十分困难的一体化，在进展的各阶段中不时遭到大的挫折。困难的日积月累，使得欧洲不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崛起为觊觎美国的特殊全球地位的政治上统一的挑战者。最终它有可能，但不久的将来肯定不可能。

作为这一确定的预断是有几条理由的。其一，有各种内部和外部的困难妨碍着真正的政治统一；其二，界定欧洲的实际范围时，有着越来越困难的安全问题；其三，在核心的欧洲国家内部的某些国内趋势对欧洲的全球影响产生了负面效应。

尽管欧洲致力于统一的目标，但该统一的本质定义和地理范围仍是争论的中心问题。欧共体在 1992 年的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上已缔结条约，要在这个 10 年内成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欧洲联盟；规定到 1997 年（至迟到 1999 年）实行单一货币和在 1993 年形成一个单一的市场。然而这一切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该过程中，要在欧洲各国选民持续和明确的支持的基础上，逐步解决复杂的金融和经济以及政治问题。实质上，它涉及到通过复杂的谈判（随后要得到国家的政治批准）一步一步地克服困难。

鉴于恢复中的欧洲的目前政治和体制的现实情况，除该必要的过程外别无他法。靠一个受到两次大战破坏的欧洲和依靠美国的决策，或许本可以在早些时候一跃而达成统一。但那已不再是一种选择方案了。而一个复杂过程的内在含意是，基本的战略分歧必将反复出现，甚至以前解决了的问题也经常会旧话重提，再开争端。在一个欧洲国家的选民作出消极反应之后，可能接着来的是另一个欧洲国家选民的积极反应，然后接着是再一次的消极反应，依次类推。因此，马斯特里赫特会议上制定的时间表失去时效，并不足怪。

结果，欧洲一体化要达到多大深度的问题将与欧洲统一要达到多大广度的合乎历史时宜的问题，发生经常性的矛盾。苏联集团的崩溃已把这个问题提到欧洲的议事日程上。不仅在有关欧洲自由贸易区国家方面，而且在有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或其两个接替国家）的共产主义后的三角地带，这个问题都不再能够回避。这些中欧国家将竭力要求充当成员国，借此解救它们国内的困难。

结果是下世纪初叶欧洲的两个大概念之间的矛盾：第一个概念指，经济上一体化的欧共体即将成为欧洲联盟，并将欧洲自由贸易区国家扩大进来，而在本 10 年内中欧三角地带只能有候补资格。第二个概念指一个大得多的欧洲，甚至在本 10 年内包括欧洲自由贸易区国家和中欧各国。前者可能在政治上更有凝聚力，并从而更适于扩建一支真正的军事部队（以法德联合军团为基础）；后者则必然会对政治凝聚力有所冲淡（英国之所以强烈赞同这个概念，道理就在于此）。

在前一个概念中，德国很可能是被牢牢地拴住；而在后一个概念中，德国很可能更无拘无束地玩弄它自己的国家政策，或许作为美国的主要的欧洲大陆的伙伴，但可能不排除有达成某种德俄协议的最终可能性。在前一概念中，政治领导很可能通过持续的法德伙伴关系来实施；而在后一概念中，英美可能更适于施加微妙的影响。

这些难题将继续不断地重新出现，促成主要欧洲国家之间的经常性的矛盾冲突。此外，即便深度发展的过程继续

按直线进行，扩大广度的需要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非成员国将敲打欧共体的大门——将它们排除在外可能会引起政治上的动荡不安，在中欧尤其如此。因此，最终把深度和广度两者结合起来大概是无法避免的，从而自然使寻求政治统一的事业复杂化。

无论如何，寻求政治统一还必须克服各个欧洲民族认同感和具体的民族利益的残余抵抗。法国看来很愿意成为大欧洲的真正的一部分，从而将其有关主要政治问题的主权都从属于新的欧洲权威，但只有当法国领导（得到德国的默认和与之结成伙伴）政治上统一的欧洲时才能这样做。德国准备通过真正地并入欧洲来消除欧洲对其力量的恐惧，只要其他欧洲国家也全面地并入欧洲，并且在经济一金融问题上事实上承认德国的领导地位。英国准备成为较统一的欧洲的一部分，只要欧洲统一的程度不达到排除英国传统的回旋余地。这一余地因美国对欧洲的影响继续存在而得以扩大（英国的作用由于特殊的英美关系得到加强）。

这些具体的民族利益并非有内在的互不兼容性。然而，它们不仅使统一的进程复杂化，而且还不可避免地延缓了这一进程。为了真正的统一，欧洲必须要么达成高度的共识——要么由一个公认的具有清晰和卓越的历史眼光的领导人来领导。鉴于欧洲的民族多样性是根深蒂固的，前者必将历经长久的岁月，而后者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可能强加的。

在欧洲的国家里，法国对欧洲未来的政治上雄心勃勃的前景表达得最淋漓尽致。1963 年 12 月 31 日，戴高乐以

很多欧洲人为之折服的语气专门讲了下面这番话：

> 我们固然不要沉溺于脆弱的人所怀有的幻想之中，也不要对人类自由和尊严最后将在各处取胜丧失希望，我们必须展望这样一天，那时也许华沙、布拉格、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索非亚、贝尔格莱德、地拉那和莫斯科的仍然对被封锁的人民施行强制的共产主义极权制度，将逐渐发生能够同我们本身的转变相调和的演变。那时，在全欧洲面前就会出现同它的资源和能力相适应的前景。

但是，法国仍太力薄势单了——特别在德国重新统一之后——无法对其他欧洲人实施领导。此外，其他人——甚至德国人——都不准备接受法国对欧洲政治认同所下的定义，这种认同感必然促成反美的欧洲自主。相反，大多数欧洲人认为，与美国保持密切的和持续的关系，，尤其在安全方面的关系，那仍然是符合欧洲的基本利益的。这一认识必然妨碍接受强调欧洲自主的领导。

再则，寻求欧洲的统一目前还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新的——尽管是受人欢迎的——问题，对该问题欧洲再不能置之不理：欧洲究竟到哪里为止？前不久，谈到欧洲意味着指西欧而言，其余地区均在铁幕以东。今天，基本上有三个欧洲："第一欧洲"——统一中的西欧；"第二欧洲"——中欧国家，它们坚持在文化上与西欧有着同一传统，并急于尽快

与欧洲统一到一起;"第三欧洲"——前苏联的东欧国家,其中有些国家希望最终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对长期排斥在外的后果忧心忡忡。

只要举一些数字就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的范围有多大:目前现有的欧共体是由12个国家组成,有3.43亿人口。不久,5个欧洲自由贸易区国家很可能加盟,使一体化中的欧洲——"第一欧洲"——总人口增加到约3.7亿。但是,正在敲打"第一欧洲"大门的是"第二欧洲"的欧洲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还得再增加7 000万人。它的最终加入(并将自然增殖计算在内)将使欧洲扩大到约4.5亿人和27个国家——成为一个难于促成政治一体化的庞大而复杂的机体。

尽管欧洲设计师所面临的更直接的问题是,界定"第一欧洲"与"第二欧洲"之间的某种关系,而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估计在2000年前后——仍将拖延时日,这期间"第三欧洲"的命运问题也将提到议事日程上。这个欧洲包含巴尔干各国和苏联解体后的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约7 500万人口——再往东,包含俄罗斯本身及其1.5亿人口。毫无疑问,近乎可悲的事实是——不同于中欧,它很可能通过及早加入"第一欧洲"来克服它的内部问题——"第三欧洲",尤其俄国可能还有乌克兰将在今后的几十年里经受严重的内部危机。

显然,欧洲将不得不把它的外部界线划得更狭窄些,但是——不管地理上怎样界定——欧洲将在它的边缘地带面

临大的社会经济的，也可能是地缘政治的动荡不安。90年代初期的巴尔干危机——以及欧洲的进退两难而又带有病态的无能为力，对此束手无策——只不过是一种凶兆，预示着动乱和暴力可能席卷整个欧洲东部的边缘地带。俄国将给欧洲带来一个特别令人困惑的问题。不论内部演变成什么样子，俄国总是太大了——也太"欧亚"了——以至无法全面地并入欧洲。此外，不论统一的欧洲的东部边界要定在哪里，俄国的内部问题总会从那里扩散进欧洲。结果，焦虑不安可能污染欧洲的政治气氛，分化政治的凝聚力和必然加深对欧洲安全方面的恐惧疑虑。

这种不安全感因邻近的伊斯兰北非的人口和宗教的挑战而进一步加剧，这将有助于保持欧洲人对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的兴趣。而欧洲依靠美军的持续驻扎以维护安全的做法，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对走向真正的政治和军事统一的步伐产生抑制作用。这一事实正是美法在欧洲和北约组织的关系问题上经常处于紧张状态的根源。

然而，美国反对法国的构想，特别反对在法德联合军团基础上组建欧洲军事部队的想法，只有在假设美军无期限地驻扎在德国的情况下，才具有长远的意义。眼下，这一假设可能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人们还应当考虑到，德国公众的态度可能会有所改变。首先，俄国的军队计划在1994年撤离德国。随即德国对西方军队继续驻扎德国的态度可能发生戏剧性变化。几乎不可避免的是，极少有德国人会继续赞同德国成为其领土上有外国军队的唯一欧洲国家，因

此到那时，美国的存在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不合时代的事情。

所以，具有历史性的讽刺意义是，美国和法国实际上都在妨碍着欧洲的统一。美国害怕出现一个经济上"堡垒式的欧洲"，并对北约组织外形成一个军事上一体化的欧洲持强有力的保留态度。法国正确地坚持，欧洲的统一需要政治和军事的一体化，而这种一体化必须以法德之间的最密切的政治和军事联系为基础。但是，法国因坚持这样做就需要欧洲敢于反对美国，从而它又削弱和孤立了自己。转过来，美国正确地坚持，没有密切的横跨大西洋的政治联系，就不可能维持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安全关系；但是，美国因竭力反对（并暗中鼓励英国反对）寻求真正的欧洲的政治和军事认同的法德计划，而冒最终鼓励一种单独对德政策——特别是对俄国政策——的风险。

无论如何，对欧洲未来的讨论突出的要点是，在10年或20年内，欧洲不可能自行组织成一个能与美国的全球综合实力相匹敌的对手。法国的力量太弱不能领导欧洲，而德国又让其他欧洲国家害怕到了极点，不能被推举为领导者。因此，一个达成共识的一体化的欧洲必然是一个非常缓慢地团结起来的欧洲。不难看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欧洲将无法作为一个统一体在政治上发表意见或有所作为。

所以，前面所述有普遍影响的"起催化作用"的欧洲的观点不得不作重大的修改。现实的情况是，形成欧洲的政治态度和文化价值观念的传统情感，将继续妨碍具有全球意

义的有凝聚力和积极的欧洲作用的发挥，最重要的是，在欧洲政治的宽容大度的表层之下继续隐藏着某些阴魂不散的恶魔。在带领欧洲迈向统一的法国和德国，极端主义的潜在势力已经常地使人深有所感。激进的左右翼政党能获得大约 25%的法国选民的支持。在德国，这类公开的群众支持比较少，一般不超过 10%，但爆发反对外国人的暴力活动，尤其在重新统一之后，则越来越频繁，同时，排外情绪的流露已成蔓延之势。在前共产党国家里，民族主义的极端分子的势力甚至更为强大。因此，还不能预作结论说，激烈的欧洲民族主义的时代已告全面结束。

尽管在西欧不可否认会出现真正的超民族的欧洲意识，但政治上的紧张状况或经济挫折可能会助长衰落中的沙文主义卷土重来。这一潜在势力已在令人痛苦的移民问题上表现得很充分。甚至历来对外国定居者敞开大门和带有强烈的民族同化主义文化色彩的法国，面对东欧人和北非人寻求社会经济庇护的人数日益增多——这已促使有沙文主义倾向的民族阵线得势——采取了断然拒绝的态度。同样德国公众对难民的大量流入表现出日益高涨的愤慨情绪。在 1992 年的一次德国民意测验(1992 年 4 月 28 日由《明镜周刊》主办)中表明，减少外国人流入数量已成为头号政治问题。而在欧洲的其他地方都普遍有着同样的情绪。

这并不是说，欧洲正滑向大规模的不宽容。总的看来，民主制度和程序在西欧是稳固的。极端分子的民族主义是少数人的现象——与前不久的过去不同，它总是防御性而

不是进攻性的。它的目标是保卫传统的民族观念，而不是力图——如前不久那样——扩张领土。甚至在因两次世界大战失败而领土丧失得最惨重的德国，它的民族主义也不热中于边界问题——或许部分原因是，到 2000 年，大多数德国人可能年过 50 岁而且生活富裕，而在 1900 年，大多数德国人不到 25 岁，并且生活贫困。

不过，由于新近地区狭隘思想的迸发逐步取代欧洲的历史性的普救论，欧洲在文化上和哲学上对世界的一般影响力受到了限制。这种普救论在其政治表现上带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色彩，而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在其道德—文化表现上则带有好斗的基督教的色彩。但是，随着很多人越来越对基督教义感到厌烦和认为它是讲究仪式的过时现象，一种现世的和主要是享乐主义的大众文化——很多方面仿效美国——正取代以前欧洲自我界定为所谓的普遍真理的有力传播者和劝诱改宗者的思想。

今天，大多数的欧洲人都热中于追求很像美国消费主义道德标准所界定的那种优裕的生活。这种思潮表现为政治上支持有选择的保护主义的贸易壁垒，并得到一个经济上实行家长式统治的国家的加强，而且越来越缺少任何深刻的哲学内涵。即便欧洲通过经济统一获得了再次成为一个全球重要角色的能力，它的新的神庙却是超级市场和迪尼斯乐园，以及它给世界的启示是越来越只向内看，寻求自我满足。没有精神境界和缺少哲学内涵，这样的欧洲充其量只能是美国的应声虫罢了。

不足为怪，生活在一个无力宣告本身价值观念的欧洲，必然有深感空虚和孤独之虞。这里不妨提及一位印度人类学家对一个丹麦村庄所作的一份尚未公布的调查报告（消息见1992年1月1日《经济学家》周刊），其中的一些要点颇具重要意义。该报告的结论为，农业的丹麦的社会生活越来越明显的特点——尽管它的物质很丰富——是，缺少深厚的个人关系和精神上的远虑，以及普遍存在的孤独感——这些情况未必能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吸引力。社会学家们还注意到，在欧洲其他地方，弥漫各处的空虚感和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会使厌恶政治的情绪处于潜在的易燃状态。

敏锐的德国问题的观察家西奥·萨默提出了类似的见解（见1992年5月12日《时代》周报）："由于德国的经济增长局限在一个不大的幅度内，个人集团的利己主义正成蔓延之势。统一的代价是更加助长了自私自利。"德国纳税人对因解放东德同胞和与之实施社会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财政负担表示不满，证实了他的观点。这反映了新的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是个人幸福，而把曾经是神圣的为民族统一大业共同出力的爱国心抛得一干二净。德国公众为它自己的民族都不愿意作出牺牲，那就不大可能指望他们还会为更远的全球社会进行自我克制。

德国人的自私自利无疑决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西欧各国普遍不愿意向贫困的和在痛苦中挣扎的共产主义后的中欧国家打开欧共体的市场，就是充分的佐证。尽管侈谈

建立一个共同的欧洲，西欧国家对它们的新近解放的中欧兄弟始终是十分吝啬的。它们一直不愿意向中欧的出口商品——对中欧的经济恢复必不可缺——敞开大门，和坚持维护歧视性的贸易限制。除了德国帮助前东德外，西欧国家对中欧和东欧和援助也是十分有限的；相比之下，西欧国家对它们本国农民的贴补竟多达10倍(约500亿美元)！

欧洲对前南斯拉夫的流血冲突未能采取坚定的对策，同样也反映了目前在欧洲国家思想里充满着地域狭隘观念和自私自利。多民族国家的分崩离析最残酷地引爆了自1945年以来的欧洲境内的持续的暴力冲突。但是，与冷战年月里的某些局部战争不同，它没有升级到超级大国之间发生国际冲突的危险。而对野蛮的“种族清洗”采取强硬对策是需要冒一定风险的。但是，欧洲却采取了一种军事上冒失鲁莽、政治上消极被动和对社会冷漠无情的姿态。它的束手无策引人注目地说明，欧洲在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支真正的具有建设性的政治力量之前，还必须走过多么漫长的道路。而且还令人痛苦地想起，至少有某些欧洲历史上的恶魔仍然未得到控制。

不过，尽管在欧洲边缘地带发生种族暴力冲突和在一些欧洲国家里极端分子的沙文主义表现经常流露，正在出现的新欧洲仍将是一个比不久以前的欧洲较为平安无事些，承认这一点是重要的。它还可能是一个较少空想社会制度彻底变革的欧洲——很大程度上，因为它在近期历史上吃过乌托邦式超凡神话的苦头。但是，除此而外，它还可能

是一个具有内向的地域狭隘主义特点的欧洲，蹒跚地走向它那捉摸不定的欧洲统一的目标。

在新兴的全球政治进程中，这样的欧洲比不上作为全球社会缩影的美国所起的决定作用的。毫无疑问，拥有大陆共同市场的欧洲将是一个经济巨人，在这方面，它将与美国或日本平起平坐。但是，在欧洲获得政治上的认同，并使它的统一设想充满雄心勃勃的和对全球具有吸引力的内容之前，欧洲仍将是群龙无首和缺乏生气的。

因此，下这样的结论是合理的：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作为新的全球政治进程中的神经中枢和时尚创始地，无论布鲁塞尔或东京都将无法与纽约市或洛杉矶一比高低。在这方面和在综合实力方面，美国还没有真正的对手。但是，欧洲和日本都可能没有资格实施全球领导并不是必然保证美国能继续实施这一领导。

相反，它意味着，除去美国的领导唯一的另一选择是全球的无政府状态，而对美国的特别的全球角色的真正挑战越来越多地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实际上，美国的主要薄弱部位可能不是被其对手的有形挑战所突破，而是被它自己文化形成的无形威胁所突破，因为这种文化在国内越来越削弱、涣散、分化美国的力量乃至使其瘫痪，同时又引诱和腐蚀外部世界乃至使其异化和革命化。

诚然，美国的综合性的全球力量仍然是——并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仍将是——举世无双的。美国生活方式的基本的物质引诱力也将是举世无双的。但是，与 19 世纪雄踞于

变革缓慢、基本上是等级制的和政治上消极被动的世界之颠的英国不同，美国的力量是从上强加到一个世界之上的，它极似一座被压抑的志向和对根本的不平日益醒悟的激情行将爆发的火山。尽管对于世界来说，美国目前不会没有个性也不会沉默无声，但是，美国长期驾驭这个逐步消除其潜在的爆炸性因素的世界的能力，将主要取决于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变这种印象，即它本身的社会正逐渐丧失进行负责的自我控制所必须的道德和伦理准则。





我们时代的决定性的事态发展是，西方在旷日持久的长达40年的冷战中获得了胜利。美国对俄国的胜利使两极争夺世界政治统治的格局宣告结束。但是，尽管目前美国是举世无双的，也没有一个对手能够取代它的综合实力，但是，美国的国内难题却抑制了美国力量的实际影响范围，并阻碍了把该力量转变为公认的全球权威。

因此，美国成不了全球警察，也当不成全球银行家，甚至连全球道德家也做不成。因为第一种人需要名正言顺的合法性；第二种人的根基是拥有偿债能力；而第三种人则需自身清白。然而，尽管有这些局限性，美国社会制度的创新的——即便哲学上令人困恼的——特性使美国成为全球变革的触媒剂。美国的力量使美国在国际上持保守态度，因为美国的利益与全球稳定休戚相关；而美国的影响作用却使美国打乱全球的事态，这是因为美国价值观念破坏稳定性的后果。这一令人不安的——诚然，相互矛盾的——结合给美国加上了特别的负担：它必须设法促进国际间的合作作为世界秩序的稳定框架的基础，与此同时，它还必须接受某种逐步调整全球力量和财富分配的现实乃至这种调整的必然性。这样，美国必须既是稳定的捍卫者，而且还必须是变革的催化剂。

美国所面临的最终的困局与联合国所面临的困局恰恰相反：联合国越来越取得全球的权威，但它缺乏有效的全球

力量。它的成员国象征着全球的变革——特别集中体现在不断变动的全球版图划分——但它的结构一成不变，与力量的实际情况毫无关系。此外，它在较近期内之所以能在国际维持和平活动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正是冷战结束的直接后果。俄国和中国都不愿否决联合国主持的集体行动——1991 年的波斯湾战争和有关 1992 年南斯拉夫解体后的危机，可资佐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不想与目前美国的突出地位抗争。一旦它们改变这种态度，联合国就会因否决权的行使而迅速地再度陷于瘫痪状态。

诚然，解决全球无政府状态的唯一的长期办法是采取某种形式的全球邦联制。就描述可能逐步出现的新情况而言，"全球邦联"的说法可能会比"世界政府"的说法更好些，如果新的全球政治进程采取越来越合作的方式的话。一个单一的世界政府的观念不仅在一些人中间产生了强烈的负面反应，这些人担心这个"政府"将剥夺目前民族国家的主权，还将导致政治上不成熟的多数国家的不宽容的统治；而且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使人产生误解的说法，因为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一个单一的"世界政府"是不会出现的。目前的民族国家是活生生的实体，它们十分小心地维护着民族独立性，还有它们的主权，而其中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富裕的、先进的和强大的国家——都将不会把它们自己置于某种超国家的机构的控制之下。

然而，全球政治进程——假设制造混乱的势力没有统治世界舞台——正逐步促成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加深的合

作。这种合作必然采取，并正采取种种组织形式，表现为职能性的（如各种多边组织）和共同合作性的国际机构的数量增多和权力增大，以及联合国安理会成为决策权越来越大的政治机关。其结果是形成一张逐步体现国际间相互依存实况的网。更有甚者，这张网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它包含着各种机构行使的权力范围的逐步扩大，一步一步地促成实际上是全世界范围的雏型的邦联政府结构的问世。

不过，即便环境条件再好，全球政治进程转变为真正的政治上行之有效的邦联形式，将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且还很可能不时遭到大的挫折。与此同时，目前的联合国安理会——最重要的全球政治机构——因其组成不再能反映出全球力量目前的现实情况而备受掣肘。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联合国不大可能会进行改组以便更准确地反映出这种现实情况。尽管日本可能跻身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即具有行使否决权的权利）的事谈得很多，但是，任何企图为了日本来修改联合国宪章，就会对其他可能同样认为有权获得该特别席位的申请国敞开大门：令人立刻想到的国家是德国、印度、巴西和尼日利亚。它们加入有否决权的俱乐部后，不仅会削弱目前常任理事国的影响力和特殊地位，而且还会可能使实际投否决票的数目增多。

因此，不论是美国还是联合国都不会很快地能够既具备有效的力量，又享有全球公认的合法权威。美国将继续拥有权力，但它的政治和道德权威大概会被很大一部分的人类所反对；而联合国即便必然会提高它的政治和道德权威，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缺少所需的力量。与此同时，对维护目前国家利益而同时允许改善全球大多数贫困者命运的和平变革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将继续受到经常爆发的政治暴力事件和深重的社会灾难的阻挠。有把握的假设是，全球政治觉醒的动态，持续的并在某些地方曾使大部分人类历经苦难的社会经济危机甚至还在日益加深，和在当代历史的乌托邦后时期内必然产生的哲学上的混乱，在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预示着一个历史上安宁的时期行将来临。

对全球秩序的最终的主要挑战将同时包含着地缘政治、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特别关系到苏联崩溃的地缘政治后果，全球力量分布的最终变化和地区冲突的可能性扩大。第二个方面主要涉及共产主义垮台后转变的危机，而这种转变实际上已成为现代自由民主是否具有实用性的试例。第三个方面则关乎这样的可能性，即新的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权力争夺将会发生，特别是因为全球的不平等状况变得越来越无法容忍和寻求一种切实可行的社会模式越发令人绝望。

第一章

地缘政治上的真空

苏联的分崩离析使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变为一种地缘政治上的真空状态。一度是一个强大帝国的所在地和全球意识形态挑战的中心，那一大片技术先进的西方和欧亚大陆东端之间的空间现在已成了当代历史上的黑洞：它的近期的未来和它不久以前的过去同样是处于争议之中的。从近期看，这一情况消除了苏联曾经对其富裕的邻国所形成的安全威胁。但从长远看，这一情况可能是大的和新的政治危险的根源。

苏联的崩溃代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重大转折——这一点上文已经提及。但是，它还标志着一桩更具有历史重要意义的事件：存在了300多年的俄罗斯帝国从此寿终正寝。这个帝国曾统治过世界的较大一片的不动产，而且它的地理位置——处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意味着，它的影响和力量能对该大陆的西、东、南端投上阴影。转过来，位于这些顶端地区的国家所作的抵抗——近年来，

美国也积极地卷了进去——界定了随之而来的国际争夺的重要的地缘战略战线。

俄罗斯帝国的消失—假设它不会东山再起（对这问题容后详述）——使地缘政治的挑战随之结束。在西面，它意味着中欧通过加入欧洲经济和政治统一的进程，逐步设法实现在文化上与西欧打成一片。的确，前帝国的某些地区，特别是波罗的海共和国，以及甚至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大概都会有同样的强烈要求。在远东，帝国的终结也使朝鲜、日本和中国解除了俄国重兵压境所带来的焦虑不安。在南面，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突然发现它们受到一系列新的缓冲国的掩护，这使阻挡俄国一心想南下寻求暖水港企图的屏障得到了加强。

在地缘战略上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地处心脏地带的帝国的崩溃意味着，它40年来煞费苦心地把美国逐出欧亚大陆的努力已功亏一篑。美国不再面临这样的战略挑战，如果该挑战得逞，美国就可能面对着被一个敌对帝国所席卷的整个欧亚大陆。显然，将美国逐回大西洋和太平洋彼岸是斯大林的冷战时期的战略目标，他的这一目标和希特勒的目标相同（1940年后期，纳粹和苏联有关当时预料轴心国在二次大战中获胜后可能划分战果的秘密谈判中所披露的情况，证明了这点）。由于苏联在冷战中失败和随后的解体，美国目前第一次能够把它的政治势力扩展到新的苏联解体后的欧亚大陆的共和国，一直到中国的边疆和主宰位于欧亚大陆南侧的波斯湾地区。

但是，帝国消失之后的情况不大可能是平静安宁的。俄罗斯帝国与英、法帝国的情况不同，后者的本土与它们的殖民地之间都有海洋明确地划界，而前者是一片陆块，无论在历史上或地理上都没有准确划定的边界。该帝国数百年来逐步的扩展和共产党政权所领导的城市一工业革命，促成俄罗斯人大规模地定居在非俄罗斯土地上，结果，有2500多万俄罗斯人生活在他们传统的种族家园之外的他乡异地。工业化和共产党强制的重新定居也使大约4000万名非俄罗斯人离开他们的民族家园客居他乡。这种种族混合的情况已引起了日益增多的摩擦、敌对情绪和流血事件。

除了大规模的杀戮外，人们还不得不预料到为数达数百万人的移民。生活在异地和民族主义环境里的2500万名俄罗斯人和4000万名非俄罗斯人，都是进行“种族清洗”的政治压力的潜在的受害者。他们的迁移将使有关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受到更大的压力，而且移民还可能会波及中欧，甚至更西面。

几乎每一个苏联解体后的共和国大概都受到了不利的影响。1992年，在高加索地区早已爆发了暴力冲突，它实际上涉及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一场有限而又持续的地面战斗，和格鲁吉亚内部以及格鲁吉亚与奥塞梯之间的，还有车臣一印古什地区内的零星战斗。在摩尔多瓦的操罗马尼亚语和操俄语的居民之间还发生了持续的战斗，而且俄国（前苏联）军队的成员直接卷入战斗。在中亚细亚也发

生了危害极大的种族暴乱，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还有俄罗斯的定居者都卷了进去。数量众多的俄罗斯殖民者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存在，也必然成为这些国家与莫斯科关系方面出现重大紧张局势的一个根源。

可以预期这些问题还会恶化。如果新独立的乌克兰的社会经济困难加剧，主要聚居在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的重要工业地区的大量的为数约（5 200 万乌克兰人口中的）1 000 万人的俄罗斯少数民族，可能会公然表示不满。这样一来，克里姆林就憋不住要对乌克兰施加压力，首先是使这部分少数民族取得特别地位，其次甚至可能因它的困境搞得乌克兰的国家地位动摇不定。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严重的冲撞是必然无疑的。

在新近解放的中亚细亚穆斯林国家中也潜伏着发生重大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它可能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与在该地区内占有较好的工作岗位和住房的俄罗斯定居者的摩擦日益增多，越来越公开地甚至采取暴力手段驱赶他们，已不可避免。这很可能遭到莫斯科的反对，并且像早些时候在摩尔多瓦所做的那样，在一定时候会动用俄国军队。甚至对俄国采取最和解姿态的和其民族人口与俄罗斯人一样多的哈萨克斯坦，很可能在较近的将来经历激烈的种族敌对冲突，包括针对非本地人的日益增多的暴力行动。对于生活在中亚地区的 900 万俄罗斯人来说，其前途看来是暗淡的。

另一个既可能又是潜在的更大爆炸性的重点是，新近

解放的中亚各国之间爆发种族和边界冲突的可能性。它们的边界是由苏联人很武断地划定的。不少地方，边界的划分既缺少历史依据，也没有种族的依据。由于新的政治上层分子自以为是，和新近解放的民族主义分子对解放喜不自胜，他们之间的领土和种族冲突很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残酷。1991年和1992年爆发的几起极端野蛮的种族暴力事件预示着，地区性敌对行动日益加剧的可能性，从而使中亚地区在政治上极不稳定。

既然存在的本性难容真空，显而易见，境外的国家特别是邻近的伊斯兰国家，很可能力图填补因俄罗斯帝国势力消失而在中亚所造成的地缘政治真空。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已跃跃欲试，以便扩大它们的影响，而较远的沙特阿拉伯一直在资助重振该地区的穆斯林文化和宗教传统的重大活动。因此，伊斯兰教正向北推进，把过去两个世纪来的地缘政治的势头倒了一个个儿。

从地缘政治的观点来看，俄国对这些事态发展的长期反应对未来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种反应将确定俄国是否成为一个真正的帝国后的国家，还是逐步进行持续的努力使帝国死灰复燃。作出抉择将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任何一种抉择的后果都将是痛苦的。放弃帝国野心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奥斯曼帝国衰落后的土耳其的经历相比（奥斯曼帝国在很多方面更像俄罗斯帝国而非拥有海外殖民地的英帝国）——就必须采取一项极端冷酷的政策，置生活在真正的俄罗斯种族家园领域之外的数百万俄

罗斯人的命运于不顾。俄罗斯能否表现出宽容大度是大成问题的，特别是因为在苏联共产主义垮台后俄罗斯民族主义本身以新的激情再度迸发。

此外，人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即一个摒弃帝国野心的民主的俄国本身可能很容易进一步分化。鉴于跨欧亚大陆的经济和社会情况差异极大，民主的俄国不得不实施高度的权力分散。这样，要求自治的压力就可能增强：西伯利亚远东地区越来越取向于日本、韩国还有中国的经济奇迹；同样，圣彼得堡地区可能会被吸引到波罗的海彼岸的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方面去。非俄罗斯民族的分离主义一旦得逞就可能促使上述地区内的一些俄罗斯人考虑：为什么不可以像不止一个操德语或操英语国家那样，成立一个以上或两个操俄语的国家呢?很多人可能振振有辞地说，这种做法或许是俄罗斯人民获得民主与繁荣的捷径。

因此，放弃帝国野心的必然结果是，出现地缘政治力量进一步分散的前景。使帝国东山再起——可能打出某种新的幌子或采取强制性不大的方式——对于很多俄罗斯人来说，之所以成为很具有吸引力的选择方案，道理就在于此。旨在保持旧的大俄罗斯帝国的大片外围地区的防御性战略实际上应运而生。人们从俄国不间断地致力于下列活动中，感觉到它怀有极大的企图，以保持沿前帝国外部边疆的战略要点：拖延俄国军队撤出波罗的海共和国；保留在(前东普鲁士的)加里宁格勒的一个强大的海军基地；保持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之间的德涅斯特河畔的一个俄罗斯

的飞地；加强俄国在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的军事存在；巩固在高加索地区的北奥塞梯的一个领地；为在中亚南部边疆组建俄罗斯—土库曼、俄罗斯—哈萨克、俄罗斯—塔吉克混编军事部队达成了特别协议，以及保持对远东千岛群岛南部的控制权（甚至不惜牺牲借此可以获得日本巨额贷款的机会）。这一意图可能不是正式筹划中的打算；它可能更多地是根深蒂固的帝国本能的一种反应。但是，无论如何，它奠定了这一企图的基础：一旦俄国恢复其内部的凝聚力和力量，最终使帝国东山再起。

然而，采取了这类政策也很可能引起严重的冲突，从而这样或那样地使前帝国腹地注定地进入一个动荡不安和暴力事件频仍的时期。主要的原因是，俄国要恢复帝国的任何企图——在情绪激昂的口号："我们必须保卫俄国境外数百万俄罗斯人"的引导下——很可能会遭到各地民族主义的严重抵抗；因为与此同时各地民族主义已经觉醒，而且它们要求独立的胃口已今非昔比。摧垮或者即便是破坏它们的抵抗决非易事，无疑，采取恢复帝国的政策不仅注定要使俄国再次成为独裁的国家，而且还会迫使俄国人民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日益扩大的和甚至可能是没完没了的冲突之中。因此，俄国将陷入不折不扣的无法摆脱的困境中。

苏联的崩溃不仅为美国的势力可能进入欧亚大陆真空（特别是通过致力于巩固新的非俄罗斯国家）打开缺口，而且还在欧亚大陆的西南边缘地带产生重大的地缘政治后

果：中东和波斯湾已转变为美国公开地和独一无二地占有优势的地区。这一情况具有历史上的独特性。在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期间，这个地区一直是大国激烈争夺的目标。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一再冲突，奥斯曼帝国和英国也一样地频繁交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英竞相争夺势力范围，而俄国则在后面虎视眈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引人注目地提出要占有波斯湾，但于1946年在美国的压力下撤出了伊朗。当阿拉伯国家转向莫斯科寻求援助反对以色列之际，苏联的军事和政治势力随即进入中东。直到苏联的力量分崩离析，特别是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之后，在现代史上第一次出现由单独一个外来国家行使独一无二的占优势的权力。

但是，这种权力优势可能仍是很表面的，甚至是脆弱的，主要因为美国和它的阿拉伯附庸国之间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念或政治文化或宗教的基本联系。美国的力量主要靠的是与当地政府结盟，而很多当地政府是以腐败的和暴发致富的阶级为基础的，它们越来越冒着脱离本国人民的风险。此外，伊朗显然是地区霸权的强烈追求者，它准备挫败美国。它具有帝国的传统，并怀有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动机，同美国和俄国在该地区的势力抗争。它可以依靠邻国的宗教同情心来这样干。由于宗教和民族主义凑在一起反对任何异族的地区霸权，目前美国在中东的优势是不折不扣地建立在沙滩之上的。

甚至连1991年海湾战争的异乎寻常的单方面的军事

胜利都没有取得相应的政治成果，这情况足以充分说明美国的地区控制能力的局限性。海湾战争后的情况是，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依然当政，而什叶派和库尔德族的叛乱——尽管美国鼓励他们——则被有效地镇压下去了。要获得一个政治上的胜利，其规模与军事胜利的规模相当，那可能不仅需要美国付出大得多的代价，而且还要打消阿拉伯盟国显然不愿意把战争推进到政治上决定性胜利的情绪。它们之所以不同意这样做，是因为害怕它们的人民，会因他们自己的政府在主要由美国发起的对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中与外国勾结，而变得桀傲不驯。

如果美国敦促解决阿以冲突的努力宣告失败，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敌对情绪也必然无疑会激化。往日当中东是两个相互竞争的超级大国的争夺目标时，美国支持以色列可以被认为是维护美国本身利益的一种必要的表现，和对犹太人民的一种道义责任的行为。但是，在如今由美国单方面占优势的时代，如果美国没能促成阿以冲突的和平结束，那很可能助长动员宗教的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激进运动起来反对继续存在的美国的地区优势。

因此，对于俄罗斯和美国来说，尽管情况不同，地缘政治真空都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漩涡。伊斯兰教的政治觉醒不仅会引发在北面与残余的俄罗斯帝国主义冲撞，而且还可能在南面与美国的统治抗争。前者因其定居者和必须抵挡南部穆斯林国家向中亚的入侵而决不甘休。而后者——尽管还要冒日益激烈的敌对情绪的风险——因其石油

利益和对以色列的道义责任感——也决不会就此罢手。

这个激烈动荡的漩涡的地理界线可在欧亚大陆的地图上划成一个长椭圆形。它从西向东，由亚得里亚海至巴尔干各国，一直到中国新疆地区的边界；由南向北，环绕波斯湾，包括中东部分，南面的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和北面的沿俄罗斯—哈萨克边界的全部中亚地区，一直到沿俄罗斯—乌克兰的边界。因此，这个长椭圆形包括东南欧部分、中东和波斯湾地区，除此之外，还有前苏联的南部地区。

这个地区由近 30 个国家组成，它们大多数都处于民族振兴的初期阶段。多数国家在政治上还不明朗。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在种族方面是单一的；在这些国家里，居住着大约 4 000 万人，在他们几十个种族集团和部族之间的内部倾轧——往往因语言、习俗，特别是宗教不同而分裂——已达白热化，在各民族日益提高的政治觉醒的推动下势必爆发日趋激烈的狂热行动。80 年代的黎巴嫩和 90 年代初的库尔德族，以及前南斯拉夫的悲剧都预示着，在这个酝酿着最大限度危险的欧亚大陆的长椭圆形地区内前途凶险。

因此，在全世界所有正在获得或大概不久就可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家中，多达一半的国家都位于该欧亚大陆的长椭圆形地区内，它不是一种巧合。(东亚正呈现出是另一个最热中于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地区。)专家们和情报分析人员估计——除了 5 个公认的核国家外——至

少还有4个国家已经具有核武器能力和投射核武器的弹道导弹。此外，拥有弹道导弹的国家数目已达15个左右。其中大多数国家还在继续推行进攻性的生化战争计划。预期该总数到2000年将至少翻一番。

目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已成为现实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作为全球大国缺乏相应的权威，而联合国有全球权威却缺少必要的力量，只有采取拖延行动才是可行的。1992年4月，27个国家所缔结的旨在限制出售适用于生产核武器的两用设备和物资的协定，正说明了这一点。有些潜在的核供应国家没有签字（特别是中国），而且尽管协定规定了全面审查约65种两用技术——因而在理论上讲可以抑制扩散——在实施中却完全凭自觉自愿。所以，大量逃避审查的现象几乎是肯定无疑的。

在这个有最大限度危险的长椭圆形地区内，暴力冲突可能会在由大量不同组合的多种多样的对立双方之间爆发。列出以下一长串的潜在冲突未免令人灰心丧气：它们可能发生在居住于该地区国家里的不同种族集团之间；或发生在俄罗斯和某个新的中亚国家中间，而后者可能得到南面的一个或多个穆斯林国家的支持；或发生在某些有不同的伊斯兰国家支持背景的新的中亚国家之间；或甚至发生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特别是如果乌克兰的内部经济问题在它的为数众多的俄罗斯少数民族中引起分裂主义的强烈要求的话；或在某些巴尔干国家之间，甚至可能包括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冲突；或在以色列和一个阿拉伯国家

之间；或在伊朗与某些波斯湾国家或美国之间；或在伊拉克和上述国家之间；或者，当然还会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人们也不能排除中国对中亚冲突（特别当冲突发生在靠近中国的地区时）和任何大的新的印巴冲突作某种卷入的可能性。

肯定不是详尽无遗的上述一览表表明了两大可能性：其一，在某一时候，可能会动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尤其当种族和宗教的激情卷入某些可能的冲突中的时候。其二，即便得知交战双方都拥有并且狂热到要动用这类武器，也可能无法通过某种形式的国际制裁来进行有效的制约。了解这些情况，对于热中于追求国际和平的民主和富有的公众来说，不啻服用一付清凉剂。

如果现有核“俱乐部”成员——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达成共识，一致反对任何想要动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者，那么，上述危险就可能缩小到最低限度。然而，有关在欧亚大陆的长椭圆形地区内最可能爆发的大规模战争方面，大概达不成这种共识。相反，可能会在五大国之间产生分歧异议，从而使安理会陷于瘫痪。在这种情况下，剩下的唯一的威慑力量将是美国下决心采取单方面的和大规模的行动，甚至可能事先向任何会主动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付别国的国家，作出断然行动的誓言。然而，美国国会愿意让美国承诺这种带有如此深远后果的广泛的和一揽子的义务，值得怀疑。国际社会是否会赞同美国充当这样一个特别的“警察”角色，也是无法确定的。

因此，毫无疑问，还是詹姆斯·斯莱辛格说得好，他在1992年初曾下结论说，“未来的世界秩序的特点……将是强权政治、民族对抗和种族关系紧张。”对此还可补充一点，即在某个时候，在世界地缘政治的激烈动荡的漩涡中可能会使用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①

---

① 在本书付印之际，我有机会阅读了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所写的题为《文化的冲突》的尚未出版——和非常引人入胜——的论文。他在该文中有力地论证了，沿着他所界定的伊斯兰教、儒教和基督教文化断层线所发生的冲突，将是对未来世界和平的重大威胁。本章所述“激烈动荡的长椭圆形地区”实际上论及亨廷顿的文化冲突的地理漩涡。另见第198页的下面一段（即本部分第二章末段所述可能的“中国—伊朗—俄罗斯”三边联盟）。——原注

译者按，此处所指在中译本第211页末段。

第二章

复仇的不死鸟

以上所述突出了维护有效的国际间团结的必要性，以便遏制全球不稳定的具有破坏性的势头。然而，有两大事态发展很可能会抑制国际间团结的形成，而作为有效的世界秩序的基础非有这种国际间的团结不可。其一，涉及共产主义后的过渡的前景，而这特别影响到俄罗斯的未来角色；其二，关乎全球不平等的困境，而这主要影响到中国的未来角色。

共产主义后的过渡目前影响到几亿人。进行过渡是大势所趋，但既缺少指导方针，又无范例模式可循。共产主义后的改革家实际上是在处女地上的拓荒者。没有任何当代经济学或比较政治学的重大研究材料，对如何从一个中央集权的、初期是革命的、后来腐败的极权制转变到以自由市场制为基础的多元民主制，作过任何系统性的分析或提出解救良策。正如一个聪明的观察家打过的比方那样：用鸡蛋做成煎蛋饼是有配方的，但要把煎蛋饼变成鸡蛋就没有配

方了。同样，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可以赖以制订顺利转变的全面和长期政策的实际模式——即没有任何重要历史经验可资借鉴。

诚然，不用多久，前东德大概会成为共产主义后顺利过渡的范例。可以预料，到1995年，以前分裂的德国的两个部分之间的工资水平将取得一致(自然是按西德的水平)，而到2000年，前东德的居民将享有与德国其他地区相同的生活标准。到那时候，东德很可能被称颂为成功的榜样。然而，在这方面，必须意识到一个重大的——的确，起关键的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前东德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民族和一种单独的经济，而是作为一个大得多的民族国家的一个地区，经历其本身的转变。它正被吸收到欧洲的最具有活力的经济之中，该经济实力雄厚，能够向人口仅1600万的前东德每年投入约1000亿美元——但是，即便如此，这番努力正遭到巨大的困难，并在这个前共产主义国家中引起日趋严重的社会紧张局势。

可以预期，对任何其他的前共产主义国家的资本投入是望尘莫及的。或许，中欧——特别是波兰或匈牙利——通过艰难困苦和屡犯错误，并在少得可怜的外来资本投入的帮助下，可能提供所需的模式。但是，立刻就会想到一些保留的看法。匈牙利的国家太小，不足以为前苏联集团的大多数国家提供有效的榜样，特别对幅员广阔、地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它的面积小，又邻近西方，有利于实现在西方援助下的转变。有近4000万人的波兰是很接近于成为一种模

式的，如果它的努力——前共产主义国家中最勇敢和最雄心勃勃的努力——最终证明是成功的话。但是，波兰和中欧的其他国家仅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下受苦40年多一点；波兰的经济从来没有实施全面国有化（有着私有农业和有些行业和零售商业一直掌握在私人手中），意识形态方面也不是一统天下（有着敢于违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强有力和独立的天主教会），而且中欧与西欧还保持着为时甚久的关系。

相比之下，俄国共产主义持续了75年。它是土生土长的和扎根较深的，对人民的集体精神有着极大的影响，并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文化。因此，在前苏联境内的挑战的困难大得多，利害关系更大，范围也更广阔。那里的共产主义后的转变影响着约3亿人；民主抉择之成败将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包括对不发达的和经济上仍在挣扎中的国家。的确，必须把这个转变看作是20世纪的伟大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最终行动。

在这个转变中西方援助的作用必然比对东德乃至中欧的援助的作用小得多。要赶上东德人口所得到的援助数额，向俄罗斯提供的年度援助就需花费几年的时间，因为按俄罗斯本身约为前苏联中的1.5亿人口算，就需约1万亿美元，而这个数额只能衡量出90年代初期西方实际投入的援助数额是杯水车薪，无足轻重的。归根结蒂，尽管西方的援助是必须的，而且也会提供的，重建俄罗斯，特别是它的共产主义后的转变必须主要靠俄罗斯人自己的努力。

这种既没有既定方针又缺少模式供借鉴的努力，将不

得不考虑到具体的俄国共产主义的遗产——不是为了使之长存永恒，而是为了扬弃它们，这样做多少有助于形成一个稳定的和越来越民主的政治制度，同时还促进一种权力更分散的和越来越多的市场基础的经济。这话所用的措辞正是要说明，有关寻求这两个目标的过程必然是渐进的。实际情况是，在俄罗斯——不同于，例如，波兰——企业家的传统已经湮没殆尽，私人企业已告灭绝，留下的共产主义的遗产是，一个对自由市场的金融和竞争的复杂性知之甚少的俄罗斯社会，和一个背着庞大沉重的无效率的工业部门的中央集权制经济。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俄罗斯模仿波兰人那样迎头冲向市场经济，那就可能引起民主的政治目标和经济的自由市场目标之间的致命的矛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共产主义后的俄罗斯缺少社会和政治机制，以便能够对必要的经济改组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经济混乱阶段中注入和维护社会纪律。东正教会不享有波兰天主教会那样的组织和精神权威，而且在"改革"流产期间或者甚至在苏联制度临终前的数月里，都没有任何全国组织挺身而出与共产党政权抗争（像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反对快速变革的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主席阿尔卡季·沃尔斯基很重视这些方面的对比，他指出（1992 年 7 月，与《新时代》月刊记者的一次专访中谈及），"这里的人对波兰的经验和休克疗法都津津乐道。但是在俄罗斯一定不能依靠休克疗法：由于我们惯于对一切事情都搞极端化，休克疗法在这里会变成休克手术。一般

说，波兰的社会是很巩固的——95%的人都信天主教。红衣主教格雷姆普只要举起一个指头，说：不要罢工！马上就不再有任何罢工。团结工会也能把社会团结起来。政府是脚踏实地的。它得到来自下面的支持。"因此，在俄国不像波兰那样，快速私有化所造成的社会困难和经济贫困非常有可能引起大规模的和政治上的动荡不安。

对前苏联注入所需的企业家道德精神，和对现有经济制度实行私有化，将需要经过很多年——实际上，数十年——持续的和十分耐心的努力。仓促行事不仅会白费劲儿，而且很可能把俄罗斯推向革命的境地。如果因不加区别的快速私有化的政策以及(或者)俄罗斯的大工业企业破产而引发了大规模的失业，这种情况尤其可能发生。基本的现实情况是，即便具备最好的客观条件，俄罗斯的很大部分的工业不能实行私有化，因为它们没有竞争能力，而突然关闭歇业会意味着造成数千万之多的人失业。农业方面的情况是同样不可乐观的，由于俄罗斯的农民大批被杀，而设立的集体(国家)农庄靠的是机器耕作，只适于大规模的农业，所以非集体化不大可能吸引很多一心想当个体农民的人，而在经济上它甚至可能是一个失误。

因此，如果共产主义教条的失败促使共产主义后的俄罗斯领导以简单化和机械的方式采纳新的自由市场的教条，而且对所涉及的社会代价和政治风险置于不顾，那将是具有历史性的讽刺意义。然而，总的来说，这恰恰是西方给俄罗斯的忠告。俄罗斯一贯被敦促要同时创立民主和建立

自由市场。这类忠告正被一批精英们所汲取，并奉之为教条，他们不很了解文化与经济之间的敏感关系，而且总是容易对“自由市场”的字眼搞烦琐的形式主义，就像他们的先辈们宣称献身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搞烦琐的形式主义一样。

相反，很可以忠告共产主义后的俄罗斯领导，优先使坚实的宪法和民主程序制度化和巩固化，以便使稳固的政治框架能够承受住深远的社会经济变革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震动作用。直到——和除非——有效地建立法律体制、政党制度和稳定的议会程序，否则，同时追求民主的目标和自由市场的目标只能证明是相互拆台。在1992年，唯一的一个真正全俄罗斯民主选举的官员——它的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着手敦促对在一种政治上半无政府状态下的根深蒂固而又腐败成风的制度，进行根本的变革。没有一个稳固的宪法的国家，可能产生的社会上的强烈反应就会失去控制，并为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敌对力量所利用。

此外，俄罗斯领导还可以仔细研究某些亚洲国家在二次大战后促进其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从中得益。成功的亚洲国家都认为，为了赶上自由市场方面的先驱国家，一定程度的长期持久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特别是通过深思熟虑地确定国家经济目标保证长期的政策一贯性。此外，政府还必须花大力气颁布旨在加强社会和实际基础设施的政策措施，而对此自由市场本身很可能是无能为力的。最后而又重要的一点是，俄罗斯人必须懂得——用日本重要的计划人

员大来佐武郎的话来说——"市场机制并不是万无一失的",特别在前共产主义国家更是如此,不仅因为它们的经济"还仍然需要政府干预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而且还因为它们的私营部门的经济尚不成熟和它们的市场发育不全。"

但是,不论共产主义后的俄罗斯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俄罗斯的近期的政治和经济前景无论如何基本上是不顺利的。共产主义使俄罗斯的身心备受创伤以致恢复将是漫长的、痛苦的,其结果也极难捉模。近期的前景特别暗淡,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俄罗斯正开始在社会经济方面经历在很多方面类似30年代初期美国大萧条时期的衰退:生产和消费大幅度下跌,极度的通货膨胀和日益增多的失业人数。这个国家还面临着日趋激化的阶级冲突——为数越来越多的贫困群众憋不住要对极少数的新贵豪富发泄怨恨——和日益加深的政治仇恨。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人民很可能既不会汲取企业家的精神,也不大可能会容纳顺利转变到民主的和经济上多元化的制度所需的妥协宽容的政治文化。结果很可能是自由市场和初期的俄罗斯民主两败俱伤。

日益加剧的俄罗斯精神的危机乃是俄罗斯帝国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和地缘政治上瓦解的必然产物。这一精神危机使俄罗斯人民更易采取极端的政治观点,并已经对未来俄罗斯的外部的和内在的命运引起了对立的两极化的争论。随着俄罗斯帝国的分崩离析,"俄罗斯"的含意是什么?

现在当一个“俄罗斯人”又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这些都是种族的或超民族的概念（与“英吉利”民族和较广的“不列颠”民族概念之间的区分相似）？对民主口号不再着迷和对新的经济秩序失望，正使人民更加渴求某些新的真理，以便填补由于共产主义的消失和对自由主义的幻想日益破灭所留下的空白。

人们不应当低估这一情绪的潜在影响。俄罗斯人民对他们的历史命运一直有着一种特别的半宗教和半哲学的意识。将莫斯科视作第三罗马决非凭白无故的口号；它表达了深刻的内在的特别使命感。共产主义普救论之所以能如此有吸引力地在一段时间里移植到俄国土地上，道理就在于此：它赋予人民以更普遍的超越旧俄罗斯帝国范围的使命感。“光明来自东方”——这一时常援引的用语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含意，特别对于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更是意味着，他们矢志寻求从一个绝对真理的角度来界定现实生活的超凡公式。在他们看来，俄罗斯注定要成为那个“光明”的使者，把腐败的西方从其无所不在的堕落邪恶之中解救出来。转过来，使命感和有关的信仰使俄罗斯人理所当然地作出必须的个人牺牲，包括驯服地把个人——和他或她的自己的自由意志——服从于伟大的召唤。

与这一切有联系的是对大国地位的自豪感。俄罗斯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大约300年来一直是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不论是作为沙皇帝国的权力中心，还是作为后来的苏联的权力中心，克里姆林宫不仅主宰着一个伟大民族的命运，

而且主宰着很多直接附属的民族的命运。更一般地说，它影响着世界事务；全世界的人都必须小心地听克里姆林宫讲的话。具有政治意识的俄罗斯人正是出于这种情况产生了他们的自豪感和地位。在前不久的年代里，苏联自认为是与美国旗鼓相当的对手，它把与美国的竞争作为衡量自己的尺度，并自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学说——注定会在对外力量和对内福利方面都超过美国。

苏联的垮台和俄罗斯帝国的瓦解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以致使俄罗斯人认识到，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靠不住，以及苏联制度的内在的伪善和运作的低效率。突然之间，一个掐头去尾的俄罗斯下降到贫穷的和依赖别人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地位，成为西方咨询和救济的受益者，和前附属的非俄罗斯族人民讥讽与谴责的对象。这是一种令很多人痛心疾首的情况。对于广大群众来说，由于突然来临的严重的社会匮乏而对这种情况怨声载道，而越来越多的内部动乱的迹象使之更无法容忍。

那么，什么样的未来前景可能证明是具有吸引力和引人注目的呢？有少数人坚决认为，俄罗斯应成为一个正常的、帝国后的和越来越明显的欧洲民族国家。实际上，他们主张俄罗斯最终合并到新兴的欧共体（起初可能采取邦联形式）之中，因而俄罗斯也就永久承认它的前非俄罗斯族的附属民族各自独立。在他们看来，俄罗斯将要成为处于转变过程中的波兰（而在文化上一直自认为如此）：作为共同的和广大的欧洲文明不可分割部分的一个欧洲国家。诚然，这

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为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客观和主观差距仍是巨大的——但是，持上述观点的人认为，俄罗斯要成为既现代化又是民主的国家，舍此别无他途。

然而，在很多人看来，上述观点既不实际又有悖于常理。它之所以不切实际，是因为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俄罗斯将无法弥合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在生活水准和思维方式方面的差距。而它之所以有悖于常理，是因为这样做就等于俄罗斯摈弃它自己特有的文化、历史和“灵魂”。并入欧洲就意味着不再具有俄罗斯特征，因为在那些反对并入欧洲的方案的人看来，俄罗斯不只是另一个民族国家，而且是一种别具特色的和真正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种属于它自己的文化，和一种被认为与“欧洲”和“亚洲”一样的有明显特色（即便难于确切界定）的认同感。

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充分表现在1992年变得日趋激烈的莫斯科的辩论之中。开初，苏联的垮台使那些代表西方或欧洲取向的人无所顾忌。他们主导了共产主义后过渡时期俄罗斯前途问题的公众讨论。但是，慢慢地随着过渡中逐步引发的国内困难，对自由化的公式和西方的处方产生了怀疑，不同意见的声音开始日有所闻，它们力主俄罗斯的外部和内部取向应与此不同，应更具特色和更多地维护俄罗斯的特定传统和利益。

持这些不同观点的人，从温和派直到极端派都有。但是，他们有着某些共同的见解。在温和派方面，他们反对上述两种取向，强调“俄罗斯在全世界的使命……是发起和支

持文化和社会与生活方式方面的以及国家间的多边对话。俄罗斯作为协调国家，要实行俄罗斯的联系，俄罗斯的联合……成为一个汲取东西方和南北方之长的独具特色的国家，并且完全可能把很多不同的原则和谐地融合在历史的交响乐中。"讲这番话的谢尔盖·斯坦克维奇本人（见 1992 年 3 月 28 日《独立报》）是一个主张民主的政治家，他这话的内容仍然反映了俄罗斯在全世界的特殊使命感，一种源自独特性的和促成特别召唤的使命感。

综上所述得出的实际结论是，俄罗斯应当越加重视本身在全球的特殊地位，力求跻身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行列。在国内，上述观点则强调更加重视俄罗斯的义务和保卫生活在俄罗斯的自然疆界之外的俄罗斯人的权利。明确主张采取"一种较强硬的姿态"，并敦促俄罗斯有力地维护其支持"受到不应有的蔑视和不公正的迫害的人们"的"权利"——而俄罗斯的现政府被指控没能维护这种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观点代表了温和派的不同看法。而更加尖锐的俄罗斯声音也越来越喧嚣了，它们既对内部帝国的崩溃表示叹息，又对共产主义后的俄罗斯领导人的所谓过分的亲西方而感到痛心。持这类观点的人认为，国内政策应当以重建"联盟"（帝国的委婉说法）为目的，例如，叶夫根尼·阿马巴特苏莫夫（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断然宣称，"我越来越深信，苏维埃联盟的解体是一个完全欠考虑的，不负责任的步骤"，而使它恢复，"不幸，将不是没有痛苦的"。（见 1992 年 4 月 13 日《俄罗斯报》）。

恢复联盟正越来越成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政敌的公开声称的目标。他的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致力于召唤俄罗斯的自豪感和斥责俄罗斯帝国权力崩溃的负面后果。对这一崩溃越来越被说成是俄罗斯的内部社会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而该困难又因新的克里姆林宫统治者对西方欲望的所谓过分顺从而变得更加严重了。鲁茨科伊对乌克兰的独立采取了一种特别尖锐的立场，强烈反对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的分离，并敦促对基辅采取持续施加压力的政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反复地——在频繁的演讲中和广为传播的文章里——唤起人们对昔日俄罗斯光荣历史的回忆，颂扬俄罗斯帝国的功绩，显然企图激起他的听众和读者作出救世主似的和传教士般的本能的普遍响应。

鉴于俄罗斯的内部困难日益增多，蛊惑民心的政客们越来越趋之若鹜，对共产主义后的政策进行全面的谴责，把帝国的崩溃和叶利钦政府的亲西方倾向说成是政治混乱和经济滑坡的根本原因，这并不奇怪。因此，国内民主和国际和解通融越来越成为公开阐明的攻击目标。曾在1991年俄罗斯总统职位选举中获得700万张选票的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走得最远，公然提出在国内实行国家至上的独裁制度和恢复俄罗斯国界外的帝国统治。他还要求采取这样一种政策，使俄罗斯明确地跻身于南方的较贫困国家之列，从而可以发挥其领导作用，而不必想方设法成为富人俱乐部里的穷会员。

要牢记在心的重要之处是，与日里诺夫斯基之流政治

上孤立的分子有关的极端观点，正慢慢地渗入曾与1991年反共动乱密切有关的民主倾向的政治领导人，如鲁茨科伊和斯坦克维奇的言谈和用语之中。结果是在有关"欧洲"取向是否切实可行的问题上，增强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的怀疑主义，并诱使俄罗斯要么采取一种加入第三世界的选择方案，要么甚至于——像有些人笼统地主张那样——力图与来自南部的伊斯兰浪潮作某种反西方的合流。对于一般的俄罗斯公众来说——他们本身对现状越来越不满，被新的经济程序搞得晕头转向，对既羡慕又得不到的西方文化持敌视态度（因而贬斥西方文化中的物质享受至上已越来越成为时尚），从而渴求某种新的真理——国家至上的民族主义就可能成为唯一的统一思想的办法。

这种民族主义的号召力并不意味着会恢复到共产主义的统治。因为这一选择是太不得人心了，直接受斯大林主义之害的俄罗斯人也太多了，充斥在俄罗斯媒体中的揭露过去骇人听闻的事情多得难于计数，以致不容许恢复明目张胆的共产主义的选择方案。但是，主张建立强大国家的观念可能具有高度的吸引力，这个国家要体现俄罗斯的独特的传统，要以崇高理想的名义实施纪律，要力图重新获得全世界承认它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并要自我界定对外部世界的新使命——可能与其他贫困国家有关的使命。树立这一观念可能一扫蒙在普通俄罗斯人心灵上的哲学混乱的阴云；它还可能再度黑白分明地界定现实，并为人们作出社会牺牲和政治服从提供理由。

最终的危险是，这会指向一个新的动员群众的超凡神话。但是，这种危险本身不大可能表现为共产主义东山再起，而是表现为一种新的法西斯主义的形式。法西斯主义在利用人性的非理性方面特别有效，它还能很有效地激发通过民族主义特征所唤起的激情，利用民族权力和荣耀的号召力，和得心应手地大力加强纪律性和统一性。而共产主义在其理论表现上对人的期望过多，并对驱使人的行为的基本本能作了错误的判断。作为学说，法西斯主义更为原始；但作为一种情绪，法西斯主义则是基本的、粗犷的和有力的。

一种俄罗斯的法西斯主义的变异形态不可能像具有极端种族偏见的纳粹主义走得那么远。俄罗斯的法西斯主义既不同于共产主义也不像纳粹主义，它本身将更多地表现为，独裁主义而不是极权主义，沙文主义而不是意识形态至上，国家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它甚至不会宣称本身是法西斯主义或明目张胆地拥护早期的法西斯理论。很可能它主要在实践中推行法西斯主义：同时实施专制统治和国家对部分私营经济的统治，推行沙文主义以及强调帝国的神话和使命。这种混杂的体制将随即填补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俄罗斯所造成的黑洞，创造出民主和自由市场可能无法保证的强制性秩序的条件——即便不再是强制性乌托邦的秩序。

某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的再生，如果它最终出现的话，将不可能只限于俄罗斯本身。它几乎肯定会遍及某些非俄

罗斯的前苏联共和国，因为它们的内部困难很可能与俄罗斯一样严重，它们的民主前景甚至比俄罗斯还要渺茫。它还可能传播给政治上不稳定的中欧地区，特别是如果该地区的共产主义后的转变岌岌可危的话；以及扩散到西欧的某些地区。一般地说，法西斯主义的再生，集中体现了对现实的多元化和实用主义想象的失败，这种想象是否认从上到下的确信、统一和纪律乃是健全社会标志的观点的。

法西斯主义的不死鸟在俄罗斯转世再生不单单是极大的历史讽刺。由于它的扩散和蔓延的潜力，某种新形式的法西斯主义还会对寻求国际合作的事业形成复仇性的挑战。它将是通向未来的民主道路上的具有感染力的灾难性失败，而一个充满民族主义动机的俄罗斯，在再度恢复的帝国本能的驱使下，并因而非常可能与其邻国发生激烈冲突的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使世界越来越无法控制它的命运。

第三章

全球不平等现象

纵观世界历史，在以往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平等现象都能为人们容忍，因为各大陆之间远隔重洋，文化相去甚远。而今世界各地之间距离缩短，交往密切，人们在政治上普遍觉醒，不平等现象就变得难以容忍。然而对不平等现象进行抵制具体采取何种形式，则取决于这种抵制是否有明确的方向感，是否涌现出公认的旗手。这不仅涉及俄罗斯未来的作用问题，而且涉及中国未来的作用问题。

新的靠近感促使人们强烈地感受到全球生活条件方面的不平等，这一事实是当代现实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新问题。政治觉醒的扩展促使人们强烈地抵制这种不平等现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抵制可能是仅处于开始阶段，更多地表现为愤恨而不是有组织的行动，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它将日益渗透到占人类绝大多数的那些人的观念之中，他们了解并嫉妒一小部分富有者的享乐和富足。因此，全球不平等现象势必成为21世纪政治中的重大问题。

建立在自由市场体制基础上的民主似乎在当前取得了胜利。但是它的胜利主要是由于共产主义的失败，而不是由于它成功地表明民主理想放之全球而皆准。对世界大部分贫困地区来说，民主理想是否行得通还要看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是否得到提高。不从根本上解决基本生活需要问题而单单实行程序性的自由，这是不够的——西方文化中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似乎并不是自由市场内在优越性的明证，而主要是更广泛的全球性不平等的结果。所以更应当说，在意识形态冲突中民主制度的胜利是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对苏联集团的胜利，而不是民主理想本身在全球的胜利。诚然，这场胜利的意识形态内容是不可否认的，但那个在全球取得彻底胜利的民主理想在哲学上则是肤浅的。

与此同时，客观力量和主观力量都在强调平等问题的重要性，并把它列为下个世纪日程表中的首要问题。客观因素源于人口和经济动态。全球人口增长极不平衡，它对那一部分穷人影响更大。经济增长也不平衡，但它对比较富裕的那一部分工人则照顾较多。因此，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世界财富分配不平均的现象更为显著。据大多数专家认为，到2000年世界人口将接近70亿(1900年为15亿，100年中增加了3倍多)，到2025年将达到85亿。这85亿人中可能有65亿居住在较穷的国家，其中孟加拉国将从现在的1.15亿增加到2.35亿，埃及从5000万增加到1.25亿，肯尼亚从2400万增加到8000万，印度从8.55亿增加到14.4亿。更糟糕的是，这些人口中约有2/3集中在欠发达世界的

贫民窟中，使他们极易接受激进的政治鼓动。

不利的人口趋势又伴之以不利的经济趋势。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2年《人口发展报告》中的材料，在本世纪60年代，富国比穷国富30倍，到了90年代，差距大到富国的收入比穷国高150倍！这种趋势目前仍未改变。这种贫富越来越悬殊的现象也发生在穷国内部，从而加剧了国内社会矛盾。该报告还估计，按人口平均计算，贫困国家中比较贫穷的那部分人所接受的援助，实际上只有这些国家较富裕的那部分人同时期捞到的援助数额的1/2。最后，发达国家或比较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比较高，这进一步扩大了客观上存在的差距。

老龄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平衡现象在主观上加剧了对这种差距的愤懑。富国中65岁以上的那部分人的数量增加得远比穷国快，而15岁以下的人的数量则减少得较快。穷国中难以驾驭的青年人口众多，性情暴躁，常常失业或就业不充分，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但是通过现代通信工具他们又对其他地区的情况有所了解，政治上日益活跃——这些青年的存在将加剧在全球贫困阶层中普遍存在的焦躁和受挫心情。

与此同时，平等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而世界富裕地区对生态平衡日趋关注可能进一步突出这一焦点，或许这是人们意想不到的事。生态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最终将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因此应立即引起注意。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忽视实在太久了。但是必须正视这

一事实：迄今是发达国家对生态造成了最严重的破坏。正是在欧洲和北美一些物种已经彻底灭绝，也正是在这些地区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殆尽。发达国家，特别是前共产主义国家，在实行工业化的过程中，极少考虑对环境的保护，结果是人们的生命开始受到严重的威胁。他们的政策导致大气中积存起使热量散发不出去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无限制的聚集行将带来全球性的灾难。

发展中国家正步富国的后尘，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常常不顾一切，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对生态问题漠不关心，而是因为仿效富国历史上的做法乃是它们摆脱落后和贫困的唯一途径。在它们看来，生态遭受破坏是一种较小的祸患。还有，富裕国家争辩说，在过去的年代里，全世界都未意识到生态问题，因此，发达世界实现工业化的方式应既往不咎，不应作为计算对付环境问题所需费用中的一个因素；而发展中国家却认为，富裕国家不能仅仅用这种辩解就逃脱自己应负的责任。简言之，它们认为，人类中比较富裕的那一部分人对环境问题严重到今天这种地步负有较大的责任，有义务负担治理环境问题所需的大部分费用。

因此，对全球生态的关注使全球平等问题益发突出。这种关注在先进国家中以及在这些国家内的社会上等阶层中特别有影响。这一现象本身并不影响这种关注的根本合理性，尽管它带有一种社会时髦的味道。（它也在科学家中间激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对生态的关切是否正产生一种新的"主义"——有人称之为"荒谬的生态主义"——以及人们

能否严肃认真地主张：在作出有关生态的决定时应排除政治考虑而完全依据所谓科学标准?)但是在人类较富裕的一部分人保护生态的鼓吹中也存在着一种矛盾：热爱大自然的新的激情和相当大一部分富裕者纵情享乐的生活方式。除非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本身作重大重新评估，包括在不是寻求真正需要之满足而是寻求自我享乐欲望之满足方面采取全面的自制，对生态的强调将成为加剧富人和穷人冲突的另一个因素。

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变成这样一种因素。1992年里约热内卢会议上发生的摩擦只不过是一条更深和更宽鸿沟的表面现象。此外，富国正越来越注意治理本国的环境问题，结果可能是富国和穷国之间生活质量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对北美自由贸易区提出批评的某些人指出，它使保护美国环境的工作变得容易，但它将允许美国的工商企业任意破坏墨西哥的环境。美国用于保护和恢复生态的开支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以上，德国正接近这一比值，其他先进国家也都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开支总额不久将达到每年2000亿美元左右。到一定时候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不应该把这些开支的主要部分用于整个世界，不只保护环境而且更普遍地改善穷国的状况吗？

因此，在人类较富裕的一部分人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生态的关注将变成一种促进力量，促使他们在更大程度上认识到，不仅需要从哲学上对自己的生活方式重新进行评估，而且需要对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这一棘手问题予以

较多的注意。共产主义的失败使西方不再把后一问题摆在议事日程的重要位置。然而，由于人们从心底里担心，如果对破坏环境的现象继续漠不关心，生命将受到威胁，同时必不可免地在生活富裕的阶层中这种担心更为强烈，这可能驱使发达国家采取某些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实际上等于开始着手处理更大范围内棘手的社会经济问题。由于一个政治上正在觉醒的世界越来越不能容忍生活条件方面的严重不平等，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发生。

平等问题正引起世界各主要宗教的愈来愈密切的注意。许多世纪以来，各大宗教一直致力于社会正义问题。——当然这是很自然的事。它们着重关心的是穷人。不过，虽然它们敦促富人对穷人要更怜悯，从本质上说迄今它们鼓吹的往往是听天由命，逆来顺受，而不是变革。作为社会公共机构，它们受现实需要的驱使，与有钱有势者迁就通融。于是到了一定时候，它们就不由自主地成为现状的维护者，尽管它们真诚地关心道义，具有自我牺牲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曾激励着他们，使之毕生献身于宗教事业。

然而，面对着日盛一日的现世主义，面对着现代生活方式的威胁和道义上使之反感的西方享乐主义的大众文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日益关注平等问题，把它视为现代生活中精神领域的大难题。通过这样做，它们可能部分地填补马克思主义留下的真空，但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共产主义以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不平等问题，排斥精神的中心地位，声称人是以物质欲望为特征，受物质欲望驱使的，它将成功地

为每一个人建立幸福的物质生活。而宗教则强调，幸福生活首先取决于精神，幸福生活的真正含义是指在人际关系中伸张正义。宗教认为，不应机械地通过平均占有物质财富来寻求平等，对平等的寻求应作为在占有物质财富方面实行自我抑制的起点，作为相互责任之体现的起点。

基督教当代最强大的派别罗马天主教日益尖锐地把矛头指向它称之为资本主义消极文化表现的方面：它不顾社会后果，而只顾满足个人物质和感官的欲望。教皇在通谕和劝诫性的讲话中，在承认自由市场生产高效益的同时，严厉谴责了把满足各种个人欲望置于社会责任之上的文化所必不可免地带来的道德堕落，严厉谴责了不断地争相刺激这些欲望的市场——包括大众传播媒介在市场中的作用——中所固有的危险。通过强调全面的生活质量，特别是强调需要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两者之间取得和谐的平衡，罗马天主教把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视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极力唤起人们对它的注意。

在实际宗教活动中，天主教和基督教其他教派都认识到，它们的布道活动在世界贫穷地区有最大的感召力。正是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及亚洲一些地区宗教信仰仍根深蒂固，充满活力，最有希望成功地改变人们的宗教信仰。因此，它们必须重点抓一些必然能唤起人们政治和社会注意力的问题。因此，只进行使人精神升华的安于天命的布道就不够了。精神上有意义的生活之定义，在较贫困的地区逐渐变成了不断根除贫困；在较富裕的地区，则逐渐变为在寻求物质

利益时实行自我抑制。基督教一直强调精神平等，甚至强调从精神角度讲贫穷优越于富有，于是当今的新形势便驱使它更积极地反对正不断加剧的物质不平等现象。

然而，天主教小心翼翼，不规定任何具体的社会模式。用梵蒂冈二世的话说："人权准则不导致规定任何单一的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制度……基本人权只是为各种制度和意识形态作出限制和确立义务，没有规定这些制度的确切形式。"此外，天主教绝不主张使用革命暴力作为取得社会正义的手段。拉丁美洲的主教们提出了著名的"优先考虑穷人"的原则后，约翰·保罗二世教皇在1979年对这一原则表示赞同时也强调，天主教的使命"在于通过具有改变、调解、宽免及和好之力量的爱，实现彻底救度。"不过，仍然明确地作出了"优先考虑穷人"的承诺；1992年，约翰·保罗二世教皇在会见拉丁美洲主教时颇动感情地重申了这一原则的中心地位，尽管有些人不同意这样做，主张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现代文化和世俗主义的危险上。

另一个积极发展教徒的主要宗教伊斯兰教也是这种状况，不过是以较为间接的方式。虽然历来人们把伊斯兰教看成是远比基督教更倾向于对现实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但当代的伊斯兰教正在通过批判西方式的现代化变成抵制不平等现象的动力。伊斯兰教的思想家们认为，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邪恶的，它的驱动力是在文化上向最基本的感官冲动投降，因此正企图形成一种伊斯兰现代概念，使伊斯兰社会既摒弃现代化的文化糟粕，又能享受现代化的技术成果。

这样做时，他们向往着若干世纪之前的伊斯兰历史阶段，当时伊斯兰世界科学技术先进，发明创造层出不穷。鉴于许多穆斯林认为，在与处于优势的西方的关系中在文化和政治方面存在着不平等现象，这些思想家的振兴伊斯兰社会哲学的努力，也变成了铲除这种不平等状态之努力的一部分。

实际上，在伊斯兰世界，比较坚定而一致的宗教倾向正在产生一种防御性的观念，决意排除西方的"邪恶"影响，而努力推进长期休眠的穆斯林文明的振兴。因此，宗教和政治正在携起手来提供一种伊斯兰形式的选择，在这种选择中，不是把文化现代化而是把技术现代化吸收到以宗教标准为主导的价值观念体系中。伊斯兰教正在通过这样做摒弃异族文化居于凌驾地位的状况；它认为异族文化在哲学上腐化堕落，在经济上巧取豪夺，在政治上则是帝国主义性质的。

伊斯兰教以这种方式对受挫感作出了反应，这种受挫感不仅存在于政治上觉醒的阿拉伯民众中，而且存在于亚洲的为数更多的非阿拉伯穆斯林中，存在于数量不断增长的非洲人中，甚至存在于美国黑人中（全部加起来很快要超过 10 亿人），他们感到在一个仍主要由富裕的和信仰准基督教的西方白人统治的世界里，他们受到诋毁，受到凌辱。伊斯兰世界清楚地知道对它的价值观念和传统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攻击，这种攻击在美国尤甚；美国是现代化革命的先导，在那里反穆斯林情绪常以粗鲁的形式表达出来。伊斯兰教目前作为一种使人改宗的信仰所取得的成功部分是源于

这种反感情绪，但是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使人们全面地憧憬到另一种生活方式。

因此，富裕国家内对生态的日益关切（富裕阶层的新信仰）和各大宗教对社会正义的日益关切，异曲同工地把不平等问题变成当代的中心问题。不过，虽然宗教可以强化全世界对不平等问题的关切，但它能否提供一种具体的模式使人们对建立有效的、全球向往的社会秩序之迫切需要得到满足，这是远未弄清楚的。基督教或许可能唤起西方的良心，伊斯兰教可以激起穆斯林的愤懑情绪，但是这两种宗教在现阶段都不能对上述中心难题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现在既没有可行的基督教经济模式，又没有一个伊斯兰教现代社会样板。同时，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所遭受的失败使任何实行强制性平均主义的乌托邦企图都声名狼藉。

实际上，当前对平等问题的与日俱增的关切反映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混乱，这种混乱不利于迅速提出关于乌托邦式社会重建的全面信条。该领域中现在居首要地位的是一些尚未最后成形的渴望，这些渴望在种族性问题中，甚至在不合理的思想行为中找到感情上的满足，而种族性问题和不合理的思想行为是产生准法西斯主义的最好温床。准法西斯主义将导致政治方面新的不合理思想行为的爆发，即使不再以无所不包的新超凡神话的形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一具体模式和具体某一领袖能够有效地与富裕的西方抗衡，同时能够建立稳定的、成功地应付国内严重社

会不正义现象的社会秩序，那么，对全球不正义现象的全神关注就可能通过在政治上折服于这一模式和某一具体领袖的方式表现出来。

当前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可能有资格作为这种模式和领袖。印度本身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因此，即使它的种族和宗教矛盾不使它分崩离析，它也很难享有尼赫鲁时代曾享有过的国际地位。非洲没有一个国家有这种声望，拉丁美洲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种资格。

如前所述，在某些情况下，俄罗斯可能会情不自禁地寻求这一领导地位。地缘政治方面的进退维谷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混乱可能驱使它这样做。但是，俄罗斯要使自己的领导地位真正被他国接受，而不仅仅是俄罗斯人自己声称如此，这种地位必须建立在行之有效和吸引人的社会经济模式上。如果俄罗斯变成一个准法西斯国家，它必然卷入帝国主义国家的新的斗争中，在这种斗争中它又必然力不从心，这样它就不可能提供上述模式。如果俄罗斯成功地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它将面向西方，继续依靠西方提供援助；于是它与发达世界的逐步融合使它根本不可能与前第二世界各民族保持有重要意识形态内容的密切关系。因此，无论俄罗斯成为一个法西斯国家还是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如果它抱有这种非分的愿望，那是很难得到世界上贫穷国家的衷心支持的。

而中国则有可能站出来充当这一领导角色。中国仅仅依靠自己就可以向不平等世界提出挑战。中国是一个大国，

有10亿多人口，正在坚持不懈地进行着反对不平等现象的斗争；至少到目前为止，这场斗争是卓有成效的。在一个民族国家世界里，中国又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它是一个民族国家，同时又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真正独特文明的国家。与俄罗斯相比肯定是这样。因此它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颇为特殊，既是它们的一部分，又不是它们的一部分。

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自己要这样做的。中国认为，它不需要外部世界，在许多方面中国超出了它，任何扩张和文化改宗的企图都是毫无意义的。从另一角度讲这也是防御，即一个深信自己文化优越的民族筑起壁垒，锁起国门，以防止野蛮人的侵入。甚至中国的共产主义也与苏联共产主义不同，远不像受俄国乌托邦思想驱使的苏联共产主义那样在全球到处兴风作浪。但是那种隔绝又是距离、地理和语言诸因素起作用的结果，所有这些因素（如日本的情况一样）都强化了中国文明的独立自足性和与外界隔绝性。

那种自我被排除在外的状况正在消失。在当代世界上，中国不可能与外界隔绝。通过大众信息传播，外部世界现在对中国发生着影响，反过来，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引人注目，越来越重要，不仅对与它相邻的国家是这样，甚至对远隔重洋的大陆也是如此。如果中国以其10亿多人口，能够成功地建设成一个政治上可行、从全社会来看又比较富足的国家，它必然日益成为全球注意的焦点，不论它是否希望如此。那些急不可待地

想寻求适合本国样板的较贫穷的国家必然对中国趋之若鹜，即使中国不从意识形态角度阐述和宣传中国模式的意义。

因此，关键在于两大方面的考虑：中国国内的实际状况和中国打算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什么角色。就中国自己的前景而言，总的来说，征兆是好的。在长达近15年的时间里，中国执行的政策一直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外表与务实主义的经济管理结合起来，在实行独裁专制的同时，给各地区相当大的社会经济自主权。其结果是经济逐步非国有化，从农业开始(它使中国在农产品方面不仅做到自给自足，而且成为出口国，与俄国形成鲜明对照)，扩展到个体和零售业，以及开放中国沿海地区(那里有2亿多人口)，直至通过外国投资和资本主义方式的竞争，直接参加到亚洲各国向繁荣进军的队伍中来。到1992年，国营部分只约占工业产出的一半。

从总体来看，必须说中国取得的成绩是极为令人钦佩的。虽然用全球标准衡量，中国仍是一个穷国，但在80年代，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以接近10%的年增长率递增。这相当于当年日本、韩国和台湾的惊人速度。从当前的迹象看，在整个90年代中国将保持大体相同的高增长速度。在沿海某些地区，例如广东(它有6000多万人口，与欧洲一个大国的人口相当)，增长速度甚至达到了每年递增13%。如果这种速度保持下去，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四个经济大国，仅次于美国、欧洲和日本。

而且，中国到达那一阶段的途径可能是通过把自由市场体制的主要成分，特别是其竞争性企业家精神（中国人对此驾轻就熟）和向国际金融关系开放，与残存的国家指导作用相结合，包括全民所有制在工业中仍起重要作用。中国的全国信息中心在 1992 年年中估计，到 2000 年，在工业产值方面国营企业仍占 27%（可能主要是重工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占 48%，私营企业占 25%。假定社会基础结构和个人收入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改善，中国很可能会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特别是被前苏联各共和国的人民，看成是一个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模式，可以用它来代替已宣告失败的共产主义制度和西方式的建立在自由市场基础上的民主制度。

因此，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是很关键的。中国当前领导层中八九十岁的老人至迟到 90 年代中期就会不复存在。此后可能会有一段政治不稳定时期。存在的危险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能分崩离析，它的经济发展甚至可能脱轨。中国历史上曾反复出现过这种现象：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后出现分裂混战的局面。这种情况可能再次发生，特别是鉴于中国南北方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中国又会闭关自守，忙于国内的冲突。

然而，人们还必须考虑到这种事实：过去 15 年中国在社会经济方面的进展已经奠定了顺利过渡的基础，中国的过渡未必像苏联接班问题那样有破坏性，因为苏联的接班是在一种明显的、不断加剧的制度失败的背景下进行的。虽

然专制制度的交接班危机通常是严重而有破坏性的，在一种比较有利的社会经济背景下，中国的交接班危机可能不像通常那样严重而有破坏性。如果是这样，中国可能不要太长的时间就会在全球事务中采取一种较为坚决而自信的姿态。

经济蓬勃发展、军事力量强大而又日益成为国际关注目标的中国，面前可能摆着三种全球性战略选择：

（一）中国即使非常务实，实行可以称为“商业共产主义”的政策，但仍称自己属于共产主义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非常有意识地扮演世界穷国领袖的角色，与以美国、欧洲和日本为首的捍卫现状的联盟相对抗。

（二）中国把经济实力变成政治军事力量，执意在亚洲繁荣区扩大影响，向日本的政治权势提出挑战。

（三）中国更明确地放弃其残留的信条，决定成为全球现行社会体制的一部分，假定它被欢迎加入这一俱乐部的话。

第一种选择无疑地将在世界许多地区引起反响。中国目前执行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就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中国已经在向世界上最好斗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先进武器，中国的言辞也是日益强调不能接受由少数富国主宰世界。中国对世界事务的严肃分析，例如北京出版的 1992 年 3 月 23 日《外交评论》中一篇综合性的评论和预测文章强调，发达国家企图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建立世界新秩序，发展中国家则反对这种“世界新秩序”，提出建立

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双方的斗争可能会更趋尖锐”。

随着发展中国家的某些领导人——特别是前共产主义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导人——日益想为中国模式喝彩,并鼓动中国人更清楚地阐明他们取得成功所依赖的基本方针,使中国想扮演更公开的领导角色的诱惑力可能增强。毫不奇怪,这促使上述中国分析家不仅强调中国将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正义事业,而且自信地说,“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国际威信将大大增强。”这种增强的威信(和力量)可能诱使中国成为一个折衷主义的大杂烩:在社会问题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在国家对决定社会问题先后次序的作用问题上是准法西斯主义的,在促进政治团结问题上鼓吹民族主义,在发展经济问题上实行资本主义。

那时中国可能成为走另一条发展道路的样板,成为在国际上对现行全球力量分布提出挑战的力量源泉。它的魅力可能不会采取以往乌托邦主义的超凡神话形式,但可能仍有某种教条主义的色彩。它可以声称,在前苏联共产主义样板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第三条道路”。当今世界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大规模杀伤武器散布到各地,人们渴望有一种方向感,以表达自己的愤懑,同时又作为照亮美好未来的灯塔,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尽管中国还比较落后,同时又存在着语言障碍,它仍可以满足可能普遍感受到的渴望感。在这方面它比前苏俄更有吸引力和说服力。这样它就能够不仅使国际维持和平的努力陷于瘫痪,而且非常直接地加剧欧亚几个动乱地区的战事。中国通过成功地

发展经济，通过出口武器，通过雄辩地宣传平等主义以及利用它在联合国的否决权，可望成为全球民众动乱的旗手。

在估价中国未来的选择时，人们还必须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中国在经济上是成功的，在政治上是自信的，但同时它又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全球体系之外，从而决定不只成为世界被剥夺国家的辩护人，而且成为它们的领袖，那么中国就有可能下决心对居于统治地位的三方世界不只在理论上明确地提出挑战，而且在地缘政治上也提出强有力的挑战。于是又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世界格局最有利于中国实现那一目标呢？对中国战略家来说，对抗美欧日三方联合的最有效的地缘政治格局可能莫过于形成中国自己的三方联盟，把中国与波斯湾和中东地区的伊朗及前苏联地区的俄罗斯联合起来，这样一个反对现行秩序的联盟对于不满现状的其他国家具有潜在的吸引力。

在某些情况下，伊朗和俄罗斯也可能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而决定参加以中国为首的这样一种三方联盟。伊朗参加三方联盟可能是为了在波斯湾地区和前俄属中亚地区实现它传统的帝国主义野心，同时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推行它特殊的政教混合的主张。力量受到削弱而又处处受挫的俄罗斯，如果它为建立面向欧洲的民主制度所做的努力归于失败，有可能认为参加这种联盟有助于它重建前帝国的努力，至少有助于重建该帝国的某些部分。对伊朗和俄罗斯，中国都大有可向其伙伴提供的东西——不仅有武器，而且有相对成功的社会经济制度，因此每一个伙伴都可能出于

权宜之计接受事实上的非正式的中国领导。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三方联盟等于旧的中苏集团的死灰复燃，但是正式的意识形态被代之以广义的抵制不公平的全球现状，北京和莫斯科的主从地位也颠倒了过来。

即使中国不扮演这种显赫的历史角色，它也有第二种选择。它可以通过设法确立自己远东主要大国的地位对区域性稳定提出严重挑战。远东已经变成了世界上现代武器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密集程度仅次于欧亚长椭圆形地区。该地区的每一个国家，从印度尼西亚到日本，都在努力聚积先进武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北朝鲜，也许还有台湾，可能很快就拥有核武器。因此中国的经济实力可能用于军事方面，而不是意识形态方面。最终这将使中国与日本对抗，形成重要的区域争夺，成为区域的潜在不稳定因素。

说来奇怪，该地区正在成为全世界经济活动的中心，但却没有任何多边安全机制。因此这里易于发生暴力冲突——在讲求实际的亚洲，暴力冲突的导火线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利益。美国从该地区的任何撤离行动都会加剧这种危险。没有美国的军事存在，局部冲突——主要由经济利益，如海上石油勘探权引起的——就很有可能爆发，中国就会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威力，迫使他国承认自己的权力。事实上，在某些方面，上述两种选择不是互相排斥的，更大的可能是把意识形态挑战与军事挑战结合起来。但是，无论发生哪种情况，全球混乱的棘手难题都会变得更难于收拾，全球的政治进程更缺少合作成分。

由此可见，就有利于未来世界局势的发展而言，中国的第三种选择——成为"俱乐部"的一个成员——最为理想。不过，要中国作出第三种选择，不仅需要西方给予积极而合作的响应——实际上，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西方会随时给予这种响应的——而且要西方承认，中国仍同情并部分代表世界上较穷的那部分人的愿望。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即使到那时，按人口平均计算，仍是一个较穷的国家，虽然情况有很大改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它将继续与不是发达富裕世界之成员的国家站在一起。中国的样板不仅吸引其他国家，而且诱使中国人宣传他们的经验在更大范围内的意义。中国仍然有时想充当全球民众的发言人，即使不是他们的革命领袖。

无论如何，人类的政治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节节胜利的但也颇以自己为中心的西方在哲学和文化方面的演化，取决于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发展将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民主模式或与民主模式背道而驰，取决于世界最大的社会实验在多大程度上融入更广泛的全球合作中去或与这种合作格格不入。因此，在意识形态混乱和社会分化严重的世界里，显然游荡着地缘政治分崩离析的幽灵。政治上觉醒的人类在朦胧地渴望其未来有某种确定性，渴望有某种为人类普遍接受的正义标准，全球地缘政治动态正与这种渴望相互作用。这种状况不仅使人畏惧，它也有理由使人们担心，全球混乱的困境可能成为形成新世纪特点的决定因素。







20 世纪是超凡神话和大死亡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产生了关于彻底控制的虚妄观念，它源于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地代表正义的狂妄论断。现代之前信仰宗教的人把现实看成是上帝的安排，到了 20 世纪，他们让位于世俗的狂热者，这些狂热者一心要篡夺上帝的权力，企图在地球上建立天堂，不只使自然界，而且使整个人类都顺从他们自己的乌托邦幻想。

在本世纪，这种幻想变成以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代价去实现狂妄的政治野心：企图以极权主义的方式建立强制性的乌托邦。在这些乌托邦中，一切现实——社会组织的客观现实和个人信仰的主观现实——都要受到来自单一政治中心的教条主义控制。为这种暴虐行径付出的生命代价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这种努力的明显失败导致了西方在目前走向另一极端，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对个人和集体的欲望，对性欲与社交行为极少约束控制。但是在这种几乎彻底摒弃一切约束控制的做法中有一种内在的观念，这就是：一切价值观念都是主观的和相对的。总之，在本世纪中人类从强制性乌托邦试验进入纵欲无度，从狂热相信绝对主义的超凡神话变成儿戏般地玩弄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

在这种哲学背景下，全球政治状况的特点是在下述几个方面相互作用的情况下生机勃勃地发展：

物质力量——征服自然的力量，控制人的生命和死亡的力量，甚至通过不断发展的科学自我操纵之能力以控制人类自身的力量；

政治激进主义——人们在政治上更觉醒，因此更容易接受群众动员，同时他们坚持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决策；

个人期望——个人期望和集体期望都迅速增大，特别是世界上的富人想更多地占有各种东西，而穷人则希望富人已经有的，他们也要有；

社会变革步伐——世界变化很快，每一代人所处的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基础结构都与上一代不同，而且差异程度一代比一代大。

然而，如果认为以上任何一个方面的变化完全在人类的控制之下，那却是一种幻觉。每一方面都在发展，都在变化，发展和变化的步伐则完全由它本身的势头决定。人类不能控制、甚至不能决定日益发展的物质力量的基本方向。进入太空，获取新武器，医学和其他科学所取得的突破，这一切都是由其内部动力决定的。每一种新的创新都孕育着另一种创新，知识、技术或能力的每一发展都只是向前迈进了

一步，它不仅打开了通向未来的新大门，而且带领人类进入了未来。人既是发明创造者，同时又是受制于发明创造过程的奴隶。

人类不断变化的现实中的另外两个重要方面的情况也大体如此。政治能动主义未必等于建立有效的民主制度。它是一种政治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对参与决策、人权和就权力及特权的不平等分配施加限制等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它把政治上消极被动的人变成渴望有方向感的激进主义的人。

个人期望也正在变化，促使这种变化的因素是：日益加快的引入新产品的速度 ——每一种新产品又产生它自己的要求；特别强调瞬时自我满足的西方消费主义文化和以此为绝大多数人树立的榜样，因为绝大多数人通常注视着并羡慕少数幸运者的生活方式。

最后，社会变革使现行文化和社会经济基础结构在一代人时间里就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其变化之快至少相当于以往一个世纪。技术、教育、旅行和现代通信之间的相互作用彻底改变了时间和距离的含义，而且使主观范畴内的社会道德标准和客观范畴内的社会环境都发生着迅速的变化。

人类普遍共有的道德观影响着人类的抉择，但是人类物质力量的扩展和行使并不为这些抉择所左右。如果缺乏某种共有的哲学标准，不能赖以确定行使物质力量的抉择，获取和行使物质力量就变成了随意的行为，主要受自身利

益和眼前考虑驱使，受事物内在的逻辑推动。于是看来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人类解放，结果却变成了向历史力量的悲惨屈服，历史力量则受制于技术能力和哲学诡辩之间能动的相互作用。

这些大趋势直接影响到未来几十年的世界事态的形势。在一个使人感到受挫的社会事件频频发生、政治上被激活的世界里，如果不能在政治行为和应用政治价值观念两个方面朝着更合作和正义的全球体制取得切实的进展，即使不会很快受新的超凡神话的浸染，也会非常容易地发生大规模动乱。新的政治荒谬之事又可能一阵阵爆发。

在这种背景下，即使美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是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但它对全球的支配可能会失去权威。美国自身的力量不足以强制推行美国式的"世界新秩序"。同样重要的是，文化享乐主义倾向使美国更难与世界大多数人有共同语言，这些人感到自己被排斥在外，不能真正参与世界事务。因此，他们可能寻求某种有鼓动作用的思想和他们可以仿效的榜样，以便团结在这个榜样的周围，向全球现状发出全面的挑战。

无论如何，几乎可以肯定，世界的地缘政治形势将变得日益复杂。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新世界秩序，而是拥有权力和财富的国家将结成团伙以便更有力地与对手竞争，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财产。具体地说，这预示着将出现数个主要的国家组群，美国将把自己的力量渗透到这些组群中的某几个，但美国除了在自己所属的组群外，在其他组群内决定

其内部政策的能力可能会减弱。这些组群实际上既是政治联盟，又是互相竞争的区域性经济集团；而在某些情况下政治联盟（特别是出于安全目的与美国结成的联盟）可起到缓和经济竞争的作用。

全球各国家组群之间将在更互相依赖但仍不稳定的全球政治进程中互相共谋，互相合作，互相竞争。可能出现的这些组群包括：

1. 北美——由美国控制，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从而形成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集团，还可能导致加拿大逐渐与美国合并（或许在未来某个时间变成一个比较正式的北美邦联）。它的附属区是西半球的其他地区，古巴至迟在菲德尔·卡斯特罗死后将推翻其共产主义制度。

2. 欧洲——经济上可能实现一体化，但它的政治统一远远落后于经济一体化进程，因此面临着对付强大的德国的问题，同时鉴于共产主义后过渡时期形势继续不稳定，欧洲东部边界不断变化。它的附属区是东欧和非洲大部分地区。

3. 东亚——经济上由日本控制，但缺乏相应的政治和安全体系，因此潜在着出现地区紧张局势的可能性，特别是当中国开始施展其政治和经济力量，或许甚至异想天开地企图充当世界贫困国家的领袖时。它的附属区可能是前苏联远东地区，以及东南亚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4. 南亚——可能缺乏政治和经济的内聚力，但同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不受来自外部的严格控制，印度是区域

霸权国，在该区域部分地区称雄，但受到西部和西北部(包括中亚)伊斯兰国家的反对。

5. 不规则的穆斯林新月形区域——横跨北非、中东(以色列除外)，可能还有土耳其(特别是如果它遭到欧洲的排斥)，波斯湾国家和伊拉克，然后穿过伊朗和巴基斯坦向北包括中亚新成立的国家，一直到中国边境。它们有许多相同的愿望和愤恨(特别是对西方的愤恨)，但它易受外国来的入侵并继续缺乏任何真正的政治或经济内聚力。

6. 可能还有一个欧亚国家组群——这是一个地缘政治"黑洞"，受俄罗斯控制，这个组群的情况需要过一段时间才明朗；地域包括前苏联领土的大部分，与上面提到的欧洲、亚洲和伊斯兰组群有重迭，重迭部分不甚明确，有可能在重迭部分出现紧张关系。

由此可见，只有前面三个组群有政治和经济内聚力可言。余下的三个组群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是外来侵略和外来势力的对象，可能还是前三个主要组群之间争斗的战场。北美组群还可能最有内聚力，是唯一有明确而无争议领袖的组群。无疑地，这将有利于增强美国的力量，使美国更容易在几个其他组群中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美国将继续在欧洲发挥重要影响，虽然影响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朝着更深和更广的一体化所迈出的步伐。虽然一个更统一的欧洲不会希望与美国彻底分离，但是几乎可以断定，一个具有明确的政治认同感的欧洲将与美国分庭抗礼，即使它仍希望美国继续保持在欧洲的存

在——当然规模比以往有限得多。如果统一欧洲的努力动摇不定，欧洲就必然更专注于抑制德国的力量，同时还可能担心俄罗斯的长远意图。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可能易于接受美国某种间接形式的领导。

美国还可能继续在东亚组群中有影响，虽然同在欧洲的情况一样，影响程度在下降。首先，美国在 90 年代余下的几年里将继续在韩国和日本驻扎军队，这就必然使美国在该地区的事务中有重要发言权。其次，中国的兴起将给本地区带来重要的不稳定因素，特别是在本地区两个最雄心勃勃的大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方面。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显然希望美国在安全事务方面继续卷入，因此尽管该地区在全球经济中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这一组群同样继续受美国的影响。

最后，在整个 90 年代和进入下世纪时，美国几乎肯定继续是波斯湾/中东地区强权政治的最主要的仲裁者。反过来，这又使美国卷入第五个国家组群的内部问题，即缺乏内部凝聚力和最容易受外国入侵的一个组群内部的错综复杂问题。长远的危险是，美国会因此而长期卷入该地区几乎无穷无尽的纠纷之中，同时还会带来另外的危险，即与伊斯兰世界在文化和哲学方面出现危险的分歧；对伊斯兰世界的神权政治和原教旨主义倾向西方国家有所惧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又常常予以过份的诋毁。

西方应当明白，10 亿穆斯林对西方并不敬佩，他们认为西方在向他们宣扬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提倡不讲道德

的思想和鼓吹无神论的幸福。许多穆斯林认为，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启示是令人厌恶的。此外，试图把“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描绘成对西方的新的主要威胁——在这方面被说成是共产主义的后继者——未免过于简单化。从政治上说，并不是所有的伊斯兰信徒都是好斗的原教旨主义者——实际上只有为数很少的人才是；伊斯兰世界在政治上绝不是铁板一块。至于在哲学上，伊斯兰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反对西方对现代化的定义，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认为幅员非常辽阔——从黑人居住的西非，穿过阿拉伯人居住的北非和中东，延伸到伊朗和巴基斯坦，中亚和南亚，直到马来西亚和印尼——政治上极为分歧的穆斯林世界立刻就要对西方发动一场有核武器武装的圣战，那是没有充分根据的。美国如果根据这种看法采取行动，则无异于冒险作出一种美国本身促使其成为事实的预言。

在各组群之间和各组群内部也可能发生冲突。但是各组群之间的冲突很可能主要是经济性的。因此，如果欧洲实现了统一，特别是如果它的政策变得更有保护主义倾向，它可能在经济上成为美国的对手，就像一些美国人开始把日本看成美国的经济敌人一样。欧洲除了在全球经济问题上可能与美国发生碰撞外，现在已经对日本的贸易行为越来越敌视，欧洲和亚洲两个组群之间也可能随之发生冲突。最后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这就是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摩擦也可能加剧，从而在这两个组群内部产生一种闭关自守的心理倾向，就像许多人认为欧洲必然会出现的情况一样。

结果将是全球经济支离破碎。于是保护主义兴盛一时，蛊惑人心的民族主义宣传给保护主义火上加油。虽然互相竞争的各组群之间的政治冲突未必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但它对全球经济的增长最终将带来非常严重的破坏，更不用说发生军事冲突了。它对穷国的影响尤其严重，反过来这又加剧政治怨恨，使贫富之间的鸿沟变得更深。

然而，更大的可能性是，这样一种全然悲观念的态势不致成为现实。诚然，各经济大国之间的经济摩擦不能完全避免。这种摩擦是竞争和开放经济体制的一个内在方面。而且随着各国经济结束闭关锁国状态，出现一些主要的国家组群——它们并不等于水泼不进的经济集团——几乎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而且实际上也正在发生。但是这未必导致尖锐的冲突，而且各组群可能变成通向真正开放的世界贸易体制的踏脚石，前三个组群之间相对均衡的经济力量分布甚至促进某种程度的妥协和通融。

但是，某些组群内部的冲突可能在程度上更激烈，性质上更危险。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冲突甚至采取非常激烈的形式。只有第一个组群可能相对摆脱了这种危险。其他各个组群都在民族主义的激情、经济冲突、甚至领土争端方面积累很多问题，这些沉疴痼疾很容易复发。因此，把强权政治视为历史陈迹，只是一种时髦，现在还没达到那个阶段。

虽然冷战已经结束，美苏两极争权和与之相关的东西方意识形态冲突也已经成为过去，但某些传统的权力冲突

仍可能出现，此外又增加了新的社会和哲学挑战：

谁控制欧洲：是包括美国和一个较统一的欧洲的大西洋联盟，还是美国撤出后一个统一的、完全自力更生的欧洲，还是德国？

几乎必不可免的恢复——即使是部分地恢复——俄罗斯帝国的企图将如何发展？这对中欧和其他地区将产生什么影响？一旦发生不测事件，俄罗斯与欧洲（如果欧洲变得比较统一）或德国（如果欧洲不能统一）的关系如何？

随着日本和中国的力量与野心都不断增长，以及美国从该地区撤离，两国关系将如何发展？

如果美国在欧洲和/或远东的作用下降，它如何才能保持在中东的地位？

在欧洲，关键问题是欧洲一体化的速度和深度。即使欧洲的一体化持续不断地取得进展，民族间的恶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很强烈，同时在欧洲某些国家内，少数民族要求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甚至要求在大欧洲内享有国家主权。如果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明显地不能取得持续进展，那么除了引发新的冲突外，某些地缘政治问题也会重新爆发，而正是这些地缘政治问题使欧洲在本世纪遭受了灭顶之灾。德国的作用和动向就又会成为欧洲政治的中心问题。人们应当记住，在本世纪德国丧失领土最多，在一个动荡不定的欧洲，德国人对这一点的怨恨可能突然爆发出来，从而给德国的民主制度和区域稳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摆脱了共产主义统治的中欧国家的社会经济挫折将加剧这种危险，

更不用说柏林和莫斯科结成特殊关系的诱惑了。

在远东，日本和中国未来可能扮演的角色使该地区的形势令人难以逆料。这两个国家注定会成为该地区的占上导地位的强国，日本随着在全球更活跃，必然不再对美国毕恭毕敬，中国则不仅在该地区内，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事务的参与者。从现在来看，两国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尚不大，但是，即使双方保持最大的克制，两国之间也几乎不可避免地出现某种关系紧张和摩擦。与此同时，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特别与海上开采权有关的领土问题，可能还有中俄边界问题——可能在该地区产生其他冲突，把其他国家也牵扯进去。在这个迅速发展、日益繁荣，但政治上缺乏组织的地区，促使采取单方面行动的动因是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甚至也不是民族主义。

更可能爆发国家间冲突和内战的地区是南亚组群。它的部分地区位于预计发生暴力冲突的欧亚长椭圆形地带(已在第四部分讨论过)，此外，印度的野心可能引起邻国的忧虑。一些国家，如尼泊尔，依靠中国抑制印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巴基斯坦也是为此。另一些国家，如斯里兰卡，已经对印度干涉它的国内冲突表示反感。最后，印度本国多语言、多种族和多宗教的人口之间也会发生重大分歧。除了那些已证明是令人困恼的麻烦之外，企图闹分离的大有人在。

在横跨中东和欧亚大陆南部的伊斯兰新月形地区——危机圆孤——中，冲突和不稳定仍可能继续是最主要的现

实。不只是本地区觊觎霸主地位的国家会发起公开冲突，其中一些国家(如伊朗)不只受宗教狂热驱使，而且受强烈的帝国传统驱使，但也有若干国家缺乏任何真正的内部凝聚力，由前苏联分裂出来的新成立的中亚共和国尤其如此。在这些国家内部，对部落的忠诚仍比范围更广的民族认同感强烈。因此，种族暴力将继续扩散并周期性地爆发。而一心想控制阿拉伯的石油供应的西方大国蓄意挑起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长期不和，也将促使该地区一直稳定不下来。

最后，人们必须预计到，在属于前苏联的欧亚大陆地区，在混乱结束后会出现长期的局势紧张和间或爆发的公开冲突。谁也不能保证，俄罗斯将不企图重建旧帝国。不过任何这种企图都肯定会受到一切非俄罗斯国家的抵制，这可能抑制克里姆林宫公开推行帝国主义。但是由于一些新建立的非俄罗斯国家力量薄弱，在某种程度上重新确立俄罗斯的影响，甚至对它们的支配权是有可能的。这就可能出现某些新的结构：它仍委婉地叫做"联合体"，但在这个"联合体"内，是从莫斯科行使有效的政治权力。莫斯科与新"主权"共和国政府在 1992 年签订的某些协议，实际上等于建立了双层的独立国家联合体，一些国家——如乌克兰、摩尔多瓦和阿塞拜疆——继续坚持真正的独立，而另一些国家则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使它们的完全主权成为一纸空文的经济和军事关系体制。这反过来又会加剧那些的确希望维护新获得的民族自由的国家的忧虑。无论如何，俄罗斯的认同感危机不大可能以完全和平的方式解决。

因此，在整个90年代和进入下个世纪时，左右世界政治事务的将是主要属于区域性质的各种条件、历史和利害关系所引起的问题和冲突。世界的政治权力可能按照上面所讨论的几个国家组群分布，其中某些组群比另一些组群稳定和均一，美国则不仅直接控制着其中的一个组群，而且仍在很大程度上干预其他几个组群。但是，随着蛰伏至今日的各民族的政治觉醒发展成周期性出现的区域性暴力，即使美国的力量也不足以扑灭可能喷发出的烈火。

与政治上的这种错综复杂形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可预见到的未来，全世界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谈论可能出现令人惊奇的一致，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大多数政客都在口头上表示维护相同的真理，使用的语言也是相同的陈词滥调。极权主义挑战的失败，特别是共产主义模式的崩溃，使几乎所有全球的对话都大谈特谈民主理想，都讴歌和信誓旦旦地宣称忠于民主理想。只有十分偏激的集团敢于公开地蔑视或抵制民主。甚至专制主义政权现在也往往标榜自己是民主政权，不断地喊着民主口号。这种表达方面的一致，反映了对学说和主义热情的下降，是民主理想当前处于优势——让我重复一遍，是在口头上——无声的证明。

但是，如果把以上现象看成是民主制度的魅力在全世界大高涨，看成是民主制度向全世界显示了强大的持久力，那是错误的。如果把言辞上的千篇一律误认为是哲学上的观点一致，那就更是大错特错了。虽然“民主”观念现在很时髦，但是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民主的贯彻实施仍很表面，民

主制度仍很脆弱。对民主的真正含义全球尚无一致的理解，特别是在民主应在多大程度上越出政治范畴，应在多大程度上对个人的物质福利至少予以起码的保障等方面。在“自由市场”概念上，混乱甚至更为明显。当今“自由市场”概念也获得了胜利，“撒切尔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有名望。但是在世界许多地区，对它的内部运作的理解和它的主要文化动因的理解都是十分肤浅的。此外，除非民主的实施，特别是自由市场的经济作用导致社会条件的明显改善，否则对这些概念作出负面反应只是时间问题。

极权主义的超凡神话的惨重失败，以信条的名义所造成的异常大规模的死亡，以及目前人们在理智上对乌托邦的可行性普遍所持的怀疑态度，这一切使再次兴起自我毁灭性的政治浪潮，从而重演20世纪悲惨错误的可能性变得甚为渺茫。但是，在方式和内容方面使人想起法西斯行径的失去理性的发作，可能在世界的某些地区发生——民族认同感本能、民族激情、宗教信仰以及社会和种族怨恨结合在一起，使人类聚积的仇恨喷发出来，使人们卷入无可抑制的感情中。不仅在最穷国家的民众中有这种发作的潜在可能，西欧法西斯性质的光头党和其他发达国家中的相应组织也使人们认识到，甚至确立了民主制度的民主国家也在孕育着自己的抗体。但是，最强烈的爆发极可能发生在推翻极权主义统治后，以天真的热情憧憬民主然后又感到被出卖的那些国家。

因此，民主、稳定而富裕的西方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去改善全球状况，以减少发生这种政治倒退的可能性。这一点不容易做到，部分原因是西方对待世界大部分其他地区的态度。西方认为自己天生优越，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而且表现在政治成熟程度上。西方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政治言论大多反映了这种态度：把较不发达的国家看成是政治上原始，经济上落后、宗教上狂热。虽然这种感情可能不无道理，但也往往暴露出一副优越屈尊的和狭隘地域主义的态度，忽视了阻止其他社会沿着与西方相同的发展道路前进的历史和文化因素。此外，在那种态度中还有一种固有的看法，即历史发展是单线式的，模仿西方是其他地区的唯一积极选择。

西方对宗教的轻蔑也是这种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种轻蔑最明显地集中于伊斯兰教，但它也有普遍性。如N·J·迪米拉斯在《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刊》1991年夏季号“宗教和政治”专刊中所说：

> 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其他社会都将必不可免地要“进化”、“发展”或“现代化”。西方的自负情绪中以这一种最为顽固。西方知识界中这一观念的关键因素是现世化主旨。无论是称为神圣之物的非神秘化，神圣之物重要性的降低，还是称为神圣之物从社会中的隐退，这种过程都标志着一种文化变革，许多人认为这种变革是韦伯的理性化和涂尔干社会学理论的变异之类的基本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

说得更简单明白些，西方知识界当前对宗教的正统观念是，它是一种正在没落的、不合理性的和机能不良的畸变。

然而，实际上，宗教不但仍然存在，而且在发展中世界的某些地区又东山再起。除了天主教在非洲及亚洲发展新教徒和伊斯兰教的扩张外，传播福音和能激发人们效忠情绪的新教，其教徒人数也在增加，特别是在拉丁美洲以及近来在前苏联地区。然而，宗教的复兴往往伴随着神学思想的混乱，并缺乏始终如一的持久力，特别是传播福音各教派，因为它们依赖具有高度性格魅力的传教士个人。尽管如此，人们仍可看到这一重要事实：许多社会中道德力量的源泉是它们的国教，宗教表现出的衰落——特别是在较发达的国家——未必是人类进步的象征。

西方缺乏有约束力的道德责任感，这使它对不平等问题总是持消极态度，即使它不缺乏同情心的话。大规模的饥馑使每年有几十万人死亡，有些年份死亡人数甚至以百万计(如近来非洲的情况)，对这种情况西方的任何人都不能够再假装不了解，同样地，对西欧、北美和远东新富裕国家之外的为数众多的人口中可怕的贫困和疾病，他们也不可能再用一无所知作借口。在欧洲本身这一非常熟悉的环境里，对东欧兄弟为摆脱共产主义遗留给他们的苦难所进行的痛苦斗争，西欧也是漠不关心，表现得非常自私；可以说，在美国，许多人对城市中黑人的处境也基本上持这种态度。了解他人的苦难而又持消极态度，这种情况提出了一个令

人忧虑的道德问题（与生活在纳粹时代的德国人时常面临的问题一样令人不安，虽然无可否认还有些不同之处），对于这一问题，到一定时候西方或许不得不痛苦地作出回答。

与此同时，贫富之间生活质量的差异——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可能进一步扩大，一部分人不断地利用人类力量的发展满足自己的欲望，并进而提出更高的追求，另一部分人则仍在外部世界的威胁下为生存而挣扎。伊曼纽尔·康德曾把历史结局定义为，在“完全公正的公民体制”背景中实现人的自由，同时人类将实现自我。但是，康德没有预料到，也不可能预料到的是，人类将增强自己的能力，既为了物质的自我满足，又用于日益广泛的自我工程科学，从而使人的注意力从生活的外部——如与自然的斗争——转向生活的内部——如满足个人欲望（不只是需要），甚至任性的自我改变。西方极端盛行的整容术就是后一种现象的明显（虽然是表面的）例子。

因此，全人类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在世间人事中处于一个全新世纪的边缘。处于神秘莫测新世纪边缘的人类历史在哲学上的含义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它最终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的本质是什么？但是它眼下的实际含义也是复杂的。它预示着在世界观和人类本质两个方面潜在着对立，这不仅是前所未有，而且与我们这个时代中空间和时间的紧凑压缩形成尖锐的——的确可以说是反常的——冲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去世界显得那样辽阔广大，扬帆航行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需要数周甚至数月，而现在

只需要几个小时，通过电视全球可以瞬时知道所发生的事件，可是就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的自我理解而言，过去要比现在一致得多。虽然贫富之间、生活质量之间的巨大差距因全球异口同声地大谈民主而变得不那么明显，但是这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肯定会使世界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政治困境更难对付。

此外，必须认识到，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包括在最顺利的条件下，真正的全球性合作——这种合作也将有助于消除现存的差距——的进展，必然经历较长的阶段，必须一点一滴地实现，而且充其量也只能是部分的。尽管有诸如世界大同、全球正义或世界新秩序等口号，但是加强全球范围的实际合作，从而对历史变化动态实施某种程度的控制，将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充其量只能是稍稍比发生分崩离析和无理性的逃避现实学说的趋势领先一点而已。必须在政治和哲学两个方面明确地作出积极的反应，逐步改变世界的力量分布和文化道德观念。

然而，深受文化和哲学因素影响的全球政治困境是不可能通过几个特殊处方就迅速解决的。实际上，必须承认，指望复杂而根深蒂固的问题能够得到迅速的解决，这本身就是我们当前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因为当代社会的心态是深受意识形态期望和技术能力影响的。这导致了简单化的思想方法，对敏感的道德和态度问题往往采取回避的做法，企图简单地用硬性的教条或技术办法解决。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革除不了积弊。只有掀起一次新的历史浪潮，使

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变革，才会把积弊革除；实际上，它产生于一种漫长的文化自我重新审视和哲学的重新估价过程，这一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着西方和非西方世界的政治观。该过程可以通过开明的对话予以促进，但不能通过政治手段强制推行。

在任何这类过程中，西方都必须摒弃自己的偏狭态度，正视自己的文化弊病，这不仅因为它精神上的空虚使它缺乏同情心，而且因为西方消费主义社会产生了超出个人需要范围的追求自我满足的无穷无尽欲望，在全球范围内仿效是绝对行不通的。非西方世界也必须认识到，以没收或充公方式搞平均主义——在这个世界中，往往是腐败的掌权者十分伪善地竭力主张的——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它不仅使西方感到害怕，从而对他们持敌对态度，而且近年来共产党的经历表明，实行这种政策，就必然出现强制性贫困。大家都必须在当代世界里寻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一种更明确规定的平衡，特别是如果全球政治的宗旨被确定为逐步形成一个公共的全球大家庭，为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逐步提供平等的机会。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人类面临的问题极其困难艰巨，不是靠传统的国际事务单位，即民族国家，所能解决得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不再有用，也不意味着人们应寻求建立一个超国家卡特尔世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民族国家仍是公民效忠的基本中心，历史和文化多样性的基本源泉，是动员个人献身的基本力量。然而，今日之世界要实现

全球和平，要促进全球福利，要在全球普及科学和技术成果，要对付全球环境问题，则不能仅仅依靠民族国家。欲更有效和更合理地完成这些任务，应鼓励各民族国家在一个较大的社会背景中进行合作，这个较大的社会应反映把各民族国家联结在一起的问题，化解一直使它们分裂的问题。

因此，为促使逐步实现这样一个公共的全球大家庭，需要沿着两个主轴发展新型的合作：一是欧、美和东亚(主要是日本)在世界上最富的民主国家间的三边关系；二是通过联合国并使之成为全球政治的更广泛和更有代表性的体系。这不仅需要重新规定美国在全世界的作用，而且需要欧洲和日本有更广阔的视野；它还需要着意加强联合国的政治作用，即使在某种程度上要牺牲目前居于支配地位的一些国家的单方面权力。

为了促使发达富裕世界更广泛地意识到对和平与和平变革所负的共同责任，需要在三边关系范围之内逐步重新分配责任。只要那种责任主要由美国一国履行，不论履行得多么不完善，欧洲和日本都会感到只要不直接涉及其民族利益，它们就没有责任承担政治和道德义务。那种自我免除责任的做法强化了它们的偏狭情绪，即使它激化了美国对负担分配不公的反感，分散了美国的力量，促使美国公众产生逃避现实的孤立主义情绪。

因此，如果三方合作要进一步加强，三方中的每一方都需要改变自己的主要心态。美国需要抑制自己的传教士般的冲动，承认自己的力量有限；日本需要放弃它在世界贸易

中的垄断倾向，制约它在高技术方面的野心；欧洲则不能只顾自己，要乐意多承担一些欧洲范围之外的义务，特别是在为使某些前共产党国家与欧洲同化方面的义务。

实际上，把真正均衡的三方合作的概念变成政治现实必然意味着美国把某些权力转移给欧洲和日本。在财政和经济问题上，这种权力转移已经发生。美国被迫更多地尊重它们的意见，特别是日本和德国的意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欧洲和日本要在日益加强合作的全球政治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话，它们也应在更大程度上参与政治和安全决策。美国必然不愿事态朝这个方向发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没有这种权力的转移，三方合作就会继续不平衡，美国单方面的干涉主义恰好使注重私利的欧洲和日本偏狭主义继续下去。

三方合作的中心目标不应只是维护现有特权，而是应当促进人类生活条件的基本进步。这一更宏伟的目标除了要求三方改变各自的心态外，还要求在每一方的内部发生重大变革，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内部。美国现在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是，世界上起带头作用的国家。欧洲也是如此（虽然程度差一些），特别是鉴于法国和英国的文化继续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世界很多国家在展望自己的未来时，都是特别以美国作为尺度，这一事实给美国赋予了特殊的责任，要求它在本国的社会道德和文化方面推行改革，从而为其他国家树立良好的榜样。如果美国伦理标准的实质是一味追求纵欲享乐，同时绝对数量甚众而贫穷的少数人又被

排除在有意义的社会参与之外，那么美国社会是不能成为世界各国之楷模的，无论是在道德方面，还是就实际的经济而言。汲汲于满足越来越无度的物质欲望，只会进一步加深已在分裂人类的主观与客观之间的鸿沟。

至于欧洲要在世界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特别是要与美国并驾齐驱，关键性的先决条件是继续实现统一。只有欧洲更趋向统一——一个统一欧洲的幅员本身就足以使欧洲成为世界上一个真正的大国——才有可能使欧洲放眼世界。做不到这一点，欧洲将有风险，重提宿怨和自私地只顾忙于内部问题，又像过去那样对德国的力量心存疑惧。所以促进欧洲的真正统一是符合整个世界的根本利益的。只有统一的欧洲才能胜任参与建立全球社会的重任，也只有统一的欧洲才会愿意承担这一重任。

因此，美国的更新和欧洲的统一是建立对全球更负责的、在历史上更有效的三方关系的两个基本前提。在这方面，日本必须紧紧跟上，与两个西方伙伴一起执行一种在促进社会变革的同时保持政治稳定的全球政策。日本像欧洲一样，也失之于目光短浅，这强化了它的自私心理，但它又与欧洲不同：它是一个单一民族社会，因此在更新的美国和更统一的欧洲两个榜样的带动下，在来自这两个方面的压力下，它的民族利益意识会比较容易地转向对全球更广泛问题的关心。

这种顺应历史潮流的三方合作还有助于向联合国组织灌输一种更积极的方向感。联合国发挥作用的时代终于到

来了。只有在联合国的框架内才有可能集体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在未来的几年内，需要对联合国进行改革，以使其结构更符合全球力量之现实。如前所述，在近期内不大可能增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数量，因为这种增加将危及现在握有否决权的五大常任理事国的特殊地位。然而有可能达成这样一种扩大安理会的方案：设置一种新类型的成员国，这些成员国只占有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而无否决权。这种安排可能易为人们所接受，从而为增加日本、德国、印度、尼日利亚和巴西敞开大门——同时这也满足了需要一些非西方大国在管理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

1992 年联合国成功地在柬埔寨发起了一次重要的维持和平行动，为索马里的人道主义使命——虽然主要是由美国执行——提供了合法依据，这种事实或许使人们有理由对联合国发起的国际维持和平行动的前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但是，联合国和欧洲共同体对前南斯拉夫的流血冲突长期拿不出对策，这又提醒人们，民族恐惧、怀疑和自私仍严重碍障着这种国际合作的发展。此外，不能低估这种可能性：用不了太久，走向更广泛合作的进程可能被联合国的否决票打断，投否决票的不是俄罗斯政府就是中国政府，它们在某个时刻可能受权力野心的驱使，使联合国不再在西方的领导下保持一致的声音。

这就是为什么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可能主要体现在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而政治性又较弱的领域，诸如确保地球的

适宜人类居住性，环境立法，对人口政策世界各国达成一致意见，以及促使海外发展援助流向穷国。当前的时髦说法是，这些问题是世界的新主题，代替了以往的权力之争。实际上，在全球可能出现的几个国家组群内部及各组群之间的安全威胁依然存在，仍将是全球安定的主要危险。前面提到的新问题不会取代传统的老问题，而是与老问题共存，从而使全球的议事日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

由于全球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为解决新问题所做的努力必然见效极慢。尽管如此，人们仍可以期望国际合作会逐步加强。虽然分歧在全球普遍存在，但是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世界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一种共同命运感在全球萌生，并渐渐成熟。这种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抵销了全球范围内人们观点的极化倾向，至少为采取某些有限的联合行动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生态问题上。

通过合作方式，在逐步地而不是猛烈地改变现状中获取了既得利益的人数不断增加，这也促使联合国的作用不断加强。最广义地说，全世界的人口可以分为两大类：富人和穷人。他们生活在两种相异的文化之中，富人属于少数，穷人属于多数。到本世纪末，富人的数量可能到达 10 亿左右，穷人则约为 50 亿之众。但是这 50 亿穷人也在不断分化，其中可能有 10 亿人在过去的 20 年中由于经济发展，物质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因此，改革和加强合作的政策与他们的利害关系会更加息息相关。仅此一点或许并不足以填补两类人之间存在的哲学和物质生活方面的鸿沟，即消除

多数人对养尊处优的少数人的愤懑不平的情绪，但是它有可能减轻联合国所遇到的危险，使联合国不致因为互相敌对的联盟之间发生由失去理性的脱离现实的新思潮所左右的斗争而瘫痪。

然而，归根结蒂，控制人类共同命运之努力的成败取决于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哲学和(或)文化规模，正是它形成了指导政治行为的重要观念和思想。就西方仍是全世界社会进步和政治民主化的先驱而言，它需要经历一场艰难的哲学和文化上的重新定向。当前真正全球性的政治进程正使世界各国携手决定人类之未来成为可能，值此从未有过的大好时机，万万不可使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精神危机使西方对世界事务发挥积极影响之潜能受到损害，或使这种潜能丧失。

这里把前面提到的一点再重复一遍：文化和哲学变革是一次次历史浪潮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互不相干的政治决策所致。伦理道德意识的加强可以影响这种变革，但这种变革不可用政治手段来左右。变革只能来自对指导社会行为的核心信仰从根本上进行重新估价，来自人们意识到对幸福生活的含义需要全球有共同的认识，同时后者必须建立在社会自我满足方面的自我抑制之基础上。西方的生态保护运动有可能成为走向这种自我抑制的第一步，不论对这一运动的某些具体主张人们的意见如何。这一点可能最终变成该运动最大的哲学贡献，由此导引出更广泛地接受克己的原则，并以此作为形成全球共同道德观的起点。

任何这种道德观的一致都必须出于这种认识：人类对自己命运的控制既需要一种平衡感，又需要一种道德指南。在控制的具体实施中必须充分意识到所作出的选择之后果，无论是在实际效果方面还是在道德方面；这也意味着需要自觉地自我抑制。有能力改变环境、在基因方面能改变自己，因为有更多的东西可供消费从而就消费得更多，或者能增强进行大规模破坏之能力，这些都不是实施控制，如果是人类在这些方面凭能力的增长自然而然地成为导致人类去实际这样干的主要动因的话。取代全面控制的办法不是实行最低限度的控制，更不是不要任何自我约束，放任自流，而是一种公众自我控制，这种控制产生于对是非标准的某些自我约束性的公众共识。

自我克制的原则必须应用于当代世界政治性质发生变化的所有四个方面。首先，必须应用于物质力量，而物质力量还得通过国际协议和自愿遵守的道德法典有意识地加以限制，因为物质力量既可以直接毁灭全人类，也可以通过盲目地利用环境和人类的自我改变而间接地毁灭全人类。其次，必须应用于政治激进主义活动，这些活动必须在明确的人人都需遵守的宪法框架内进行，否则寻求有意义的政治参与就会蜕变成蛊惑人心的鼓动，使社会变得越来越无法管理。第三，必须应用于个人期望，因为少数人的纵欲无度将不仅加剧全球的不平等，而且将使纵欲者和被剥夺者的道德风尚全面堕落。第四，必须应用于社会变革，特别是要强化教育，反复向公众灌输这种思想：不能仅仅因为新奇精

巧的东西和新技术不断涌现而改变了社会生活的外观，就放弃持久的价值观念。归根结蒂，以上四个方面意味着人类应当尊重指导原则而不囿于当前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宗教当局主张需要强化道德意识，善于思考的政治领导人物也持这种态度。甚至失望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家也开始认识到不能只根据物质标准判定生活的意义。例如，前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的亲密同事亚历山大·雅可夫列夫 1991 年曾向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在谈到人类的选择时，他说：

> 社会抉择是以对社会发展质量的选择为前提的，同样地，也是以对通过新社会关系自然进程所形成的人类潜能质量的选择为前提的。但是，我们所说的新的社会质量还是指什么呢？是指政治制度？是指经济效能？是指科学成就？还是指财富？
>
> 统统都不是，新的社会质量是指提高人的道德。（着重号是原来就有的）

雅可夫列夫的结论是约翰·保罗二世教皇讲话的有力共鸣。保罗二世教皇在"教皇百年圣谕"中铿锵有力地宣称：

> 从本质上讲，经济制度并不是标准，它不能正确地

把更新更高的满足人们需要的形式与妨碍形成成熟人格的人为的新需要区别开来……因此，需要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对真、善、美的追求和为共同发展而与他人团结契合是决定消费选择、积累和投资的因素。甚至决定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在另一个地方、在这个生产部门而不是在另一个生产部门投资，也总是一种道德和文化选择。

道德准则最终必须来自内心。由法国大革命开始的现代强调所谓客观真理的确实无疑性，而对主观性嗤之以鼻，斥之为缺乏理性。这种型式的政治思想最极端的表现形式——极权主义的超凡神话——之失败，使时髦的后现代思想在最近几年转向另一个极端：知识分子原先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顶礼膜拜，奉为“客观真理”之大成，而现在发生了 180 度的大转弯，彻底转向相对主义。但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相对主义都不能给一个政治上觉醒和活跃的世界提供框架。不能用毫无控制的不讲是非道德的混乱状态代替全面的控制。

*如果人类要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克服全球精神危机。*这种自我控制命运的起点必须是人们意识到，无论是在客观上还是在主观上，社会生活都太错综复杂，不能周期性地按照乌托邦的蓝图重新设计。认为所谓客观真理确定无疑的现代教条主义必须让位于这种认识：不确定性是人类状况的内在属性。在一个狂热自信的世界里，可以把道



志　谢

本书中所阐述的思想是我在政府任职期间形成，经我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修改完善，并在我到世界各地实地考察后加以充实的。在此过程中，我日益深切地感到公共哲学、政治信仰和国际事务三者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这种关系看来捉模不定，但却极为重要和关键。所以本书不仅涉及了这三个领域，而且与分析全球变革的一般著述不同，强调了这三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令人欣慰的是，我能够把我的思想和盘托出给设在首都华盛顿的战略与研究中心的同事们，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兹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同事和学生们，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评论验证、切磋琢磨。承蒙他们在学术方面给予帮助，谨致谢忱。

然而，最早评论这部著作的是我的妻子穆斯卡，她发表了极其重要的意见。她使我充满信心地阐述有争议的见解，但也迫使我重新考虑某些武断的假设。本书的编辑罗伯特·斯图尔特不仅使我的阐述更为清楚，而且劝说我把主要论点提得更明确。两人都对我有极大帮助。我的代理人利昂娜·谢克特不仅在安排本书出版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

用，而且在成书过程中不出断给我以鼓励，对书的内容提出了宝贵建议。

我的办公室主任特鲁迪·维尔纳一如既往，把我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使我能够坚持完成本书，同时又不影响安排得满满的旅行、咨询、演讲和教学等日程。在罗伯特·阿迪赫、约翰尼斯·博赫南、格罗·维尔希廷、拉伊莫·卡西克和巴尔巴拉·扎莱斯基等人的协助下，佩奇·沙利文进行了协调工作，并直接参与了一些章节的研究工作。他们通过背景文件，充实了我的历史知识，并搜集汇总了本书中所用的某些事实材料。对他们我都表示衷心的感谢。

附 录

美英重要报刊对本书书评摘要

一

1993 年 4 月 4 日《纽约时报》,题《世界的前途未卜》(作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世界政策研究所高级顾问〕):

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说,在 20 世纪内,有 1.67 亿多人"由于政治原因的屠杀被蓄意地消灭"。正如其令人心颤的新作的书名——《失去控制:21 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 所示,布热津斯基认为杀戮并未结束。

他的看法几乎肯定无疑是正确的。核武器的持续扩散,憎怨仇恨情绪的蔓延,全世界的贫富悬殊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工业化,这一切都正在埋下新的冲突的种子——这种冲突的残酷性和可怕程度,可能至少不亚于使目前行将结束的悲剧性的本世纪备受玷污的任何一次战争和

罪行。

布热津斯基的这本书——从思想和政治史的角度对冷战后的世界形势作了权威性的概述——是一部佳作，它有力地驳斥了弗朗西斯·福山所著《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类》一书的观点。福山在他的书中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已经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目前将进而建立一个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布热津斯基的不同看法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福山之辈的乐观主义者过低地估计了前共产主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动荡因素的力量；其二，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西方自由社会会按其许诺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富裕和和平的能力。不同于福山之流的乐观主义者，布热津斯基还对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的工业发展的影响，提出了最重要的真知灼见。

至于前苏联，布热津斯基——尽管为他的故乡波兰等国的休克疗法取得成功而欢呼——毫不指望目前的政策会给俄国及其不幸的邻国带来民主或稳定。这里，他再一次洞察到很多分析人员视而不见的严酷的现实。这本书并非对我们所想要的未来前途提供指南，而是说明我们可能会面临的前途。

布热津斯基对出现的新世界形势中的诸多外交政策问题的分析，饶有兴趣，有时分析得非常出色。他对德国问题、中国问题和日本问题侃侃而谈，而他的见解将对外交政策的讨论产生重大的影响。

说也奇怪，作者对美国的分析可能是本书的最不足之

处。布热津斯基认为，消费的民主国家缺少赢得世界人心的精神力量。但他忽视了美国的潜在力量，这种力量能使美国的一些东西变得富有活力，甚至可能变得非常强有力，决不像他所认为和哀叹的没有价值观念、纵欲无度的现世社会的那种情景。这种潜在的力量还能使美国人起而迎接挑战——即便这些挑战非常严峻和可怕，像布热津斯基在这本内容有所参差不齐但总的说来是精辟透彻和扣人心弦的书中，如此清晰地所见和大声疾呼的那样。

二

1993 年 4 月 21 日《华尔街日报》，题《21 世纪的全球混乱》(作者：保罗·沃尔福威茨)：

冷战的结束使人产生了如下希望："世界新秩序"可以建立了。国际上的冲突将通过一种以美国和联合国为首的新的国际共识来加以控制。与此同时，苏联共产党的垮台还给西方带来了一种胜利的感觉：我们长期的意识形态上对手的失败显然已把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确立为优越的制度。

布热津斯基在对这种新的国际制度作出完全新的评价时驳斥了这两种想法。这本书的书名非常明确地陈述了他的理论：《失去控制：21 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

布热津斯基作为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是"彻底搞清楚了"苏联实验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在《失去控制》一书中，他提出了这样的论点：苏联和东欧企图建立一个"强制

性的乌托邦"的尝试，由于未能满足人们物质上的需要而失败了，他们在道义上夸夸其谈的不真实的主张又加剧了这一失败。

但是，布热津斯基更担心的是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他预见到，在那里最终将出现"丰饶中的纵欲无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只追求个人意愿，既不考虑任何更大的社会利益，又不考虑以宗教或道德为基础来分清是非。他认为，精神上的空虚已经削弱了美国的内聚力和这个国家成为领导者或者"起催化作用的国家"的能力。

布热津斯基列出了美国社会的 20 个缺点，或者说"困境"——从储蓄率低和生产率增长速度慢到"由视觉媒介造成的道德上的腐败大规模蔓延"。为了使美国恢复在全球发挥持续的领导作用的权威，就必须纠正这些缺点。解决这些问题中的大部分将需要明显改变美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去除物质第一主义的自我放纵(布热津斯基把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电视)，重新重视家庭联系和"产生持久的原则"。

另一方面，中国由于其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有能力反对美国——欧洲——日本三方联盟的现状而成为世界上较穷国家的领导者。布热津斯基认为，中国也许会设法结成自己的"三方联盟"，即同伊朗和俄罗斯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块强大的磁石。吸引其他一些对世界现状感到不满的国家。

显然，布热津斯基并没有从大胆的判断上退缩。他暗示对继续保持某种形式的美国、欧洲和日本三边联盟(虽然不

是目前流行的模式)感到乐观。从他所说明的理由来看,他的乐观态度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他认为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比较有说服力的是,布热津斯基对于俄罗斯南方边境处于建国初期的30个国家当中爆发的"暴力漩涡"的观点。俄罗斯可能转向同西方进行合作以对付这些威胁,尤其是如果它担心出现一个敌对的中国的话。

诚然,无论俄罗斯走哪条路,其他一些新的民主国家几乎肯定会转向西方,主要是转向美国而不是转向欧洲,以便在一个不安全的世界上感到放心。眼下人们比较关心的是这样一种前景:布热津斯基所看到的西方价值观念的危机,会削弱美国自己想在国际上发挥起稳定作用的意愿。

布热津斯基相信,美国也许能够用"哲学上的反省和文化上的自我批判"来解决他所指出的深刻问题。他还认为,在决定未来方面,价值观念和信仰与技术和经济一样重要。

三

1993年7月31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书评题《西方的没落——丰饶中的纵欲无度》:

一位不祥的厄运预言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警告西方说,它必须亡羊补牢,否则将面临一个混沌的未来。他把世界描绘成是一架依靠自动驾驶仪飞行的飞机,速度连续不断地加快,但没有明确的目的地。由于缺乏道德品

质和哲学素养，唯一现有的驾驶员——仍然是非美国莫属——迅速地每况愈下，越来越不称职了。

曾经担任过吉米·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是一位杰出的国际问题的学者。但是，他的最新的一本书，内容相当奇特。尽管它不乏有关的信息和闪耀着敏锐的观察力，但它的中心主题是深深地哀痛其同胞们的贪婪和自私，并对西方缺乏自我克制而无限悲伤。

他在开篇中以较传统的方式回顾了目前行将终了的本世纪的"有组织的疯狂"。布热津斯基把在战争中或被极权主义的种族灭绝所杀害者的可憎的统计数字统统加起来，达到了近1.7亿人之多。他写道，人类"设法利用神明而又被投入它自己所制造的大灾变之中"。而这本书的基调同样是极端悲观的。

他认为，人们试图在惊恐不安的尘世间建立他们自己设计的天堂，这样的"强制性的乌托邦"正被"丰饶中的纵欲无度"所取代。不是控制得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布热津斯基说，自由资本主义（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中为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额手称贺）经不住考验；极权主义的垮台并不等于民主的胜利。他重复索尔仁尼琴的观点，认为他周围的世界是一片充满着无节制的享乐主义的精神荒漠。自我放纵的发达国家远不能领导一个革新的世界，它们一心迷恋着要迅速满足自己的欲望和要求：物质的、官感的和性欲的渴求。

他反对所有这些可怕的事态的最有说服力的论点是，

贪婪成性已使富裕的少数人对贫苦大众的痛苦视若无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仍在为生存的根本之计而斗争。只顾自己享乐的富人不能借口对大规模的饥饿或周围的贫困世界不知情，而无动于衷，不予救助。布热津斯基提到了在纳粹时期深知不幸而又消极顺从的善良的德国人。他没有展开论述，但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论点。

布热津斯基痛斥的事情很广泛。他痛斥的一些目标是道德家抨击的对象。他哀叹核心家庭的消逝。他把文化弊端部分地归罪于电视，指出一个美国主妇(谁是她呢?)醒着的 1/4 时间是花在看电视上。其他的痛斥对象就更怪了。他严厉地贬斥对自然本性的改变，对使人们可以自我改变或控制自己命运的生物技术和遗传工程表示深切的疑虑。在他看来，自我改变乃是自我满足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他认为，缺少具有约束力的必须履行的道德责任使美国胜任不了领导世界其他地区的重任。但有谁能胜任？答复是别无他人。他审视了日本、欧洲和中国的情况，而又不再考虑它们的挑战，至少在不久的将来。

雄踞于世界之颠、没有真正对手的美国是举世无双的。挑战来自内部，来自美国的文化，它使国内的道德沦丧，对外部世界则进行“诱惑、腐化和异化”。他认为，尽管美国拥有担当领导的所有物质的和某些政治的素质，但美国的影响作用因没有道德内容而损害了它的领导作用。历史的教导是，一个超级大国保持不了它的主导地位，除非它能发挥具有世界意义的启示作用；罗马和不列颠帝国的崩溃被援

引来支持其论点。

但是，布热津斯基自己给人的启示又有多少意义呢？贪婪成性令人厌恶，但它不是对美国怨声载道的根本原因。显而易见，这个国家正面临着种种复杂的领导问题。克林顿总统已把外交事务搞得乱糟糟：他的政府在作威作福和相互依存之间不安地徘徊犹豫，并使其他国家愤怒不满。但是，没有人会同意布热津斯基的观点，即麻烦的根源该是某种骨子里的道德堕落——或者说，像他指出的那样，解决的办法就在于作“长期的文化上的自我检查和哲学上的重新评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会对他欢呼——而他们会这样做的，难道不会吗？

不成熟的伙伴关系

——布热津斯基在本书出版后发表的一篇
关于美国对俄罗斯大战略的重要论文
〔原文载于美国《外交》双月刊杂志
1994 年 3～4 月号第 67～82 页〕

美国和俄国

美国在近乎 45 年的艰苦岁月里对苏联采取了一项始终如一的政策。在大战略的层次上，这项政策被界定为遏制苏联在地缘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野心。切实可行地履行这项遏制政策使美国在地缘战略上集中力量，承担起保卫欧亚大陆东西周边的任务，表现为长期的部署军队，并确定地负起具有约束力的条约的承诺。旨在消除苏联核讹诈的威慑理论也加强了这一防御的态势。

尽管冷战从没有升级到美苏之间的直接的战争，但有几次确曾引起间接的军事对抗。在欧亚大陆的西端，美苏军队曾两度在柏林相互对峙；在东边，美国军队击退了苏联所支持的对南韩的入侵；而后来苏联则向越南提供了赶走美

国军队所需的军事设备。由于苏联竭力要摆脱对它的战略遏制，双方在古巴曾濒临直接的冲突。不过，遏制——它反过来使德国和日本举足轻重地并入西方阵营成为可能——主要靠的是力量的因素。

苏联的崩溃和随后冷战的终结使得制订一种新战略成为必要，该战略将不再把俄国视为敌人，而且力量的因素也不再是该战略的核心。但是，如果俄国不再是敌人，那么，它是不是已成为一个盟国，或是一个附庸国，还仅仅是一个被打败的敌人？冷战后对俄罗斯这个大国的大战略的目标和内容应当是什么？尽管这个大国目前境况欠佳，但它无论如何都注定要在世界事务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现行的对俄政策是否建立在一项经过深思熟虑而制订的大战略基础上，而且从历史的角度看，这项大战略又与冷战年代的大战略同样正确呢？

本文的论点是，美国目前的大战略对一些假设是有缺陷的，其战略目标是错误的，其可能造成的地缘政治后果是危险的。

一项理想主义的乐观政策

经过几年不可避免的摸索——这期间，华盛顿看来主要是集中力量对两位相继受宠的克里姆林的领导人进行战术上的帮助——之后，在克林顿总统领导下，美国对前苏联的一项新的大战略终于形成。这次大战略雄心勃勃，具有内

在一贯性的特点，并以诱人的理想主义的乐观情绪为动力。它的精髓可以概括如下：将同民主的俄罗斯建立一种伙伴关系，以此来取代遏制苏联扩张的目标。这一建立伙伴关系的战略最优先要做的事情是援助叶利钦总统的政府，与此同时通过强调美俄两国共同肩负的全球特殊责任来增强这个政府的自尊和信心。因此，就前苏联地区而言，美国政策的主要重点是俄罗斯。

这项新的大战略的基本前提和相互加强的前提是，一个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稳定和持久的俄罗斯民主制国家出现的可能性相当大，因此，上述情况使俄美建立伙伴关系成为可行。在这方面，全面支持真正的民主制俄罗斯的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具有合乎逻辑的战术上的必然性，尽管他作为民主的领导人在其表现中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

这种支持将以有意的乐观方式充分表现出来，以便激励美国公众支持对俄罗斯作财政援助，并在受困扰的俄罗斯民主派中树立迫切需要的信心。因此，克林顿总统甚至不顾与民主背道而驰的文本内容，把新的俄罗斯宪法奉为宪法民主的一个范例，同时，美国政府则把右翼和左翼极端分子的大规模的反民主投票(加在一起约占所投选票的半数)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只不过是反对俄罗斯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抗议性投票"罢了。在 1994 年 1 月的最高级会议中，克林顿对俄罗斯的民主进程一再表示满意。

对这个国家的经济转型作出乐观的评价乃是这种态度

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于是，政府发言人大谈俄罗斯的所谓的大规模的私有化，即便大多数的重大的国内工业私有化基本上是在名义上把所有权转给企业的管理部门，有时也转让给企业的职工，而中央政府的采购和补贴并未改变。一直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即在俄罗斯出现的资本家阶级是彻头彻尾的寄生虫，它总是把它的利润存放在国外而不对俄罗斯的前途打赌，结果，俄罗斯各银行对国内发展仅仅投资约 4.5 亿美元，而在国外存款则达到约 155 亿美元。同样也忽视了有相当大部分的外国财政援助被暗中转移到西方的银行中，因为这被认为与保持经济转型的势头的主要目标相比是无足轻重的。①

此外，为俄罗斯的经济稳定和最终转型提供的援助所占的位置比对新的非俄罗斯国家的援助所占的位置要重要得多。1992 年，国际货币基金会总裁预测俄罗斯所需的国外财政援助约 230 亿美元，非俄罗斯国家约需 200 亿美元。1993 年 7 月，七国工业国家集团首脑会议上，美国成功地取得了集体的保证：为俄罗斯提供 280 亿美元的援助，而对非俄罗斯国家基本上置之不理。

对俄罗斯前景在政治和经济上始终乐观的估计广为传播也是有意的，为的是加速谋求一个较为具体的和公认是重要的美国目标：俄美两国的核裁军。一项以俄罗斯为中心

① 详见 1993 年 11 月 1 日《金融时报》有关俄罗斯银行存款的报道，以及 1993 年 7 月 28 日《纽约时报》上格里戈里·雅弗林斯基的题为《西方的援助无济于事》的文章。

的政策不仅有利于缩小俄罗斯的核武库，而且也可能会增加俄罗斯自己同核不扩散之间的利害关系。为达到这一目标还需要与莫斯科密切协同对苏联解体后的新国家——特别是乌克兰——施加共同的压力，以便使它们放弃它们的核武器。有些美国战略家走得更远，主张协调美俄防务政策。所有这些问题在一月份莫斯科最高级会议后发表的公报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这些思想所阐述的观点是，俄罗斯主要的地缘战略问题是谋求地区稳定。这使俄罗斯和美国的目标基本上能协调一致。此外，因为俄罗斯是在前苏联境内唯一能起稳定作用的国家，还因为某些新国家的独立正在加剧地区性的冲突，从而加强了俄罗斯所承担的实现和平的角色。因此，在1月份的最高级会议上的克林顿-叶利钦的联合公报中，对俄罗斯解释它在"邻近的外国"执行"维持和平"任务一事，并没有提出异议。克林顿总统还进一步对俄罗斯人民说，俄军队不仅"有助于稳定"格鲁吉亚的政治局势，甚至还补充说，"你们很可能会被卷入靠近你们的这些地区中，正如美国在过去几年中曾被卷入靠近我们的巴拿马和格林纳达一样。"

由此可见，对于像乌克兰或格鲁吉亚这些国家所表示的有关所谓的俄罗斯威胁的担心，不必过于认真看待，这一点政府要员已经说得够多的了。无论如何，乌克兰人应当把他们在国际上的孤立和产生的易受攻击的感觉，归因于他们自己在核武器问题上不肯妥协让步。对其他的非俄罗斯

国家最好是劝它们避免引起过分的民族主义和促进它们自己同莫斯科妥协，从而减轻华盛顿的过分的负担或难堪的良心责备。克林顿总统访问白俄罗斯——一个越来越回归到克里姆林控制之下的国家——已加深了美国政府称颂莫斯科的“维持和平”角色的印象。①

最后而又重要的一点是，美国认为处于民主化进程中的俄罗斯理所当然地既怕受排斥又怕遭孤立，因此，它反对北约组织向东扩张来填补中欧的真空，也是可以理解的。于是，一个松散的北约主持的协作体制——和平伙伴关系——是对所有欧洲国家敞开大门的，从而可以平息俄罗斯对北约大门只向特定的少数几个国家敞开和接纳它们为成员的做法的不满。为了保持持久的美俄和解，美国政府认为，即便付出这种代价也是值得的。

无可否认，这一目标是宏伟的，这一信念是迷人的。但是，这种倾心致力的双边伙伴关系中所固有的历史性的乐观主义，包括它的前提和它的中心目标，是不是有稳固的基础呢？

帝国的冲动

不幸的是，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建立稳定的俄罗斯民

① 例如，克林顿总统同意降低他计划中在库罗帕蒂森林的白俄罗斯民族圣地向斯大林统治下的受害者致敬的规格，因为明斯克的亲莫斯科派的领导人提出了异议。

主国家的近期前景欠佳。俄罗斯军队越来越大的政治影响，特别是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影响令人不安。叶利钦总统的极权主义倾向使得建立民主俄罗斯的新宪法变成一份能够轻易用来使个人独裁合法化的文件。俄罗斯的政治文化远远没有把折中原则作为政治议论的基础。与此同时，持续的经济危机使群众与民主进程和自由市场都疏远了。各民主政党并不控制着新当选的杜马，这也是令人担忧的。

使事情变得更糟的是，俄罗斯政治中一个占据核心地位的、由来已久的问题。这个问题引起了多数政治家和公民的最大激情。这个问题就是："俄罗斯是什么样的国家？"俄罗斯首先是一个民族国家，还是一个多民族帝国？民意测验的数据表明，在大约 2/3 的俄罗斯人乃至大多数民主派政治家看来，苏联的解体是一个悲剧性错误，是一件必须用某种办法来纠正的事情。但是，任何试图重新创造某种形式的帝国，压制非俄罗斯族人民觉醒的民族愿望的努力，都肯定会同巩固俄罗斯国内民主的努力发生直接矛盾。这里的基本问题是一句简单而令人信服的格言：俄罗斯可能要么是一个帝国，要么是一个民主国家，但不能两者都是。

非俄罗斯族人不再在政治上消极，也不再没有民族意识。他们的民族主义活生生地表现为建立独立国家的强烈愿望。对它进行压制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新兴俄罗斯民主制度的结构和实质。此外，试图采用强迫手段和经济补贴的办法来重新缔造和维持帝国的努力，将迫使俄罗斯不仅出现独裁统治，而且遭受贫困。

令人遗憾的是，要求建立帝国的冲动情绪仍然强烈，甚至似乎有增无减。尤其麻烦的是，俄罗斯军方在维持或恢复原来的苏维埃帝国的努力中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专断行为。军方在摩尔多瓦、克里米亚、奥塞梯、阿布哈兹、格鲁吉亚和塔吉克斯坦等地的独断专行，以及军方反对在千岛群岛领土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反对俄罗斯削减在加里宁格勒地区的兵力和反对立刻从所有波罗的海共和国撤军，这一切使得前帝国边缘地带的飞地保留下来。（如果在地图上的这些点之间画上一条线，几乎就是前苏联的外部边界。）

1993 年底，俄罗斯军事统帅部断言：如果在前苏联共和国内的事态发展被认为是违反俄罗斯的利益或威胁到地区稳定的话，它就具有事实上的权力来进行干预；于是上述行为都成了名正言顺的事。这种情绪随后又得到俄罗斯政界领导人的响应。此外，这种情绪还伴之以实际的行动。1993 年，俄罗斯军方对独联体的新国家的行为越来越具有单方面的性质，同时莫斯科政府在施加经济影响时变得更加独断专行了。

俄罗斯对其独联体邻国的政策有两大板斧：既致力于逐步剥夺新独立国家的经济自主权，又制止出现单独的武装部队。前者是通过灌输这种信条：只有通过独联体比较密切的一体化，才有可能恢复经济。后者则力求把各国军队限定为基本上是象征性的和名义上的军队，以便更多地将它们归并到莫斯科的指挥之下。迄今为止，只有乌克兰认真努力地建立它自己的军事力量。

此外，在过去2年内莫斯科已认真地作出努力，以便重建某些过去将旧苏联维系在一起的制度上的联系。为了促成一系列的新的协议和联系，已付出了大量的精力。这些协议和联系包括独联体宪章、集体安全条约（它在某些情况下还使俄罗斯可以控制前苏联的外部边界）、集体维持和平协议（用来合法地干预塔吉克斯坦）、新的卢布区（目的是使俄罗斯中央银行在货币问题上起决定作用）和正式的经济联盟（把关键性的经济决策权转交给莫斯科），以及共同的独联体议会制。

利用军事和经济手段达到对莫斯科的顺从，在最近的白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试验中显得特别突出。在白俄罗斯，俄罗斯的经济贴补促成了白俄罗斯在政治上的从属性。在格鲁吉亚，军事干预则给莫斯科以政治仲裁的口实。在此过程中，格鲁吉亚得到的教训是——与克林顿在莫斯科所说的相反——俄罗斯作为一个仲裁国和作为一个帝国之间没有多大区别。

鉴于乌克兰的面积大和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最不祥之兆是莫斯科加紧对基辅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这一做法是与莫斯科广为传播的情绪保持一致的。这种情绪认为，乌克兰的独立是不正常的，而且是对俄罗斯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地位的威胁。（有些重要的俄罗斯政治家公然说乌克兰是"一个过渡性的实体"或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这就是

证明。①)俄军方强行分治克里米亚和断言要单方面控制大部分的争议中的黑海舰队。② 把事情搞得更糟的是,俄罗斯公开声称对乌克兰地区的领土要求。与此同时,俄罗斯通过削减和定期切断向乌克兰工业提供至关重要的能源来施加经济影响,以便造成该国的不稳定,促使一大部分的居民开始纷纷叫嚷与莫斯科建立较密切的联系。

为了在国际上孤立乌克兰,俄罗斯的政策制订人还巧妙地利用了克林顿政府忙于确定乌克兰的核地位的时机。莫斯科继续利用美国的恐惧(和美国政府显然希望俄罗斯来控制乌克兰的核武器),得心应手地把基辅的新的领导人描述成是对国际稳定的威胁。乌克兰不善于把其担心告知西方也加剧了它的孤立处境和由此带来的易受攻击之感。

到 1993 年底,也就是苏联正式解体(不含波罗的海共和国)后整整两个年头,只有受困扰的乌克兰、能源丰富的土库曼斯坦,或许还有极权主义的乌兹别克斯坦仍可以看成是真正的主权国家。

---

① 一位民主派的俄罗斯人士直言不讳地抨击这一态度,见 1993 年 12 月 7 日《莫斯科新闻》周刊上安德烈·科尔图科夫撰写的题为《为何落井下石》的文章。

② 俄军方在这样做时偶尔提及他们得到美国的支持。例如,俄海军第一副司令伊戈尔·卡萨扎诺夫海军上将访问美国海军归来后报告说,他就黑海舰队问题同他的美国海军同级将领进行了商讨,并称"他们不同意乌克兰国防部长对这个问题的荒谬观点。因此,他们当然是支持俄罗斯黑海舰队的。这是他们的官方观点。"1993 年 10 月 14 日《国际文传电讯》社。着重号是作者加的。

历史健忘症

一个真正的伙伴关系的想法——如果不仅仅是一个旨在安慰受伤害的俄罗斯的民族自尊心的礼仪性口号——需要一种有共同的国际目标和利益的坚实基础。俄外交政策的制订者表明有真正的兴趣在全球维持和平、发展和裁军方面与美国进行合作，这确实是令人放心和高兴的事。叶利钦总统和科济列夫外长的很多公开讲话是富有建设性的，同时俄罗斯在联合国的行为也与苏联的行为形成极鲜明的对照。

此外，负责的俄罗斯领导人都知道，无论旧的沙皇帝国（连同它的公开的俄罗斯化），或苏联（连同它的强制性的极权主义），或早先的中欧统治（连同它的公开的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顺从）都无法得到全面的恢复。这类稀奇古怪的目标只有极端主义分子——要么是激进的沙文主义者，要么是老共产党人——才孜孜以求，尽管应该说两者的影响力都在增长。然而，就目前来看，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精英们似乎抱定一些比较有限的目标。

看来占上风的政策的动态势头不是指向重建旧的中央集权的联盟，而是指向一种邦联制，莫斯科在其中统治着一连串的卫星国（很像旧的苏联集团那样），不过这一次却是在前苏联本身的范围之内。俄政治家不断地公开声称，俄罗斯要成为新的邦联的中心，而在这个邦联中，非俄罗斯的前

苏联国家尽管形式上保留有主权国家的象征，而在实际上则不断地和越来越多地受到经济、政治和军事联系的制约。就乌克兰而言，一旦其地位降到例如像前苏联卫星国保加利亚那样，它就不再成为一个难题了。由于白俄罗斯早已俯首听命，乌克兰重回老家就会重新把前苏联的斯拉夫成员国重新团结在克里姆林宫周围。

俄罗斯的领导人似乎希望他们能对高加索和中亚的非斯拉夫国家采取同样的办法。由于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依赖某种形式的与俄罗斯的一体化，以及在其中的若干个国家中有着大量的俄罗斯定居者，所以它们很容易被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压力所左右。这已在新的精英分子中引起了广泛的恐惧和相当大的愤慨情绪。在作者于1993年底在中亚和格鲁吉亚访问期间，所有的最高政治领导人都以强烈的措辞，痛斥莫斯科利用俄罗斯定居者作为有权进行干预的理由。直言不讳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甚至公开说——其措辞几乎可以说是故意对俄罗斯人加以侮辱——“任何谈论保护居住在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人的说法都使人想起希特勒的时代，他开始也是从保护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的问题上大做文章的。”[1]

目前俄罗斯政策的目标，如果说还不具有公开的帝国性质，至少是具有初始的帝国性质。这种政策可能还没有明显地以正式恢复帝国为目的，但是，它丝毫也不会限制那种

---

① 1993年11月24日，接见《国际文传电讯》社记者时的谈话。

继续不断激励大部分政府机关人员，特别是军方人士，以及公众的强烈的帝国冲动。支持这一政策的基本的和日益公开声称的共识似乎是，在莫斯科的政治领导下，前苏联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将促使俄罗斯作为一个强大的超民族国家和一个真正的全球大国，东山再起。正如科济列夫外长所说，“不管怎样，一切东西将会回到原位”。①

目前俄罗斯有关中欧的看法乃是这种初始帝国态度的延伸。俄罗斯不允许中欧成为一体化欧洲的、特别是欧洲—大西洋联盟的有机部分。这个地区显然被认为是俄罗斯特殊利益和势力影响所在的地区，包括——按照新的军事理论——反对“军事集团或联盟（即北约组织）扩张”到该地区的权利。

俄罗斯的军方和非军方的发言人都毫不犹豫地用较强硬的言辞，宣传他们反对北约组织的任何扩张行为。俄外长以令人痛苦地想起苏联老调子的语气直言不讳地说，北约组织朝着该方向的任何趋势都将会制造“一个在任何情况下可予摧毁的缓冲区”，而格拉乔夫元帅也大言不惭地说，“俄罗斯不会允许波兰被接纳进北约组织”。②

另一方面，俄罗斯领导人表示，他们将赞成为该地区的安全达成一项俄罗斯—北约组织的联合保证。这一提议——在1993年9月叶利钦总统致美、英、法、德领导人的信

① 见1993年12月7日《俄罗斯报》上的安德烈·科济列夫文章。
② 1993年8月23日，与波兰通讯社记者的谈话。

中提及一被中欧国家说成是一个不祥的地区共管的提案。它们怀疑这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共管,因为俄罗斯在军事上占有邻近的有利地位,以及西方在政治上对俄罗斯势力范围的合法化无动于衷。这种疑虑还因叶利钦在同一提议中所说的一番令人困惑的话而更加重了。叶利钦说:"我们认为,我国和北约组织之间的关系的温度应当比北约组织和东欧之间的关系的温度高几度。"[1]

上述断言中所表露出的更大范围的意图是欧洲的政治一体化基本上限于该大陆的西部。而一个更广泛的安全体系将(像口号所说的那样)从温哥华一直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从而逐步冲淡欧洲—大西洋联盟,同时会使地区性的霸主俄罗斯最终在美俄伙伴关系的保护伞下重新振兴,再次成为欧亚大陆中的最强大的国家。与旧的中央集权的苏联和它的相邻的卫星国家集团不同,这个新的体制以某种邦联的形式包含了俄罗斯和它的卫星国(在前苏联的范围内),而接近它的中欧则被西方认为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多年来,美苏关系在某些领域中偶尔出现过具有伙伴关系的特点。但它对美国的欧洲盟国基本上不具有威胁性,因为这种关系的实质仍是对抗性的,所以在美国所关心的问题中盟国的利益总是占着重要的位置的。相比之下,如果美俄之间达成一种合作性的共管,那就会降低盟国利益的

① 1993年12月3日对外广播新闻社电讯(非正式译文)。

重要性。

一旦这个意图变成现实，由于欧洲国家认为美国默许这种阴谋，它将直接危及欧洲一大西洋联盟。德国无疑将对这一事态发展持否定的看法，而法国大概会公开抨击美国出卖了欧洲的利益。这些国家可能还会作出什么反应，无法预言；但是，可以有把握地推测，欧洲一大西洋的团结统一就会瓦解。德国几乎肯定会寻求自己的利益，可能采取与俄罗斯单独达成某种协议的形式。如果德国采取了这样的行动，那么现有的德国—波兰和解的一切前景都会毁于一旦。而这一和解对一个较大欧洲的未来的稳定至关重要，正如德法和解对西欧的稳定至关重要一样。

最后的结果将是西方在冷战中取得的长期的胜利果实丧失殆尽。这就不会实现欧亚大陆的相对稳定和新的真正具有建设性的美俄伙伴关系，相反地，一种更加多灾多难的强权政治可能会再度主宰这个古老的大陆。各种不稳定的和难以预测的联合可能会取代目前所希望的形成一个较大的和较统一的欧洲：它与美国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且欧美双方均致力于同俄罗斯进行较深入的合作。

上述各种担心都是针对未来的，鉴于俄罗斯目前处于"混乱时期"(*smuta*，在俄罗斯历史上用来说明长期内部失调阶段的名词)，这样的未来在今天看来，不仅是遥远的，而且是渺茫的。但是，这里注意到的有害趋向的现实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考虑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这一战略的太多内容是建立在历史健忘症的基础上，这种历史的健忘症已促使

美国国务卿为新的俄罗斯的军事理论辩护，说它基本上是温和的。需要采取预防措施来防止这种可能性——有人可能称之为盖然性——那就是，历史的态势不会很快使俄罗斯成为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只顾与俄罗斯建立伙伴关系，对其他方面的利益等闲视之，将只会加快重新出现不祥的人们熟悉的对欧洲安全的帝国挑战。

地缘政治上的多元化

一项合乎实际的和长期的大战略的中心目标，应当是*巩固前苏联境内地缘政治上的多元化*。这一目标较为恰当地确定了美国的长期利益，不管在最近的将来俄罗斯是否会成为一个善于适应新环境的民主国家。实现这一目标是一个稳定、民主的俄罗斯最终崛起的先决条件。只有在坚定地创造出使俄罗斯自己纯粹成为俄罗斯的适当环境，才会为美俄两国建立起持久和真正的伙伴关系奠定基础。

采取这项替代战略的基本前提是，地缘政治上的多元化将为这样一个俄罗斯的出现创造最佳条件：它不论是不是民主的，都被促使同邻国友好。它同这些国家能够在一个共同的经济空间中合作。但是，它不会谋求，也不能够在政治和军事上主宰这些国家。加强地缘政治上的多元化将会遏制重新缔造帝国的诱惑力、以及对俄罗斯的民主前景的有害影响。俄罗斯不成为一个帝国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像法国或英国或奥斯曼后初期的土耳其那样。

加强前苏联境内的地缘政治多元化，将产生一些实际的政策后果。虽然美国继续寻求加深同俄罗斯的友谊，但是它将要求在俄罗斯和非俄罗斯各国之间比较平衡地分配财政援助，要求放弃一味把核武器问题奉为考验美国—乌克兰关系的试金石的做法，并且要求对莫斯科和基辅一视同仁。[①] 必须明确地承认这样的事实，即乌克兰的独立存在乃是一个比基辅是否迅速拆除苏联解体后的核武库意义重大和深远得多的问题。美国对俄罗斯的援助，还要以俄是否不再试图把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变成完全从属于它的卫星国为条件，而且需要有更大决心把莫斯科侵犯其邻国之举成为争论点——包括在联合国内进行争论。例如，1993 年格鲁吉亚问题就应该受到更多的注意。

这里关键的问题——很可能在 1994 年期间达到戏剧性的顶点——是乌克兰未来的稳定和独立。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成其为帝国，但一旦乌克兰被收买而后臣服，俄罗斯就必然成为帝国，这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看法。美国的政策制订者必须面对乌克兰正濒临灾难边缘的事实：经济一落千丈，而克里米亚正濒临俄罗斯煽动下的民族情绪的大爆发。无论哪一个危机都可以被利用来促成乌克兰的瓦解或重新并入一个较大的莫斯科所主宰的构架之内。当务

① 一位非常明智的俄罗斯批评家指出，克林顿政府在乌克兰核武器问题上过于执著，对美俄与乌克兰的关系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见 1993 年 11 月 27 日《消息报》上，斯塔尼斯拉夫·康德拉绍夫的题为《基辅抓住核武器问题不放是莫斯科和华顿盛的过错》的文章。

之急和至关重要的是，美国要说服乌克兰政府——通过答应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采取被长期延误和亟需的经济改革。与此同时，美国应当作出政治上的保证，担保乌克兰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随后，美国应当更明确表示对中亚各国和高加索地区3国的独立感兴趣。1993年底戈尔副总统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是还可以用较低的代价做很多事情。吉尔吉斯斯坦一直模仿美国的民主和自由市场机制，目前它正处于比某些邻国更糟的困境。由于它的面积小，只要美国稍稍卷入便可产生相当大的政治影响。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和在一定程度上与土库曼斯坦——两国看来都决心反对外来统治——的政治关系的进展落后了，因为华盛顿认为这些基本上是穆斯林的国家在民主方面的进展不够快。不过，美国对另一些国家，例如科威特或沙特阿拉伯的政策却似乎没有受同样担心的影响；出于同样重要的战略考虑，在过去一些年里，对台湾或韩国的政策中也没有这种担心。

为了加强稳定，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鼓励中亚国家进行区域合作。否则，它们之间的民族冲突很可能会被外界利用，就像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战争一样。1994年初，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创议建立经济联盟一事理应得到国际的支持，尤其是美国的支持。此外，由于中国对该地区的经济影响越来越大，以及中国对中亚邻国前途的自然兴趣，美中两国就该地区事务进行一些悄悄的政治磋商的

时机已经成熟。

由于同样重要的地缘战略上的理由，而且还由于人道主义的理由，美国应当对需要在高加索地区执行国际维持和平行动一事采取更加积极响应的态度。联合国的特别代表曾建议，针对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战争，组成一支 2 000 名维持和平人员的国际部队，其中同一个国家的人员不得超过该总数的 1/3。其效果是促使可能出 1/3 人数的俄国进行具有建设性的国际合作，同时减少他们作单方面干预的范围。对此美国政府竟莫明其妙地裹足不前，从而丧失了机会，未能开创一个在独联体内执行真正的国际维持和平任务的积极先例。

要寻求地缘政治上的多元化，还必须更有意识地扩大欧洲安全的规模和范围。有意地倡导建立一个更大和更安全的欧洲未必被视为一项反俄政策，因为在吸收几个中欧民主国家加入北约组织的同时，可以在北约组织和俄罗斯之间缔结一项联盟和合作的条约。将俄罗斯仅仅作为一个成员国吸收到北约组织之内，要不冲淡北大西洋联盟的特别的凝聚力，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无疑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但是，如果在北大西洋联盟和俄罗斯之间缔结一项条约（即便俄罗斯还没达到美国对其民主进程的期望），那将使俄罗斯人满意地看到自己国家的大国地位，同时将俄罗斯纳入一个欧亚大陆安全的较大框架中。

扩大民主欧洲的安全区使西方与俄罗斯更加靠近，是义无反顾的事。一个最终的民主的俄罗斯是会希望它自己

与一个稳定的和安全的欧洲挂起钩来的。只有到那时,俄罗斯才会实现现代化和繁荣。在这个问题上,讨好俄罗斯帝国主义分子决不是帮助俄罗斯的民主派。正确的途径是坚定地坚持,北约组织逐步向东扩展不是"划定一条新的界线"的问题——像克林顿总统于 1994 年 1 月在布鲁塞尔错误地提出的那样——而是避免在俄罗斯和北约组织之间出现安全上的真空,这一真空状态只会诱使俄国内那些随时准备选择帝国而不是民主的人跃跃欲试。

多年来,美国对俄的政策一直在天真的如意算盘和冷静的现实主义之间摇摆。讲求实际的地缘政治考虑,加上对俄罗斯人民的友好感情以及对非俄罗斯族人民的愿望的同情,才会更可能产生一种行之有效的新战略,以取代原先的从历史角度看甚为成功的遏制战略。为此,口号和幻想都无济于事。美俄两国要想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不仅需要双边和解,而且更需要建立一个富于建设性的地缘政治框架。

(潘嘉玢译　刘瑞祥校)